中日关系的现状与未来趋势评估报告书

——多层面和中长期战略的视角*

胡令远　臧志军　冯玮　徐静波　包霞琴　李双龙　张浩川

一、总　论

（一）中日关系的焦点与困局

中日关系近年急转直下，其直接的导火索和根源，无非是日本的右翼政客外借美国“重返东亚”之机，内用最能触痛民族主义情感的领土主权问题所“惹的祸”。同时，在这一祸害的肇端里，隐含着他们用意深险的战略考量。如果我们对中日间领土主权争议问题稍加梳理，就不难看出这一问题只不过是他们为了操弄中日关系所打的一张王牌——其工具性不言而喻。

1、领土主权及其争议

关于中日岛屿之争，日本政府的立场是：“尖阁诸岛”[①]无论从历史看还是从国际法看，都是日本的固有领土，现在在日本的有效支配下，因此不存在需要解决的主权问题。[②]《（日本）政府关于尖阁诸岛领有权的基本见解》称：1、“尖阁诸岛被纳入日本版图前，是不属任何国家的无主岛屿”；2、“尖阁诸岛主权和日清战争（甲午战争）无关”；3、尖阁诸岛系根据《旧金山和约》第三条而非第二条为日本所有，并按照日美《冲绳归还协定》归还日本。”但是，日本政府的上述主张完全站不住脚。

（1）日本政府称，自 1885 年以来，日本政府通过冲绳县当局等途径多次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进行实地调查，慎重确认其不仅为无人岛，而且没有受到清朝统治的痕迹。在此基础上，于 1895 年 1 月 14 日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在岛上建立标桩，以正式编入日本领土之内。但是，《日本外交文书》第 18 卷记载，1885 年 9 月 22 日，冲绳县令西村舍三根据日本内务省指示，对钓鱼岛进行调查后发现其并非无主地，遂据实禀报。10 月 21 日，日本外务卿井上馨致信内务卿山县有朋：“此刻若有公然建立国标等举措，必遭清国疑忌，故当前宜仅限于实地调查及详细报告其港湾形状、有无可待日后开发之土地物产，而建国标及着手开发等，可待他日见机而作。”上述史料明显推翻了日本政府的说法。而根据 1744 年出版的中国官方文献《大清一统志》第 280 卷记载，中国至迟在 1403 年已发现并利用钓鱼岛及附属岛屿，而日本文献则迟至 1884 年才提及钓鱼岛。“尖阁诸岛”这一名称，更迟至 1900 年 8 月方由冲绳县师范学校教师黑岩恒在日本《地学杂志》发表的《尖阁诸岛探险记事》中首次使用。

* 本报告书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战后日本政治、外交实质和未来走向研究》（14JD033）的成果。

（2）日本之所以将“尖阁诸岛开拓日”定在 1895 年 1 月 14 日，盖因日本当时已经在中日甲午战争中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日本外交文书》第 23 卷记载，1894 年 12 月 27 日，内务大臣野村靖致函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称：“久场岛、鱼钓岛建立所辖标桩事宜，今昔形势已殊，有望提交内阁会议重议此事如附件，特先与您商议。”翌年 1 月 11 日，陆奥宗光复函表示支持，野村靖即于 12 日“呈请阁议”。日本政府的日本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纳入日本版图与甲午战争无关的说法，明显与日方的史料记载相矛盾。

（3）关于钓鱼岛问题与旧金山和约的关系，当时在中国代表参会问题上，美国支持台湾当局参会，而英国则支持新中国政权参会，最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和英国外交大臣莫里斯达成妥协：两岸均不邀请参会。另外，几个主要对日参战国，如苏联、印度、缅甸，均没有签约。印度尼西亚虽然签署了和约，但未获国会批准而无效。在此背景下产生的旧金山和约对于中国当然不具有约束力。不仅如此，即便是主导旧金山和约制定的美国政府迄今也只承认日本对钓鱼岛拥有“治权”，而不承认其拥有“主权”。

日本政府关于钓鱼岛问题的立场在日本并未获得完全的支持。其立场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日本的；二是不存在需要解决的主权问题（即不承认存在主权争议）。日本政府的前一立场在日本拥有广泛的支持。2010 年 9 月 7 日中日“撞船事件”发生后，10 月 5 日，日本《读卖新闻》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90%的受访者表示赞同“应明确主张‘尖阁诸岛’（即钓鱼岛及附属岛屿）是日本领土”，只有 5%的受访者认为“不必要”。2012 年石原慎太郎提出所谓“购岛计划”后，据日本雅虎网调查，有 90%以上受访者表示“支持”。但是其后一主张则未获得同样的支持。2013 年 8 月，日本内阁府发表关于钓鱼岛问题的民调结果显示，仅有 48%受访者了解日本政府关于钓鱼岛“在日本实际控制下，不存在需要解决的主权问题”的立场。实际上，在日本，很多人在赞同政府关于钓鱼岛是日本的领土的主张的同时，认为中日之间存在着主权争议。正因为如此，近年来日本政府强化了关于钓鱼岛“不存在主权争议问题”的宣传。今年 1 月，日本文科省宣布，计划在初中和高中教科书编写指南中写明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其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安倍政府认为，原来教科书的提法“不够醒目”，而且同“不存在主权争议”的官方立场矛盾；右翼喉舌《产经新闻》也称，现有的教科书“过度描述与别国的主权争议，无益于引导学生形成深刻认识。”

中国方面的立场是：钓鱼岛及其周边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这些岛屿曾经在甲午战争后，根据《马关条约》和台湾岛一起被日本强行掠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它们已经回归中国；1971 年，日美根据《冲绳归还协定》，将钓鱼岛纳入归还区域是非法的。与此同时，中国方面注意到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主权归属问题上中日之间存在着争议，因此中国方面在强调主权在我、寸土不让的同时，也一贯主张搁置争议。

中国方面搁置争议的主张曾经是两国执政者的事实上的共识（有的研究者称之为“默契”）。日本方面不承认争议的存在，背弃有关搁置争议的重要共识（或默契）是导致近年来两国之间岛屿主权争端升级的根本原因。

目前，要求任何一方在主权归属问题上作出让步是不可能的，但是以某种方式回归以往的共识和默契却是可能和应该的。首先，争议是客观存在的。不仅中国方面同意这一点，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很多人也承认这一点。第二，双方曾经有过搁置争议的共识和默契，这一事实也是客观存在的。第三，搁置争议对于双方而言虽然都不是最佳结果，却都是最为现实有

益的选择。因此,那种关于双方在岛屿争端问题上不可能退让、这一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的观点固然有其正确的方面,却仍然不免简单和机械。

当然,搁置争议并不意味着中国方面在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上的立场有任何动摇。

(二)历史认识问题和日本的原罪包袱

对于日本当政者来说,历史认识问题未必是展现政治情感与理念的场域,却已经成为其操控舆论、塑造形象、谋取利益的工具。诸多日本执政者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的种种表演,或进或退,或隐或现,或大放狂言或故作暧昧……,已经充分地表明了这一点。更有甚者,某些日本当政者甚至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大放厥词之后,突然反身试图以对历史认识问题的某种程度的所谓的"退让"(例如承诺"停止参拜")来和中国方面进行交换。由此可见,历史认识问题哪里像日本一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中国手上的一张牌,其根本就是日本某些人无中生有造出来的一张牌。

日本当政者以在历史认识领域的所谓"退让"来与中国进行交换的企图是极不道德的,完全不能接受。即便当初日本有一万条理由对其他国家宣战,也没有任何一条理由来侵略它的曾经的文化母国——中国。日军在中国犯下的暴行是有组织、长时期和大规模的,完全泯灭人性,根本不可原谅,更不用说拿对这种暴行的认识来用作交换了。

从中日关系的角度看,如果说在历史上受害最深的是中国的话,那么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受害最深的其实是日本。不管其是否承认,对日本而言,其久挥不去的"中国梦魇"实际上正是源自其潜意识中对于中国的负罪感。历史认识问题是日本的而非中国的包袱。2013 年 1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会见来华访问的日本公明党党首山口那津男时表示,以史为鉴,才能面向未来。日方应尊重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正确处理历史问题。

在近期,要日本当政者完全卸下历史包袱是不可能的。日本的诸多当政者们在历史、理念、价值甚至是血缘方面与过去有着太紧密的连续性,他们需要一次脱胎换骨的改造,但是历史和现实均没有提供实施这种改造的可能。于是,中日之间关于历史认识问题的交锋仍将长期存在。

(三)中日关系的根基所在和日本的对华迷思

1、基础

当前的中日国家关系处于 1972 年 9 月两国邦交正常化以来最坏的状态。这种恶化的趋势并非始于 2012 年 9 月起激化的领土主权之争。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中日关系表面上不断发展,从 1998 年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到 2008 年的"战略互惠关系",确定了越来越高的发展目标,其实两国之间的关系在不断恶化。究其背景,人们经常提及冷战的结束、中日之间综合国力对比的变化等,其实这只是外因。外因只有在与内因的互动中才能产生作用。中日关系恶化至此的根本内因在于日本执政当局背弃了 1972 年 9 月中日邦交正常化时双方确认的中日国家关系的基础。

当前中日关系的基础是由 1972 年 9 月中日两国政府关于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1978 年 8 月两国缔结的和平友好条约、1998 年 11 月双方发表的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以及 2008 年 5 月双方发表的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这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在这四个文件中最重要的是 1972 年 8 月中日两国政府的联合声明,因为它是其他三个政治文件的前提,其他三个政治文件无一例外地都将 1972 年的联合声明作为自己的基础。

1972 年中日两国政府关于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文本中有四项基本内容：一是确定责任、反省历史(即“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二是确认“一个中国”的原则(即“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三是确认双方和平友好相处(即“双方同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并且确认在相互关系中,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四是确认面向未来发展中日关系(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以及实现邦交正常化、发展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对缓和亚洲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的贡献)。这四项基本内容是此后中日国家关系的基础。不能忘记的是,在邦交正常化谈判时,中日双方还达成一个重要的共识,那就是搁置双方有关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土主权归属问题的争议。这一共识当时虽然没有形成文字,但是它确实是邦交正常化谈判得以进行并达成协议的重要前提。因此,它也是中日国家关系的重要基础之一。换言之,中日邦交正常化时确定的中日国家关系的基础由五大方面构成:一是“历史认识”;二是“一个中国”;三是“搁置争议”;四是“睦邻友好”;五是“面向未来”。

中日国家关系的上述五大基础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对于过去历史的正确认识,就不可能真正实现面向未来的中日关系;没有对于搁置争议的共识和遵守,就不可能有睦邻友好关系。

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关系的曲折，其根本原因在于日本执政当局在若干重要原则问题上的摇摆不定;近年来中日关系的急剧恶化,其根本原因在于日本执政当局对于上述重要基础的背弃。

2、焦虑

近代以来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日本是亚洲唯一的工业化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从战争废墟上开始建设,在较短的时期内将国家建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因此,日本很多人骄傲地将自己视为亚洲的“优等生”。当然,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与此同时,日本又是一个生存危机意识极为强烈的国家。从幕末时期开始,不仅是关键时刻,即便是平常时期,统治精英集团也不断渲染所谓的生存危机,塑造国民的生存危机感,久而久之,生存危机意识强烈几乎已经成为日本国家和主流舆论的特征之一。

冷战结束以后,在中国,人们将更大的精力投入到了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之中,国家的综合国力不断上升、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日本自泡沫经济崩溃以后,经济、政治、社会和对外关系陷入长期严重的停滞状态。中国在一些领域开始接近甚至超过了日本。中日力量对比的变化及其趋势使得日本统治精英集团中产生了极大的对华焦虑。层出不穷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本质上都是对华焦虑情绪的反映。不仅如此,在统治精英和主流媒体的极力渲染下,这种焦虑广泛蔓延和渗透,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日本国民的对华认知。

3、迷思

日本国家的对华焦虑集中体现在安全领域，其反应的激烈程度远远超出了正常的防范性反应范围。近年来日本的对华政策及其实践表明,日本执政当局正在实施对华“全面遏制”的战略,实际上已经将中国定位于“准敌对国家”。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的以所谓对付

来自“朝鲜的威胁”名义进行的军备建设,到近年来赤裸裸地岛屿作战演习,从前些年的“价值观外交”到近年来的“地球仪外交”,从以往南海周边国家暧昧的 ODA 援助到公然提出所谓的“海上安全合作”,甚至于连技术装备出口、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以及加入 TPP 之类的经济贸易领域的议程都被从遏制中国的战略手段角度加以反复研讨。不仅如此,日本还三番五次地企图拉美国下水,在亚太地区组建新的针对中国的军事同盟。如此险恶的用心和做法,不仅让一些研究者警觉:日本是否正在企图第三次用武力阻断中国崛起的进程?

日本执政当局视华为敌是缺乏理智的。第一,尽管中日之间有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迄今为止中国并没有将日本视为战略敌手。第二,中国的发展对于包括日本在内的周边国家和其他国家来说,是和平的和共赢的。第三,中国的军事战略是防御性的,尽管其军事力量的活动领域有所扩大,但是任何不抱偏见的人都可以看出中国军事战略的防御性属性。第四,即便在极大地牵动着中国国民感情的敏感的领土和历史认识问题上,中国政府采取的仍然是冷静和有节制的做法。如果日本执政当局是理智的,其不可能完全看不见上述各点。

日本执政当局之所以执意虚构并坚信所谓的“中国威胁”、采取对华全面遏制战略,主要受到三个因素的影响:一是对华恐惧,二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外交思维,三是保守主义的信念。

(1)恐惧。日本对华恐惧的形成其实与日本执政者的历史认识密切相关。日本国家和民族在历史上对中国、韩国等国家和人民犯下过极其野蛮的侵略罪行。但是诸多日本当政者却不愿意正视这一事实。日本国家以及执政当局的历史认识,与中国等受害国政府和国民的认识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近年来这种差异甚至还有扩大之势。在此背景下,日本统治集团在潜意识之中就无法摆脱对有朝一日会遭受对方报复的恐惧。长期以来,日本的统治集团和主流媒体或明或暗地不断指责中国、韩国等国家揪住历史问题不放恰恰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这种恐惧。只要这种恐惧迷思一日不消除,日本的对华政策规划就难以变得坦然和正常。但是解铃还须系铃人,要放下历史的包袱归根结底需要日本自身的努力和诚意。

(2)社会达尔文主义。日本的东亚外交思维方式陈旧,与其说是停留在冷战时期,不如说更加具有 19 世纪末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色彩。冷战的特点之一是意识形态的对抗,虽然近年来日本为围堵中国,以“价值观”说事试图建构价值观联盟,但是日本外交更加注重的是实际利益而非意识形态,所谓“价值观”只不过是其用来构建反华同盟的工具。日本的亚洲外交信奉的是将生存竞争、弱肉强食视为自然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念。虽然时过境迁,日本自身已经不具备成为区域霸主的能力,但是其非常担心中国会成为这样的国家。因此,日本的对华外交缺乏双赢、共赢的想象力和相应的努力。

(3)保守主义。战后日本的保守主义势力虽然与美国建立起了同盟关系,但是其从未放弃过推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盟国对日安排的企图。复兴“独立”和“强大”的日本是日本保守正统的夙愿。其具有标志性的目标就是修改和平宪法,使日本重新成为西方军事列强中的一员。尤其是安倍再度执政后,继承保守正统的衣钵,强调修宪是其“毕生的事业”,强行推进“解禁集体自卫权”。修宪和重新晋身于列强军事俱乐部需要重新塑造日本的舆论。与日本的庞大军备相比,朝鲜的导弹显然不足以煽动民众的危机感,身边的那个被认为是“揪住历史不放的”中国自然成为最好的说事对象,尽管中国并不是日本的威胁,尽管中国之所以强调以史为鉴完全是因为日本自己放不下那段历史。

美国的实力已经下降,日本的统治集团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但是其仍然千方百计地试

图拉美国下水，期盼中美之间的军事冲突。其用心深远而险恶：这一方面可以遏制中国的成长，另一方面也可以在利用和消耗美国的资源和实力的同时，提升日本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身价，改善日美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这种如意算盘应该也是日本不遗余力地宣扬“中国威胁论”的目的所在。

（四）改善中日关系的路径考量

1、基本判断

中日关系的僵局是由深层次、结构性的矛盾所决定的，它既包括战略层面，也包括心理层面，既有现实因素，也有历史因素。因此，中日关系难以在可以预期的将来获得根本改善。当前的努力重点应该是防止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2、中方努力的方向

（1）确认目标

中日关系是我国对外关系的重要方面，但是其毕竟只是一个局部；就目前状况而言，虽然日本因素已经妨碍我国在东亚地区的和平和安全利益，但是尚不足以动摇我国总体外交态势。中国的对日外交仍然应该服从于我国自身发展战略和对外政策的总目标，而不是相反；我国的对外政策总目标是实现我国国家发展目标的途径和手段，而不是相反。不断确认和把握我国国家发展的总目标以及对外政策总目标并且以此来指导对日外交，是极为重要的。

（2）增信释疑

即使在非常敏感的领土争端问题上，日本的国民和社会舆论也并非完全支持日本政府否认存在搁置争议的立场。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尽管受到统治集团和保守舆论的误导，日本国民在一些历史细节问题上并不认同中国方面的主张，但是他们总体上并不否认日本历史上对华侵略这一事实，很多人程度不同地也知道一些日军在战争中的暴行。日本大部分国民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并不缺乏良知，他们缺少的是对于真相的了解。在如何看待中国崛起问题上，日本国内也存在许多误导和误解。舆论是可以影响的，影响舆论的最基本途径是真相和沟通。

（3）底线准备

近年来，中方在东海维权问题上，以坚决果断的态度回应对方的挑衅，顺势而为，获得了重大进展。可以设想，未来中方在继续进行常态化巡航等主权宣示行动的同时，将继续针锋相对地回应对方的挑衅行为；同时中方将继续加强军事斗争的准备，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遏制个别极端势力和冒险者的蠢动，防止东海冲突走向失控。

（4）管控危机

加强中日关系中高危领域的研判和管控工作，同时注意在这些领域加强对于我方舆论的引导，防止某些非理性因素影响国家发展和对外关系的全局。

继续支持和鼓励中日之间的民间交流和地方交流。维持双方政府之间的事务性和程序性往来。继续维护和支持两国经贸关系的互利发展。视时采取改善中日国家关系的举措。

（5）有重点地开展全方位外交

影响中日关系的最大外部因素是美国；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是激发日本全面遏制中国战略冲动的重要因素；没有美国的全面支持，日本没有能力将东海争端升级为全面武装冲突。因此，就对日外交而言，对美外交仍然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开展全方位外交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应对“日本因素”，但是在一段时间内，通过民间外交、媒体外交等途径，以扎实的史料和严密的逻辑揭露日本在历史认识、钓鱼岛主权归属等问题上的谎言仍然是必要的。

（6）中国德性的塑造与新型国际关系准则的引领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有“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的理念，中国的崛起不能只是经济、科技等“硬件”的长足发展，而同时应该注重“柔性内功”即德性的修炼，才能具有近悦远来的文化、文明魅力。在处理中日关系时，中国一方面要清醒地立足于现实，另一方面也要致力于超越现实乃至历史的努力。包括中日关系在内的复杂和全新的国际环境，应该成为中国创设新的国际关系理念、塑造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机遇，从而向世界展示处理国家间关系之德性与理性双辉的新范式。

二、专题研究

（专题一：政治与外交）

战略互惠还是战略抗衡

——日本对华政策的转型与特点

近年来，日本的对华政策处于急剧的转型过程中，其突出特点是从战略互惠转向战略抗衡。日本对华政策的转型不仅基于中日两国实力的此消彼长，而且还基于对未来亚太秩序中日本地位的焦虑和担忧。日本的部分精英不甘心失去一百多年来在亚太地区的优势地位，所以要竭尽全力维持现有亚太秩序，遏制中国的快速崛起，保持自己的优势地位。重振“明治雄风”、不输给中国的政治意志使安倍等鹰派政治家的对华政策愈加强硬，中日关系进入了1972年以来最复杂的转折期。

（一）中日关系转型的拐点

中日关系目前处于1972年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低谷，有学者认为具有“准冷战”特征，因为双边关系陷入了全面“冰冻”期，几乎处于“政治绝交”的状态。

中日关系转型的拐点是2010年钓鱼岛海域发生的撞船事件。撞船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的立场异常强硬，具体表现在：1、高调否认存在领土争议；2、否认中日间存在“搁置”共识和默契；3、要以国内法处置中国船长。日本政府的强硬做法与过去两国政府慎重处理领土争端的做法和默契背道而驰，其背后原因是民主党部分少壮派政治家想利用当时中美在南海问题上的矛盾取得领土争端上的些许突破，从而巩固政坛地位，获得民众更高的支持率。但在中国疾风暴雨式的反制措施下，菅直人内阁最终决定以“顾全中日关系大局”为先的原则释放船长，中国的外交斗争取得成功。但此后民主党政权在外交战略上转向美国，积极修复鸠山执政时期留下的日美矛盾。特别是野田上台后迅速实现访美并发表共同声明《面向未来的共同蓝图》，再次强调“日美同盟是亚太地区和平与安全保障的基石”，从战略上转向配合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对华采取“软制衡”的政策。

2012年9月野田内阁对所谓“尖阁列岛”的“国有化”政策，就是认为国际环境有利于日本，加之中国又正在忙于准备召开十八大，认为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在野田看来，实施“国有化”政策不仅客观上可以进一步加强对“尖阁列岛”的控制，又可以借口防止石原慎太郎购岛后采取更强硬措施，推断中国即使采取反制措施也不会过度强硬。但野田的误判导致

他很快下台，从而为安倍的上台提供了机会。

安倍内阁的对华政策更加强硬，并且显示出在战略上全面抗衡中国的特点。他不仅在领土问题上坚持“三不立场”——不承认有领土争端、不承认有搁置共识、不进行领土谈判，而且公然参拜靖国神社，挑衅中国在历史问题上的底线；在国际舆论上“抹黑”中国，诋毁中国“以武力改变现状”，破坏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形象；在外交上不仅联美制华，而且还合纵连横，积极在东亚地区构建“对华包围圈”。结果使“钓鱼岛事件”上升为“钓鱼岛危机”，中日两国之间潜在的各种矛盾集中爆发，中日关系跌入1972年以来的最低谷。

（二）日本对华政策转型的特点

这次日本对华政策的转型是全面而深刻的，其特点可以从战略、认知、战术和舆论战等方面加以总结。

1.战略上，目前日本的对华外交走在了从“战略互惠”滑向“战略对抗”的边缘。冷战结束后，中日关系的战略定位几经摇摆和调整。90年代后，由于苏联解体和冷战崩溃，中日友好合作的战略基础发生动摇，但1998年江泽民主席访日期间签署的《中日共同宣言》使中日关系得到重新定位，“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是面向21世纪中日关系的战略定位；进入21世纪后，小泉内阁在历史问题上无视中国国民感情，连续参拜靖国神社的做法又使中日关系产生激烈碰撞，中日关系陷入“政冷经热”的怪圈；2006年安倍上台后为打破僵局而首访中国，并确立了致力于“战略互惠关系”的共识，使起伏不定的中日关系再次得到稳定；直至2010年中日钓鱼岛海域撞船事件以及2012年野田内阁“国有化”政策后，日本民主党少壮派政治家和自民党鹰派政治家在领土问题上“毅然决然”对抗中国，“钓鱼岛事件”上升为“钓鱼岛危机”；安倍上台后提出“俯瞰地球仪”外交，试图从战略上抗衡中国的快速崛起，建立所谓“对华包围圈”来牵制中国地区影响力的上升，中日关系滑向了全面冷战和战略抗衡的边缘。

2.对华认知上，日本对华政策的转型基于对华认知的改变。近年来日本媒体喧嚣着“咄咄逼人的中国”、“膨胀的中国”、“威胁的中国” 等论调，“强硬中国” 的新形象占据日本主流社会。大部分日本人认为“中国的崛起已经不是潜在和未然的命题，而是现实和已然的事实”。“这次中国的崛起是全面的综合实力的崛起，不仅经济上成为世界第二，政治上还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在20国集团、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也不断扩大”。特别是中国军事上的实力大大提升，二战后日美在亚太地区的军事主导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全面崛起的中国，日本政府采取的政策是围堵与抗衡，强调要提升对华“遏制力”和“威慑力”。于是，三年内两次修改日本防卫计划大纲，加强西南诸岛的防卫力量和侦察力量，要求驻日美军引进最先进武器威慑中国，积极参与和组织各种军演威慑中国。日本主流舆论也都认为， 必须对华强硬，“对中国这样的大国必须有遏制力量否则恐怕会走向独断霸权主义”，不接受中国的全面崛起成为日本主流社会的共识。

3.战术上，首先采取“联美制华”政策。美国一直是中日关系的最重要变量，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在日本看来是奥巴马放弃了上台之初的对华“绥靖政策”，“美国的回归亚洲在日本被解读为向中国传递坚决的信号，是中美两国集团论（G2）的幻灭以及日本对美的战略价值提升。”日本再次“借船出海”，积极采取措施加强日美同盟的军事合作能力。一是增强美国在日本的军事攻防能力；二是通过军事演习加强日美同盟的军事一体化；三是扩大日美同盟的范围，包括宇宙空间合作、情报侦察合作、应对网络攻击合作等等，日美军事合作越来越

向纵深发展。日本某著名战略派学者认为,“在亚太地区支持美国行动的日美同盟可以使中国谋求霸权付出更大成本，可以影响中国对风险的认识，也有利于遏制中国改变现状的行动”。其次是在东亚地区拉帮结派,构筑“对华包围圈”。一是积极推进东南亚安全外交,确立多边和双边等安全领域的合作;二是推动建立日澳、日俄、日印之间的“2+2”机制(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的会谈机制);三是建立“日美 +a”机制等,通过上述积极外交活动,主动构建亚太地区网络型安全体系,为日本在未来东亚地区新的安保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获得主要发言权做准备。安倍明确说过“日本外交首先要强化日美同盟,然后将同东南亚和印度的关系提高到更高水平的基础上再来同中国搞好关系”。

4.在国际社会打造“负面中国”的形象。首先是夸大钓鱼岛海域的紧张局势,将日本塑造成受害者,批判中国“以武力改变现状”,将中国塑造成霸权者,以此赢得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其次是通过积极的外交活动游说国际舆论,通过达成一定国际舆论共识来围堵中国,将日本塑造成“国际规则”的守护者,将中国说成的“国际规则”的破坏者,以达到诋毁中国国际形象的目的;再次是以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理念为标准将中国列为“异质国家”。日本现实主义派学者高坂正尧认为,国际政治是“力量的体系”和“利益的体系”,同时也是“价值的体系”。日本将中国认定为与欧美日等西方国家不能共享“价值理念”的“异质国家”,积极推行价值观外交,以此占据国际舆论的高地。

5.经济上出现“去中国化”趋势。改革开放后中日关系发展的深厚基础是经贸关系,目前中日每年的贸易总额高达 3000 多亿美元。小泉执政时期虽然政治关系出现倒退,但经济关系依然不断发展,所谓“政冷经热”的现象。但是,近两年来中日的经贸关系出现新的变化,连续两年中日贸易额出现下降。在安倍内阁抗衡中国战略的影响下,日本政府积极参与美国主导的 TPP 谈判以平衡中国在亚太地区经济影响力的上升,安倍上台后遍访东盟十国,鼓励日本企业投资转向东南亚国家,经贸领域的“去中国化”倾向有所呈现。

(三)日本对华政策转型的原因

日本对华政策的转型既源于中日双边实力的此消彼长，更源于对未来亚太秩序中日本地位的焦虑和担忧。冷战结束后,如何应对崛起的中国成为日本近代以来首次面临的挑战,日本的对华政策一直摇摆不定,中日关系因此起伏动荡。90 年代后,在日本主流媒体同时喧嚣着“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和“中国机遇论”等绝然不同的中国观。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日本一度对美国非常失望和不满。2009 年 8 月民主党上台后,在外交方面提出了两个令人瞩目的目标:一是要构建一个紧密而对等的日美关系;二是要加强亚洲外交,致力于“东亚共同体”建设。鸠山内阁以高支持率组建政权,其原因之一是国民对民主党政权的外交充满期待。在对华政策方面,鸠山首相执政 8 个多月的时间里,中日首脑在双边、多边场合会见了 7 次,是“中日首脑外交的繁忙期”,日本舆论界也充满了对中国的友好气氛。与此相对,鸠山内阁时期的日美同盟则“漂流”了 8 个月,在普天间机场搬迁问题、印度洋补给问题、调查“核密约”等问题上鸠山的强硬态度让美国感到愤怒,鸠山内阁在美国的打压之下迅速垮台,日本的外交政策不得不再次回到日美同盟为基轴的路线上来。

2010 年后中日关系出现的根本性变化,既有钓鱼岛撞船事件等偶然因素的推动,又有日本内政的剧烈动荡以及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等多方面原因。

1.从日本内部来看,冷战后 20 多年来日本一直停滞不前,政局动荡,经济衰退,日本大多数国民都希望走出低谷,需要强硬的政治家带领日本走出闭塞停滞。而安倍等鹰派政治家的

内政外交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夺回强大的日本”，摆脱战后体制，走向正常国家。这是安倍的政治理念，也是日本鹰派政治家的夙愿。这种诉求一定程度上迎合了民众的期望，目前得到了日本主流社会的支持。

2.从国际环境来看，进入21世纪后，世界处在历史的大变动、大转折时期，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使产业革命以来以欧美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开始动摇，权力转移非常明显。这对150多年来紧紧追随西方的日本来说是巨大的冲击。在国际格局大转换时期，日本非常在意自己在未来秩序中所处的位置，日本精英阶层已经形成共识，认为在中国还未创建新秩序之前必须通过努力创建有利于日本的新秩序，以维持日本在亚太地区仅次于美国的地位。民主党少壮派政治家前原诚司在2011年访美发表演讲时就认为，日美两国要合作构筑亚太新秩序，“今后，处于转型期的亚太地区，我们两国面临的首要风险是不能全面全力地投入地区新秩序的形成，现在最主要的是整备地区制度的基础，日美两国在其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是我们的重大责任”。可见，这一轮日本对华政策的调整基于亚太地区主导地位和影响力的博弈和较量，目标是牵制中国快速崛起，保持日本在亚太地区的优势地位。

3.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给日本带来了机会。日本最大的噩梦是被美国抛弃，中美竞争和对抗关系可以提升日本的战略地位，可以因此受到美国的重用，从而维持日本在亚太地区仅次于美国的特殊地位。随着战略重心的转移，美国也期待一个在广度和深度上能够给予美国更大支持的日本，从去年日美“2+2”会议声明和决定在2014年底之前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等举措来看，日美两国在战略大方向上具有相当大的契合度，日本在美国亚太战略中的地位得到迅速提升，增加了日本对华强硬的底气。

4.对中国崛起的焦虑与抵制。进入21世纪后，日本清楚地意识到，中国在未来亚太秩序的塑造过程中影响将越来越大，日本极力要维持的“美国霸权”体系已经出现瓦解的迹象。日本学者进藤荣一在《亚洲力的世纪》一书中认为，“美国的全球霸权已近黄昏，但美国主导的霸权秩序依然存在，新秩序尚未达成，世界充满许多不确定性，各种势力认知的差异容易引起碰撞和冲击”。从近年来中日关系恶性循环的情形来看，日本对150多年来在东亚地区的优势地位和优越心理不可能轻易放弃，它无法接受150多年在东亚优越地位的历史被改写，无法接受中国的再度崛起，它坚信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瓦解将使它失去该有的“位置”，这种对未来的“不安”和“焦虑”转化成对华政策的强硬和抵抗。日本著名国际政治学者冈部达味认为，“日本长期是东亚唯一的发达国家，因此很多人对中国的崛起有抵抗。”特别是安倍等鹰派政治家所谓“不输给中国”和重振“明治雄风”的意志，对日本对华政策的转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5.自主防卫诉求的推动。面对世界格局的转型和美国不可避免的相对衰落，日本越来越认识到不能陷入对美国的过度依赖。特别是在防卫领域，正在不断冲破战后束缚，增强日本自主防卫的力量。日本学者松村昌广认为“日本必须凝聚国家安全战略共识，加紧提升军事应对能力，实现自己的国家自己保卫；日本在短期内还能仰仗美国的霸权，但从中长期来看，应努力降低对美国的依赖，逐步实现脱美从属关系”。目前安倍内阁推动的“安保三箭”和解禁集体自卫权等举措，可以说明日本的防卫政策发生了重大调整，应对中国军事崛起成为日本防卫政策调整的最关键因素。

（四）基本评估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中日关系的定位是“战略友好伙伴”关系，日本是中国改革开

放的支持者和援助者，中国很好地利用了日本的资金和技术发展自己；同时，在战略上共同抗衡苏联的威胁和扩张，为中日战略友好关系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冷战结束后，日本又率先打破了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的经济制裁，支持邓小平南巡讲话和更深入的改革开放，两国的经贸关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入发展；进入21世纪后，中日关系进入“政冷经热”阶段，两国在地区影响力和领导力方面的竞争加剧，“东亚共同体”战略上的摩擦和矛盾表明两国的地区战略既有竞争又有合作；而2010年后中日关系陷入矛盾集中爆发期，甚至走到了战略竞争和战略抗衡的边缘。

如何评估这一轮日本对华政策的战略调整？中国又应该做出怎样的应对？中国是否有能力影响甚至塑造日本未来的对华政策？中国的对日政策也面临着新的转型和挑战。

第一，中日关系进入了全新时期，这是中国崛起和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在纷繁复杂的国际背景下，中日关系也陷入了激烈博弈的战略竞争之中。安倍强硬对华政策的背后是“不输给中国”的意志在支撑，政治、经济、安全领域的较量和博弈将在未来一段时期成为中日关系的主要特征。

第二，由于中日实力的此消彼长，日本不再成为中国的“帮手”，但是，我们要防止日本成为中国的“风险”。中日关系进入了“强强相对”的新时期，过去的应对模式可能不再灵验，中国应该站在战略高度进行权衡，需要更多的观念创新和制度突破。

要避免中日关系走向传统的“安全困境”和“军备竞赛”，坚持中日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的箴言，站在亚太地区和平与繁荣的高度，缓和中日两国在东海的紧张局势，坚持领土问题上“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方针，使中日关系回到互利合作的轨道上来。

在钓鱼岛领土问题上，要使日本政府认识到，2012年的“国有化”举措已经打破了过去的默契与共识，现在需要面对现实达成新的共识。目前最紧迫的课题是恢复谈判建立危机管理机制，防止钓鱼岛海域和领空发生“擦枪走火”，学界要加强交流与研究，可以探讨“一岛各表”、“海洋和平特区”等方案，以缓和钓鱼岛海域的紧张局势。

在参拜靖国神社等历史认识问题上，日本国内舆论是分裂的，中国要团结有良知的日本人，让更多日本民众理解中国人民的感情，牵制右翼政治家的“妄言”和“妄举”。

第三，从长远来看，中日关系的稳定发展有利于中国的顺利崛起。近年来，日本政坛虽然出现了右倾化的趋势，但日本政界还有温和派和对华友好人士，日本国内要求缓和中日关系、稳定和发展中日关系的民意依然存在。我们应该加强与这些人士的对话和交流，从而牵制鹰派政治家的对华强硬政策。

第四，要采取措施缓和日本国内消极的对华认知，不要把所有对中国的担忧都看成对华敌视。日本主流舆论对中国的认知有很多“误判”和“误认”，要分辨是“恶意的误认”还是“无意的误认”，要通过加强交流和解释来粉碎“恶意炒作”，缓和舆论气氛，防止对中国的负面认知固化成偏见。

第五、要积极推进大周边外交活动，通过“富邻、睦邻、安邻”等周边外交政策，打破日本试图利用中国在领土领海问题上的争端构筑“对华包围圈”。目前中韩关系和中俄关系发展顺利，牵制了日本的包围政策。同时，中国要增加军事透明度，积极推进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合作，倡导新型合作安全观，以主动合作与开放的姿态积极创建未来东亚地区的双边或多边安全合作机制。

（专题二：经济与贸易）

转型期的日本经济及其对中日政经关系的影响

从纯经济学的视角出发，所谓经济即“经世济民”，只要国民安居乐业，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哪怕只是能够维持较高水平的现状，那也不能够称为“失败”。自上世纪 90 年代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以来，日本经济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但是，由于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的迅速崛起所带来的鲜明的对照，按照宏观经济常用的经济指标，人们一般认为日本经济出现了长期萎靡不振，被称为“失去的二十年”。

事实上，虽然自 1990 年之后日本经济发展的宏观指标不尽人意，但就国民生活水平而言并未出现大幅度的滑坡，甚至还有继续缓步上升的势头。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矛盾，究其根本，日本经济整体正处于转型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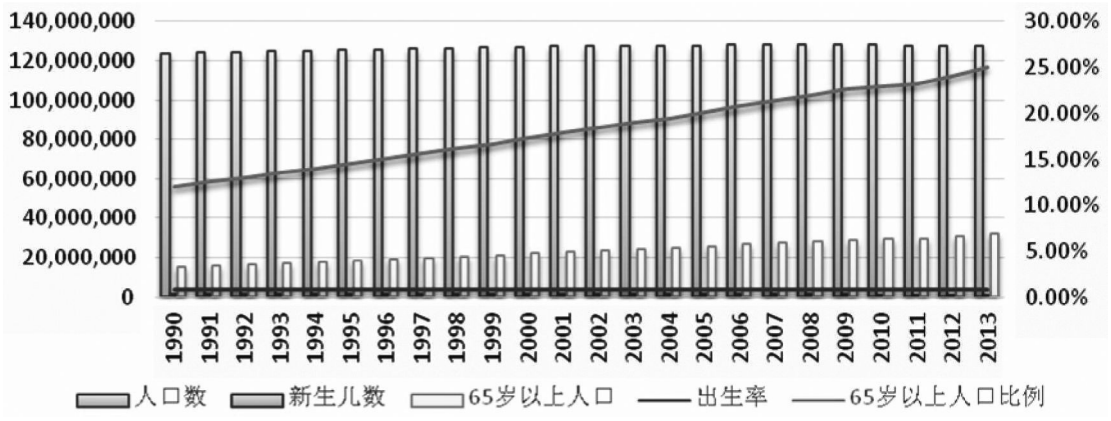
（一）日本经济社会的结构性变化

在探讨日本经济转型之前，有必要看看近二十年来日本经济社会整体的结构性变化或显著的表现。如果说“明治维新”带来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全面发展，最后走向了军国主义的扩张；那么战后美国对日本社会结构的重建奠定了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而在通过自身努力克服了两次石油危机和广场协议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后又遭受泡沫经济崩溃重创的日本，从 90 年代起开始反思过快的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诸多弊端，经济学界也开始摸索真正的“富饶社会”。日本经济也面临着向“北欧福祉型国家”发展，还是继续扩大经济规模、增强国力、成为在世界范围内有强大影响力的国家之间的选择。

战后的经济高速增长不仅把日本经济推向了世界经济的前沿，同时也为日本经济社会带来了新的变化。首先，日本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之一，在橄榄球形的社会结构中诞生了 1 亿人口的中产阶级（日本全国人口 1.2 亿）。经济发展的恩惠遍布东瀛各地的同时，人类自身的“惰性”也在勤劳的大和民族中蔓延，日本国民对就业的观念也开始转变，全国非正规雇佣的劳动者不断增加，即便是在学堂里也充满了“快乐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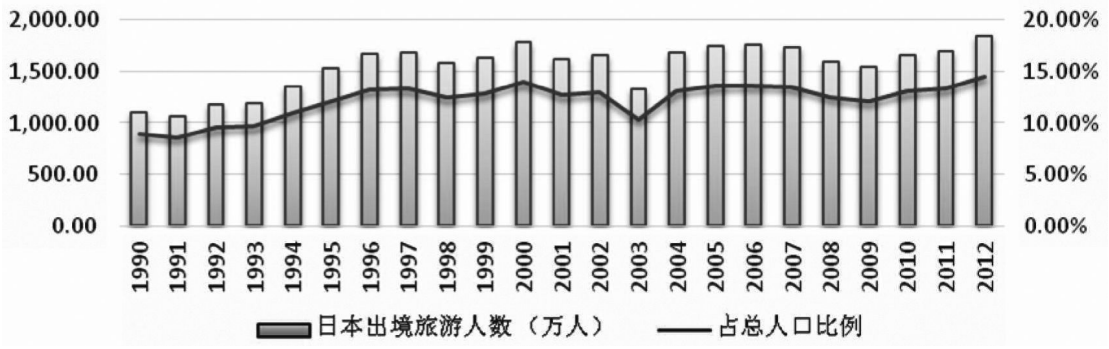
其次，日本已经快步进入了老龄少子化社会。2013 年日本 65 岁以上的老人已经达到 31988000 人，占全体人口的 25.13%；而新生儿的出产只有 1045026 人，出生率仅为 0.82%（参见图 1）。

图 1　日本出生率及老年人口比例（1990–2013 年）



再次，富裕的物质生活促使大批的日本人走出国门，1990 年日本出境旅游人数已经突破 1000 万大关，占全体人口的 8.92%，期间虽然有起伏（受“9.11”事件、非典灾难等影响），但在 2012 年，同人数已经猛增到 1849.07 万人，同比例也上升到 14.60%。与他们的先人在上世纪 40 年代奔走西方列国寻求经营之道所不同的是，这次他们开始体验，甚至是享受世界与日本的差距（参见图 2）。

图 2　日本海外旅行人数及比例（1990–2012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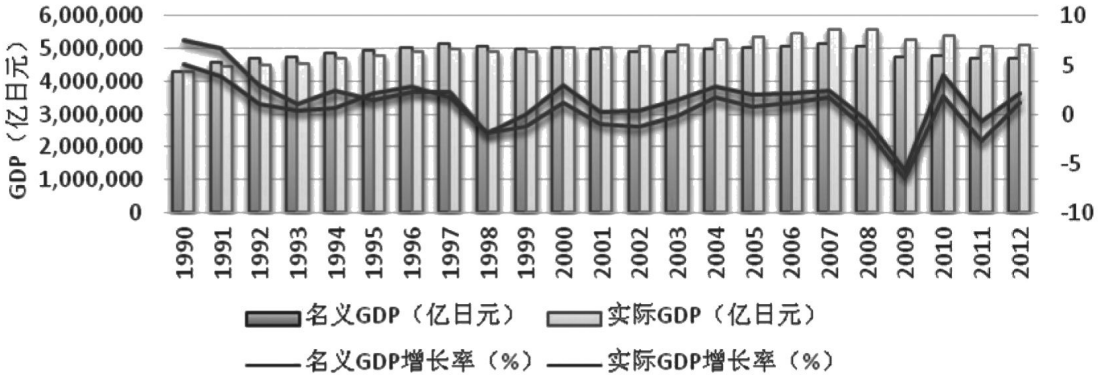
然而，这些在其他国家看来可称为艳羡的社会现象反而为日本经济转型的苦难埋下了伏笔。

（二）宏观经济的“低迷”

90 年代起，日本经济的主要经济指标的确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第一，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已经失去了过往的威猛，经济增长率一路下滑，甚至出现了多年的负增长（8 年为负增长）。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尽管名义 GDP 总量从 1990 年的 4300398 亿日元增长到了 2012 年的 4696032 亿日元（增长了 9.9%），增长不多；但是实际 GDP 总量从 1990 年的 4299855 亿日元增长到了 2012 年的 5110115 亿日元（实际增长了 18.8%）。而且，实际 GDP 为负增长的年份也只有 5 年（参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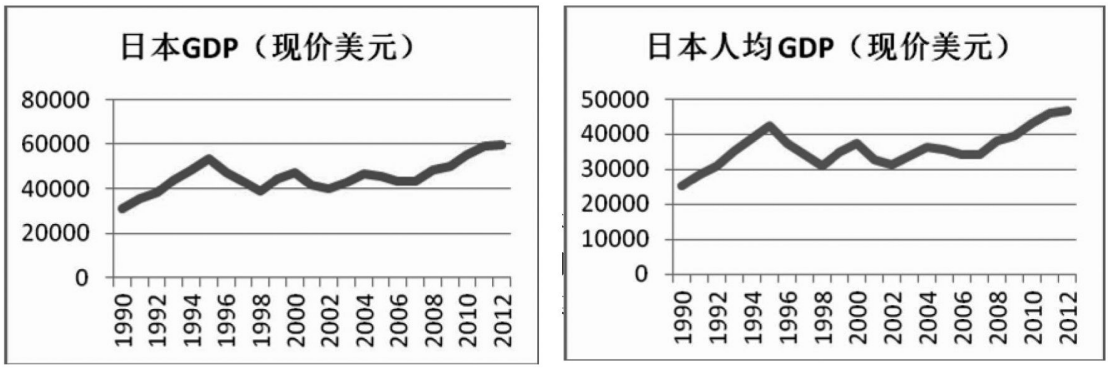
图 3　日本 GDP 变迁（1990–2012 年）



况且，以上的统计数据来自日本内阁府，如果使用世界银行按照购买力平价的美元计算的话，情况就大相径庭。世行的统计显示：日本的 GDP 虽然已经退居世界第三，但是总量依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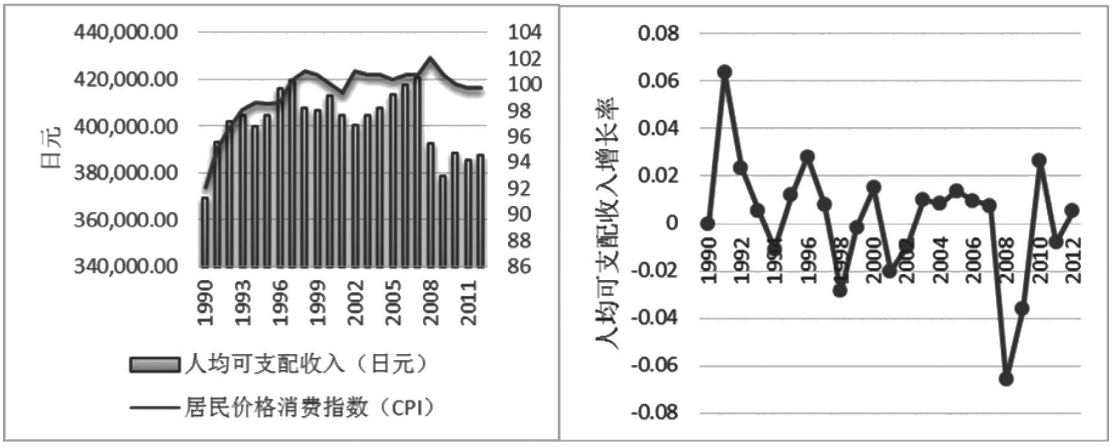
可观，与 1990 年相比，几近翻了一番，人均 GDP 也几乎翻了一番，逼近 50000 美元大关（参见图 4）。

图 4　日本 GDP 变迁（1990–2012 年，世界银行统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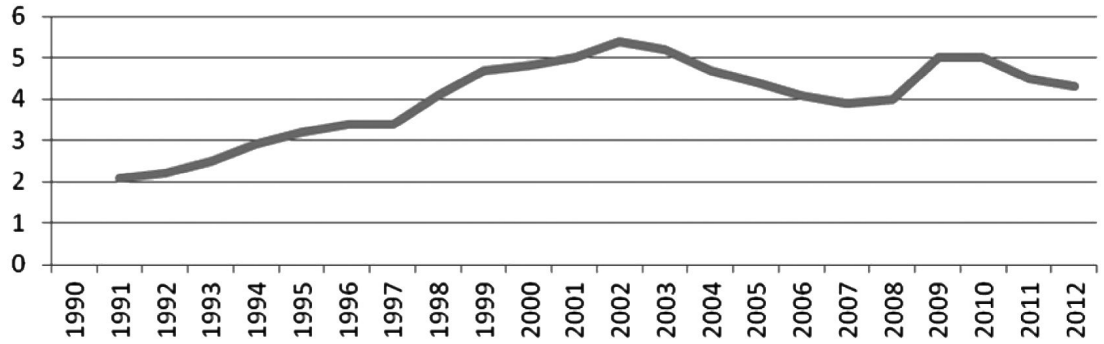
第二，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到 90 年代中期为止还能基本保持上升势头，但是从 1997 年起明显进入了徘徊不前的局面。而同期，日本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的变化也没有太大的减少。事实上在 1990–2007 年之间，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虽有徘徊，但是基本还在上升趋势；而在 2009 年跌入谷底之后也已经开始了反弹，2012 年的日本家庭实际可支配收入还比 1990 年略有所增长（参见图 5）。鉴于长期的通货紧缩、物价 20 年不变（甚至是下降）的实际情况，就国民生活水平而言，日本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差！这也是在日本生活，并没有生活水平直线下滑的实感的原因（注：CPI 采用分段式统计，2000 年与 2010 年为基年）。

图 5　日本历年居民价格消费指数（1990–2012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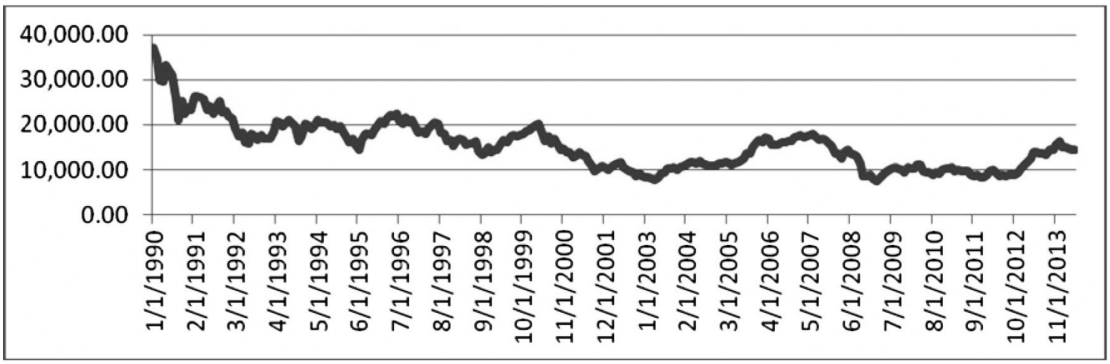
第三，进入 90 年代，日本失业率明显上升，虽然 2002 年开始有所好转，但是与之前的 2%相比，2012 年已经翻了一番（参见图 6）。即便如此，日本的失业率在发达国家中依然是难能可贵的（2012 年美国 7.80%，德国 6.70%）。诚然，失业率的增加并不只是不景气的缘故，与日本社会思潮的变化也有着密切的关联，当今更多的年轻人不愿意被企业制度所束缚，自愿地选择了非正规雇用的就业形式。

图 6　日本失业率变化(1990–2012 年,%)



第四,在众多宏观指标中,股市变化可谓最惨不忍睹。1990 年近 4 万的日经指数最低时跌破 1 万,即便是最近受“安倍经济学”利好政策波及,也仅能够回复到最盛时期的一半(参见图 7)。

图 7　日经指数变化(1990–2013 年)



从以上几项常用的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来看,日本经济的确出现了或多或少“萎靡”的症状。但是,我们换个视角,从“经世济民”这个经济学的原点出发,日本经济的这二十余年并没有给日本国民带来灾难性的后退。从日本实际生活来看:遍及各地的商家店铺,琳琅满目的商品物资,安全安心的低犯罪率(OECD 官网显示 2007–2012 年,日本居民对治安信任指数上升了 4.7%;以 2004 年犯罪率指数为基年 100,2010 年日本犯罪指数为 83;以上指标均远远优于 OECD 平均水平)。可以说,日本国民已经生活在一个世界上最便捷最安全的国度。虽然日本的街道已经失去了往日经济高度增长的激情, 但是平稳地生活也自然有着其独到的宁静与安逸。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泡沫经济后的日本完全可以走一条偏向于北欧发展模式的道路,注重民生营建一个和平的高福祉国家。但是,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的迅速崛起,和日本民族特有的强烈的“岛国危机意识”让日本的精英们开始谋求变革,希望重振日本经济往日的辉煌,这也开始了日本经济全面转型的“折腾”。

(三)产业结构转型的“困惑”

1.产业政策的失灵

日本经济全面转型的磨难首先表现在其产业政策的失灵。这里也许用日本的精英还没

有确定到底想把日本经济引领向何方这个表述更为贴切。泡沫经济后，日本政府先后提出“金融立国”(2004 年 12 月《金融改革计划——金融服务立国的挑战》)、“投资立国”(2005 年春《21 世纪前瞻》)、“观光立国”(2006 年 12 月《观光立国推进基本法》;2007 年 6 月《观光立国推进基本计划》)、“服务业立国”等战略导向,但多是昙花一现。准确地说,日本政府始终在这些新理念与高度成长中屡试不爽的“制造业立国”战略之间举棋不定。

与高度成长期不同的是,日本的大企业已经不需要以往“保护船式”的政府支持,他们已经可以独立门户面对世界的挑战了。诚然,这其中本身有政府与跨国公司之间的“博弈”,日本国内民主化的推进和日本特有的反对“政企”勾结的“洁癖”(1999 年开始禁止企业向政党捐赠)等诸多要因。但是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日本的大企业最擅长的、最具竞争力的、最核心的利益还是停留在制造业上。所以,日本政府 90 年代后推出的各类产业诱导性的政策大都遭到了日本企业的冷落。其中包括冲绳金融特区、新兴产业集群设想等等,而日本政府反复强调的“ALL JAPAN”战略也是响应者寥寥无几。

2.产业结构的变化

从 90 年代后日本产业结构的变化来看,显示出以下特点。

(1)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例逐渐萎缩,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例则保持了逐年递增的势头(参见图 8)。应该说这样的产业人口结构正趋于稳定,也符合经济学的基本原理。2013 年日本从业人口 6311 万人,其中第一产业 233 万人(3.69%),第二产业 1541 万人(24.4%),第三产业 4537 万人(71.57%)。

(2)从日本主要产业在 GDP 所占比重的变化来看,政府机关服务产出所占比重显出增长倾向;非盈利组织产出所占比重也呈现出增加趋势;而产业整体所占比重开始下滑(参见图 9)。其中,制造业所占比重从 1994 年的 22.1%下跌到了 2012 年的 18.2%,其他显现下降趋势的还有农林水产业、矿业、建筑业、水电煤业和金融保险业。而信息通讯业和服务业、房地产业的涨势较为明显。批发零售业和运输业基本保持不变。应该说,第一产业的萎缩和第二产业的下滑以及第三产业的增长符合发达国家的发展规律，而信息通讯业和服务业的迅猛崛起更是经济全球化的具体表现。

图 8　日本产业从业人数及比例(万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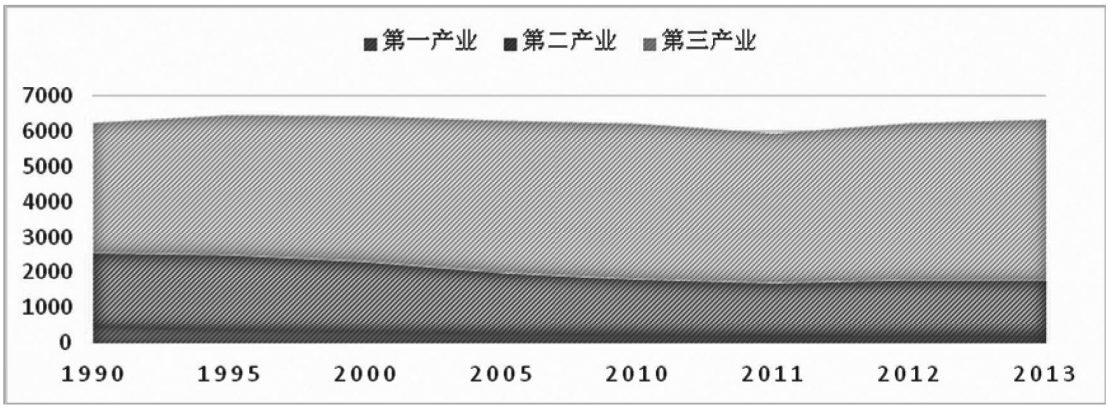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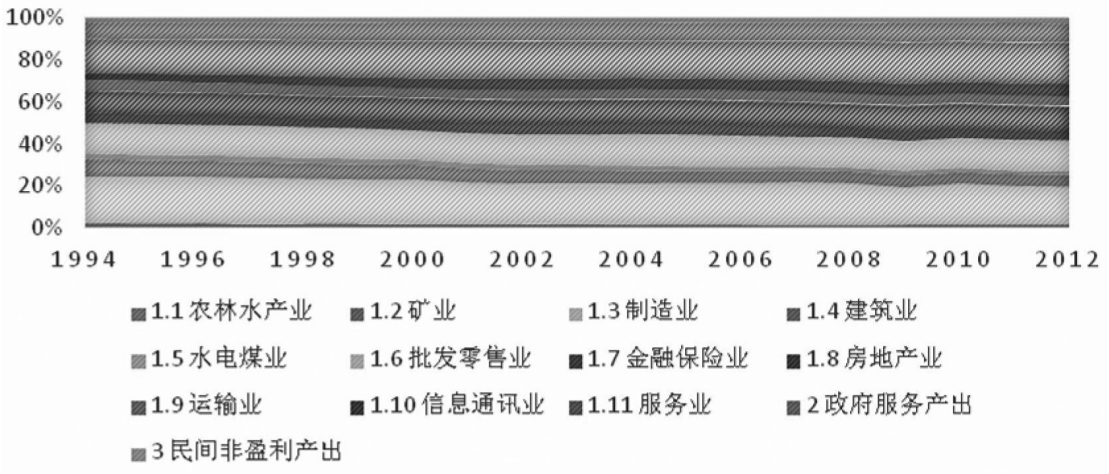


图 9　日本国内生产额在各行业的占比(%)



3.贸易结构的变化

在贸易结构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日本的主要贸易对象也发生了变化。

出口对象排名中,美国虽然依旧保持第一把交椅,比重出现较为明显的下滑;1990 年还未进入前十的中国 2000 年出现在第四位,2005 年开始占据第二位,且占比涨势凶猛。韩国、台湾和香港基本维持了原有的规模。从区域来看,对亚洲地区的涨幅较为明显,而对欧盟的出口比例缩水较为严重(参见图 10)。

图 10　日本主要贸易对象排名的变化(出口,100 亿日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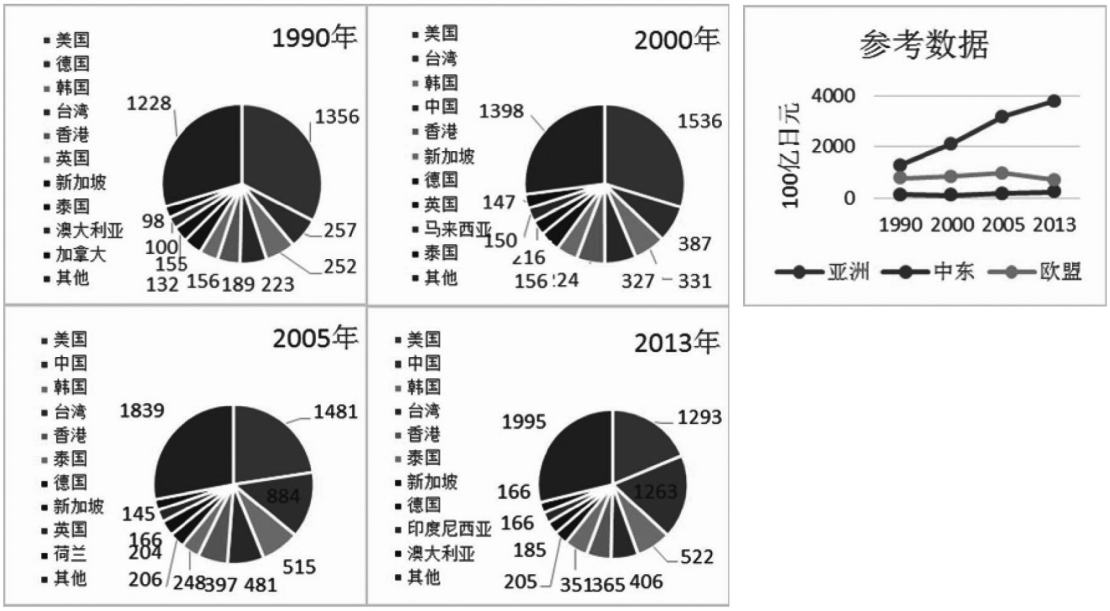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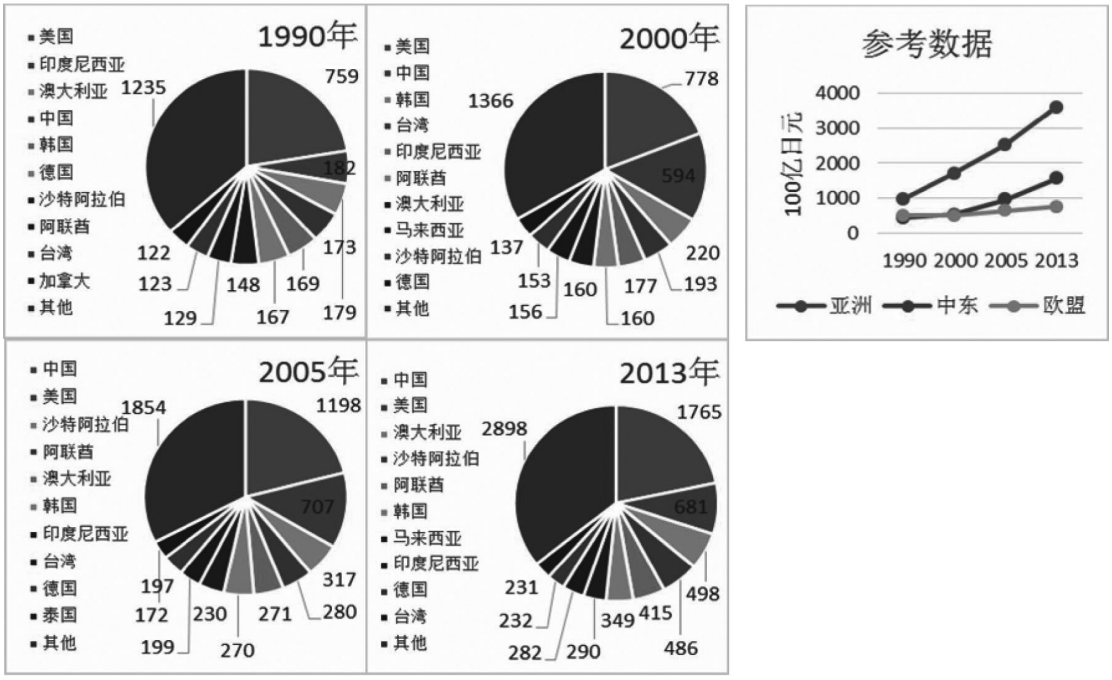


图 11　日本主要贸易对象排名的变化(进口,100 亿日元)



而在日本的主要进口对象排名中,2000 年还处在第一位的美国已经被中国替代,退居第二位;第三位多为原油、天然资源出口大国所占据。整体来看,亚洲、中东比重增加,欧洲比重减少的趋势与出口对象的情况相仿(参见图 11)。

其次,从主要贸易商品的变化来看:1990 年之后汽车始终牢牢地占据着出口产品的第一位;1995 年之后长期占据第二位的电子部件在 2011 年被钢所替代,退居第三;而曾经在 1990 年还排名第二的事务用器械则于 1995 年开始沦为第三,并在 2002 年退出了三甲。而在进口产品当中,原油始终占据第一位。交替占据第二位的衣类及附属品和电子元件在 2007 年之后被液化天然气所替代。1999 年之前还保持第三的水产品也已经在 2000 年早早地被挤出了前三。

4.小结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面临转型期的日本,无论在产业结构的变化中还是在贸易结构的变化中,始终充斥着制造业的身影。泡沫经济的崩溃不但没有削减日本制造业的实力,反而让日本的制造业增添了新的活力。进口能源、原材料和零部件,在添加附加价值之后转卖给全球消费市场的经济成长模式依然在日本根深蒂固。

(四)企业转型的失败

日本产业结构调整的失灵,不光在于政策和产业导向上,其实,1990 年后日本企业自身在几次决定性的变革中也都没有能够尝到胜绩。

1.国际化战略

90 年代后,经济的全球化全面升级,全球产业链重组的需求一浪高过一浪,企业经营也从传统的“规模经济”(规模效应)转向“范围经济”(产业集群),进而步入“连结经济”(全球最优化)。

显然，日本企业没有做好相关的准备，当他们热衷于“范围经济”所带来的效益的时候，欧美企业已经顺利地占领了产业链的顶层，合理地运用全球供应商做到了全球资源最优配置与组合。如汽车行业中，欧美的汽车厂商已经大量实施零部件的模块化，大型部件的外包化和生产的标准化，在降低成本的同时把主要精力投入新技术、新能源的开发甚至向汽车金融等汽车产业的衍生产品和跨领域商业模式拓展。而日本的汽车厂商还沉浸在传统的制造业中乐不思蜀，甚至还纠结于在欧美已经泛用化的个别零部件加工技术的改良。

2.全球标准大战

当欧美企业推陈出新地摆出一套套全球标准，巩固其产业链主导地位的时候，日本企业再度败下阵来。即便是号称“日本品质”的 JIS 标准（日本工业标准）也被欧盟标准的 ISO 所全面代替。日本行业协会内部的勾心斗角和保守迂腐，让他们失去了借助日本产品风靡世界的大好形势确立日本模式成为世界标准的机会。全球标准大战也使得日本在金融大改革中，将“购入原价会计制度”改成了“时价会计制度”，损失惨重。

而在 21 世纪的人才大战中，面对以美国 MBA（工商管理学硕士）为代表的人才教育规范化战略的咄咄逼人的攻势，日本的人才教育再度败下阵来。倡导学术自由化的大学、高等教育机构与日本文部省（教育部）官僚体系的格格不入以及日本式“快乐教育”的恶果让日本企业在人才争夺战中溃不成军。直到这两年，日本文部省才痛定思痛，调整战略推出“全球化 30”（2020 年为止引进 30 万留学生）等计划谋求争取更好的生源来推动日本教育的改革。刻板的法务省也终于配合外务省的引援计划，开始放宽技术移民等高水平人才的引进（如 2014 年 3 月 11 日开始将技术移民的入籍所需时间从 5 年缩短为 3 年等）。但其在国际竞争中的劣势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挽回的。

3.本土化策略

在全球化和全球标准化中屡战屡败的日本企业在本土化的推进中也是接连受挫。小语种的日语受到适用范围等自身的限制，本来就对企业颇多连累。虽然，在日本对外 ODA 的开展中日语得到了一定的普及，并为日本企业打造了不少的海外精英。但是，随着在全球化推进和全球标准争夺中的接连失守，日本企业再度陷入迷茫。文部省开始转向强推英语教育的政策削减了海外日语推广的经费，论资排辈的企业高层又大多不善外语，加之日本国内生活条件日益完善年轻人都不愿出国留学（日本文部科学省统计，2010 年日本共 58060 人赴海外留学，其中赴美国留学 21290 人，中国 16808 人，英国 3851 人。同 2009 年相比减少约 3.1%），这也导致日本企业在语言上的劣势更加雪上加霜。

一方面海外当地的高级人才由于语言障碍与总部的沟通不畅，另一方面又没有决心对当地的高级人才全权委以重任，在全球开展业务的日本企业的本土化进程步履艰难。虽然，出现了 NEC、东芝等大公司委任外籍人士担任地区总负责人的个案，但是就日本企业整体而言，实在是凤毛麟角。“争取全球化人才，培养全球化人才”的决心也多只能停留在口号上。

4.日本式经营三种神器的失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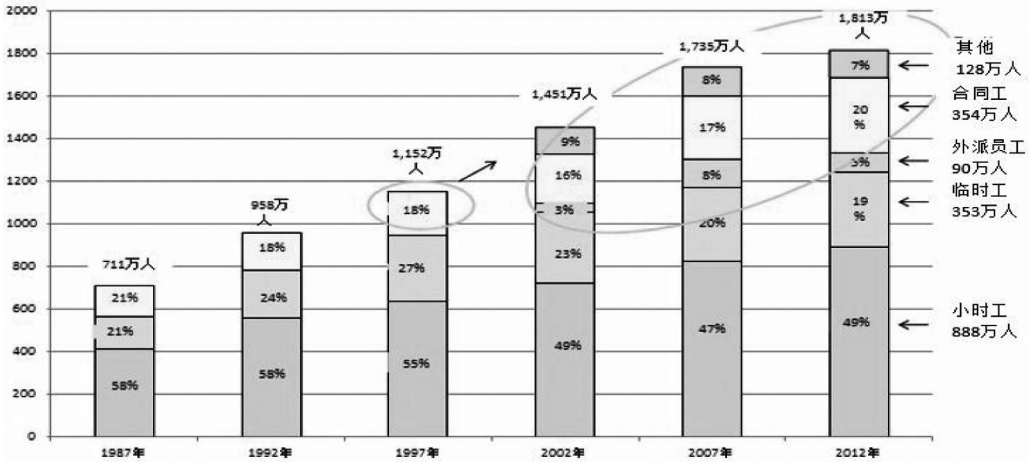
除了企业对外部环境变化的不适应之外，日本企业自身的内部经营也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瓶颈。80 年代所向披靡的“日本式经营三种神器”（在下请系列中的终身雇佣、年功序列、企业工会）也开始失灵。

自财阀解体后，靠金字塔形下请系列（带有资本、人员参入主导经营的日本式外包）开始出现松动。金字塔底端的中小企业开始谋求“资金上的独立”、“技术上的独立”，甚至是“战略

上的独立”。特别是日本中小企业的海外拓展已经由被动式地跟从“亲公司”(下请系列中的顶层企业)向独自发展转变。在汽车行业中,甚至出现了下请系列无奈解散的情况。如日产和马自达先后解散了原下请系列中的“协力会”(零部件供应商联合会)。这给长期以来以稳定的固定交易伙伴促进关联企业共同发展的日本企业发展战略带来了更多的“动荡”。

而年功序列(论资排辈)的企业内部晋升制度,也越来越多地受到日本年轻人的抵制。欧美企业能力主义的薪酬体系逐渐开始被日本国民接受,不少日本代表性的企业开始使用欧美企业惯用的年薪制度、绩效考评制度。日本经济社会中的“就社”(进入一家企业工作到退休)开始向真正的“就职”(一生从事一项工作)转变,日本劳动力市场的封闭被打破,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也出现了大幅度的松动。随之而来的是近年日本非正规雇佣人口的激增(参见图 12),与 1987 年 711 万人相比,日本非正规雇佣人数增加到了 1813 万人。这也大大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准确地说,非正规雇佣员工及其家庭的生活水平大大低于正规雇佣员工,这部分的人群应该是受到经济不景气冲击最大的日本人。

图 12　日本非正规雇佣比例变化



至于原本就是一团和气、极其弱势的日本工会,在“失去的二十年”中更是疲态尽显,现在连组织“春斗”(每年春季定期要求工薪上涨的工会活动)的气力也没有了。

“日本式经营三种神器”的失灵直接给转型期的日本企业带来了更多的苦恼,加之原本就饱受非议的经营决断能力、战略应对能力等问题,内忧外患中,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也直线下滑。

5.产品结构调整

由于日本有 1 亿的中产阶级,日本企业面对国内市场必须不断推陈出新,尽量缩短产品周期以谋求能够满足这些中产阶级需求的产品,而随着日本国内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扩大,表现在产品上就出现了“单一产品大量生产”向“多品种少量生产”的转变。在这样的转变中,依然要维系日本国内产能过剩的“同质企业群”(运用类似技术生产类似产品的企业群)显然很不现实。

于是更多的企业把视线转移到了国外,但是面向日本国内的产品结构在面对全球市场的应对上又出现了问题。面对贫富差距日益增大的海外市场,在新产品开发、新技术引进等方面被欧美企业甩在了身后的同时又不得不面对发展中国家企业紧追不舍的日本企业显然

没有显示出足够的机动性。特别是在新兴市场,欧美企业往往依靠强大的品牌战略推出高端产品迎合高收入人群;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则聚焦低收入人群生产大众化产品。习惯于国内面向中产阶级的产品设计和推广的日本企业又陷入了高不就低不及的尴尬境地。如在汽车行业中,日系汽车在与欧美系列的竞争中输在品牌上,而在与发展中国家企业的竞争中又输在价格上。

6.小结

由上所见,无论是面对全球市场的变化,还是企业内部的改革,日本企业的转型都屡屡受挫,高度经济发展期培育的强大的生产力正面临着最大的危机。如 90 年代日本拥有十大汽车厂商,但是在全球化兼并浪潮中现在仅剩下了丰田、本田和富士重工,连老牌的三菱汽车也是几经转手,失去了往日的威风。

(五)安倍经济学的最新动向

面对经济宏观指标的不如意,产业结构调整的彷徨,企业战略调整的无力,日本的精英们开始给日本经济注入了“猛药”,以求起死回生,“安倍经济学”应运而生。

“安倍经济学”的主要经济政策被称为刺激日本经济的三支“利箭”,分别是:大胆的金融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和吸引民间投资的成长战略。其中第一支箭和第二支箭是实现第三支箭的基础,而这三支箭最终的目标,是在 10 年内达到平均每年名义 GDP 增长 3%,实际 GDP 增长 2%,人均 GDP 增加 150 万日元的效果。

该政策实施 1 年以来,日本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持续 15 年的通缩格局。其中,第一支箭实施的结果是日元贬值 21%以上,物价仅上升 0.7%;第二支箭的公共投资其效应根本没有显现出来;而第三支箭的实施更是遥遥无期。因此,2014 年日元贬值空间已经有限,依靠输入型通胀提升物价的可能性已经非常小,而货币政策对物价调控功能已经微乎其微。即便是继续实施第二波量化宽松,其效果如何也难以把握。从目前来看,日本的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安倍经济学”很可能在消费税税率上调后“寿终正寝”。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高达 240%的国家债务问题会日益凸显,悬而未决的债务风险随时都可能给日本经济致命的一击。

(六)总结与政策建议

诚如上文所言,目前困扰日本经济转型的问题很多,有国家政策层面的问题,也有产业层面的问题,还有企业层面的问题,其中更夹杂着“债务危机”、“国内产业结构的重组”、“老龄少子化”、“产业空心化”等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都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根治的。究其根本,转型的方向是关键,如果日本依然举棋不定,势必会加剧这些问题的恶化。因为,日本国家的走向将直接决定日本国内市场的供需条件,而市场供需失衡才是日本经济“失去的二十年”的根本要因。

深处转型期的日本经济自然诱发了日本社会整体的动荡, 也给中日两国关系蒙上了阴影。从这个视角出发,深入了解日本经济的实际情况、及时把握日本经济的走向对改善中日两国关系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首先,必须清晰地认识到,中日两国的共同利益更多的还是体现在经济利益上。虽然中日两国的经济关系已经从单纯的相互补充开始向合作型的相互竞争关系转变, 但是在今后较长的一个阶段还是存在诸多共同利益(如中日韩 FTA 等)。

其次,日本国内政经分离趋势十分明显,而日本的经济界又有着和中国合作的实际迫切需求,应该合理运用政府与跨国公司之间的矛盾,分清敌友,区别对待。这里特别值得关注的

是,安倍二次掌权后日本企业中亲中高层开始出现失势的情况,令人担忧。

再次,90 年代后,日本经济始终是日本国民衡量日本政党执政能力的风向标。掌握日本国民对日本经济的理解情况,也可以洞悉日本政治的走向。而转型成功与否更会受到媒体舆论的左右,帮助日本国民正确理解日本经济所面临的深层次根本问题也许可以成为一种外交新手段。

最后,“安倍经济学”只能带来一时的痛快,解决不了日本经济的根本问题,而其主打经济牌的周边外交并不完全奏效。“金钱外交”的成败关键还是在于经济合作领域的战略设定和具体的合作项目是否可以真正实现互利互惠。如何合理运用经济牌,结合新丝绸之路以及金砖五国等新思路和新经济制度开创符合中日两国共同利益的经济合作新模式,应该是当前极为紧迫的研究课题,也是中日经济合作共赢的新思路、新方向。能否把握住机会,现在实际上球在日本手里。而期待在政治外交军事上制衡中国的同时,又能从中国获得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无疑不仅做不到,反而只能把中日关系带入死胡同。安倍政权的对华战略思维,做到彻底改弦更张很难,但应该到了调整之时。

(专题三:社会与文化)

从社会思潮的流变看日本社会政治倾向的演变

(一)所谓现代的日本社会思潮

某一国家的社会思潮,反映了一定的历史时期内,这一国家的国民对社会现实的实际感应和价值取向及价值判断。虽因国民的阶层阶级不同,其利益诉求也会有相当的差异,但每一个社会,总会在一定的阶段形成相对主流的社会思潮,反映在政治领域和对外关系上,更多的是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相关联,当各种社会思潮呈现出一种相对的趋同性时,就应该引起人们高度的关注。因此,对战后,尤其是冷战结构解体、日本经济总体陷于低迷时期的日本社会思潮进行梳理和剖析,有助于我们观察日本社会的内在结构究竟出现了怎样程度的变化,各阶层国民的利益诉求表现在哪些主要的层面,在对世界和周边国家的认识和应对上会出现怎样的趋向。

如果将战后日本的社会思潮简单地分为左翼和右翼的话,左翼主要是指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右翼主要是指强烈的国家主义和激进的民族主义思想,居于中间的,还有秉持西方自由主义精神的、具有民主主义倾向的、相对理性和中庸的政治姿态。在右翼的最极端,还存在着极端的、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思想,罔顾基本的国际准则和人类的普遍利益,将本国的国家和民族利益放大到了极致。这些表现为不同政治倾向的社会思潮,即反映了不同社会背景、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的价值取向,它在战后的日本历史长河中,根据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和国际环境的变异,也会出现相应的此消彼长,从而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形成相对主流的某种社会思潮。在考察这些日本社会思潮时,我们还必须充分注意到日本独特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其价值判断的表现,往往有这些精神和文化作为其底蕴。

现代社会思潮,主要通过各主要社会媒体,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书刊以及近年来兴起的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各种新媒体的言论表现出来。

(二)冷战结构解体前的主要社会思潮

1945 年日本战败以后,由于波茨坦公告精神的宣传和落实以及美国占领军对战争时期

极端国家主义思想和势力(包括经济领域)的清算,战前和战时甚嚣尘上的国家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势力受到了打击,加之被压制长久的左翼势力的复活,遭受战争磨难的一般国民对既往战争的反省和思考,一时间和平主义思想代表了大多数民众的利益诉求。但随着冷战格局的形成和朝鲜战争的爆发,在美国的扶植下,具有反共色彩的右翼势力重新抬头,55 年体制形成后,中间偏右的政治势力长期主持了日本的政治舞台。但是在整个 1950 至 1960 年代,具有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或自由主义精神的思想,依然是社会的主流,历史学家井上清和家永三郎等是前者的代表,他们看到了近代日本的帝国主义性质,对此有较为深刻的批判;思想家丸山真男等是后者的代表,他们更多地从江户时期以来日本思想的底流来把握日本民族在近代的命运的某种必然性。而 60 年代前期轰轰烈烈的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民众运动,则汇集了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等与右翼相对立的各种社会力量,其参加者主要是大学教授、学生、自由职业者以及以部分劳动阶级,代表了当时社会中坚力量的声音。

同时,战前和战时的国家主义和偏激的民族主义势力远远没有泯灭,战争时期曾是国家机器一部分的政治人物在受到短暂的冷落后立即重新活跃在战后的政治舞台上,当上自民党总裁并成为首相的岸信介是最典型的代表。而在知识界或舆论界,在 20 年代末期曾是左翼文学家、入狱后转向成了当局意识形态吹鼓手、战后仍然坚持其右翼政治立场的林房雄,在 1963 年出版了一部厚厚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即是这一思潮的有力体现,决不可将这种肯定侵略战争的认识简单地理解为一小撮右翼分子的狂妄之举,它实际上标志着明治以来不惜以帝国主义的方式追求强国或大帝国之梦的激进民族主义意识已在相当程度上深入到了一部分日本国民的骨髓,一旦出现了与之相适合的社会环境和国际氛围,这种情绪或意识就会急剧膨胀,从而再次成为主流社会思潮。

80 年代前期,日本经济发展的奇迹引起了全世界的惊叹和赞美,在某种程度上,日本成了一个模范国家。它的企业文化、经济管理模式首先受到了欧美先进国家的关注和研究,它在世界上、尤其是东南亚地区,受到了人们的仰视,资本和技术的输出、ODA 援助的实施,使得日本由此奠定了它在东亚区域的经济领袖地位,日本的古典文化随同它的流行文化风靡全球。此时,对日本民族精神的内省、对近代日本的批判性思考已经大为减弱,战后一个时期曾经有较大势力的左翼力量,在富裕的中产阶级迅速成长起来之后,逐渐走向衰弱。随之而起的是日本要成为一个政治大国甚至军事大国的欲求,在民众中滋生开来。曾三次组阁的中曾根康弘政府,明确提出了“回归保守”的口号,中曾根提出的另一个理念是“健康的民族主义”。因为民族主义一词在战后一直带有一定的贬义色彩。中曾根企图用“健康的”(日文原文是“健全的”)这一定语赋予它新的意义。1985 年 10 月,他在外国记者俱乐部会见记者时说:“我认为,我们必须要有具有自信心的民主主义的基石,而构成这一基石的另一方面是健康的民族主义。”基于这一想法,中曾根在日本推行“战后政治的总结算”,力图修改宪法,努力摆脱战后美国的影子,因此,他强调要确立“日本的国家定位”。1985 年 7 月,他在法国索邦大学作演讲时指出:“已经占了世界经济一成水平的日本,却还缩在远东的一个角落里,如同与国际社会无缘似的,我们不能再对承担国际义务和责任闭目无视了。”(中曾根的言论等引自日本历史科学协议会编的《日本现代史》461–462 页,东京青木书店 2001 年)有日本学者评论说,中曾根的这些言论表明,作为经济大国的日本,应该具有领袖国家一员的自觉,来承担相应的作用和责任。为鼓起日本民族的自信心,中曾根甚至以首相的官方身份第一次参拜了列入了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中曾根的言行虽然受到了左翼和一部分中道力量的批评,但

还是受到了日本国内舆论较为广泛的好评，这也说明了中曾根的大国主义政策，表达了相当一部分国民的心声。

（三）冷战结构解体后、尤其是近年来日本社会思潮的主要表现及其分析

进入90年代以后，日本的内外局势出现了两个新的变化。国内是繁荣一时的泡沫经济崩溃，日本经济进入了长期低迷状态，80年代的自豪感严重受挫，民众中出现了迷茫和焦躁的情绪；国际上，一方面是苏东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东西方严峻对立的格局由此消解，另一方面是，中国经济开始强劲发力，到了21世纪以后，出现了明显的崛起态势。

这些国内和国际局势的变化，使得日本的社会思潮出现了新的动向，尤其是对中国的认识和姿态上。中国在经济发展上对日本资金和技术的需求在相应减低，而日本对中国市场（包括投资市场）的依存度在提升，而随着中国在海外的市场扩展，尤其是能源市场的确保和海外投资的增长，原来互补性很强的中日经济，在进入21世纪以后，尤其是近年来，呈现出明显的竞争态势。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上仍然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在冷战格局解体、社会主义力量大退潮后的西方世界眼中，其不协和性也日渐突出。起始于90年代中期的“中国威胁论”卷土重来，加剧了中日之间的不详和气氛。2009年9月，民主党政权上台，鸠山首相出于国际关系平衡的考量，提出了建设“东亚共同体”的设想，中日关系稍显缓和，但这并未改变中日之间结构性的内在矛盾，2010年因为钓鱼岛撞船事件的爆发和中国经济总量首次超过日本而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使得中日之间内在的结构性矛盾进一步加剧，终于在2012年因日本推行钓鱼岛国有化的行为而导致了日中之间的全面对立。因历史认识的差异和领土问题的争端，日本国民对于中国的对立情绪空前高涨。在这样的背景下，强硬的安倍政权赢得了大多数日本国民的喝彩声，与之相呼应的社会思潮，也越来越朝着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方向转化。

这些社会思潮，在对外关系上，出现了如下的新动向，即近年来日本社会思潮中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倾向。其矛头的对象，已经从早年的美国或部分的苏联完全转向了今日的中国。战后不久，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倾向一直存在于日本社会的部分阶层，它主要来自左右两个方面。以社会民主主义为主要指向的左翼力量一直对于美国试图将日本塑造为世界反共阵营中的中坚力量的政策抱有强烈的抵触感，并由此引发了对追随美国政策的本国政府的反抗，60年代的反安保民众运动就是这一思潮的集中体现。随着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实现和富裕的中产阶级的迅速成长，一般民众的反美情绪得到了大大的缓释，来自左翼的反美声浪渐趋衰弱；以国家主义和皇道思想为指向的右翼力量，对于美国影响中的现代民主理念、对战前日本的否定和军事上对日本的掌控政策的反抗，在战后一直存在，主要体现为对战后和平宪法的不满。80年代初期日本实现了经济大国并跻身七国集团的行列，这一脉的力量越来越表现出要挣脱美国、再度成为独立的强大帝国的反美倾向，石原慎太郎与人合著的《可以说“不”的日本》（1989年）、《依然可以说“不”的日本——日美之间的根本问题》（1990年）、《可以坚决说“不”的日本》（1991年），可以说集中体现了这一思潮的声音。冷战结束后，苏联或俄罗斯在远东的影响力迅速消减，与此同时，中国的力量迅速崛起，最终于2010年在经济体量上压倒了日本，并在地区乃至世界事务上日益发挥着主导的作用，这使得日本人感到追求政治大国的欲望受到了挫伤，成为地区领袖的企图受到了严重的挑战，日本人觉得自己的发展空间受到了日益增大的中国的严重挤压，因此自90年代随着经济低迷而开始萌发的焦虑感、烦躁感或者说躁动不安的情绪开始转而向中国发泄，甚至希望借助美国的力量来

与中国抗衡，具体表现在企图对侵华历史的否定和在钓鱼岛等领土问题上的强硬态度。

对华强硬的社会思潮的内在思想资源，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第一是基于近代以来日本人追求地区和世界强国的政治理想，其主要的内涵是“皇国”和“帝国”思想。皇国思想又与“神国”思想紧密相连，最初的根源，来自江户中期由本居宣长和平田笃胤倡导的“复古神道”，欲以日本的国粹来排斥外来的儒教、佛教等文化元素，在近代就演变为“国家神道”，后来又与对外扩张的“帝国”思想合为一体，追求所谓“八纮一宇”的政治构想，导致日本在近代走上了帝国主义甚至军国主义的道路。作为一种政治机制，帝国主义与军国主义自然在战后遭到了全世界的唾弃，但其思想的余脉，却依然盘根错节地在一部分具有国家主义思想的民众中得到了沿承。80 年代日本经济的兴盛和国家的繁荣，促进了日本国民民族自豪感的高扬，使这一思想以温婉的形式（日本民族优秀论、日本文化优秀论）重新张扬了起来，也激发了一般国民重塑地区大国乃至世界大国的欲求。中国的强势崛起以及对日本的阻遏，直接阻挡了具有这样情结的日本国民的政治理想的实现，由此激起了他们对华的强硬姿态。第二是自欧美传入的自由民主人权等西方近代思想。这一思想在明治时期即已萌生，经思想启蒙运动引发了自由民权运动，最后促成了宪法的制定和国会的开设，以后又有大正时期的民主运动和短期的政党政治，但这些思想和实践在强大的天皇统治以及日后专权的军部势力面前都惨遭失败，战后对战前体制的清算和保障民权的新宪法的制定，以及实际的民主政治的运作，使得战后出生或成长起来的新生代，都比较认同西方的普世价值观，以此作为参照系来反观中国，他们便觉得中国依然处于威权主义时代，1989 年的政治事件曾经在日本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一般国民对华感情的恶化，1989 年是一个转折点，由此对于中国体制的批判，一直不绝于耳，以致在今天的日本国民中，意识形态的对立，已经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安倍政府的所谓价值观外交等，就是利用了国民中的这一思想倾向。这两种思想资源，一个源于日本本土和日本人的内在精神，一个起始于近代，来源于西方的传播，两者交织在一起，成了排斥和批判中国的重要思想资源，也构成了与中国对抗的社会思潮的思想底蕴。

（专题四：大众传媒）

日本媒体报道的态势（右倾化）与中日关系的走向

（一）引言

2014 年 3 月 3 日，一个由日本律师、教授等组成的市民团体，向 NHK（日本放送协会）现任会长籾井胜人寄出了要求其立即辞职的劝告书。该团体还表示，如果籾井拒绝辞职或免职的要求，他们将拒绝支付 NHK 收视费用。这份劝告书，在 NHK 因高层言论右倾引发“信任危机”的当下，一石激起千层浪。此前，1 月 25 日，NHK 新上任的会长籾井胜人在就职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声称：“慰安妇哪个国家都有……国家让你向东你总不能往西吧？”不久后，NHK 经营委员长谷川三千子和百田尚树先后发表“不存在什么南京大屠杀，美国向日本投放原子弹才是大屠杀”等言论。

将“政治中立”视为立身之本的 NHK 高层“雷语”频出，举世震惊。事实上，NHK 的一系列“失言风波”并非孤立事件。自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台后，一些日本媒体的“右倾化”现象已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日本媒体“向右转”，无疑与安倍政府的政治操控有关。在右倾抬头的当下，日本媒体是否会再次走上为军国主义“招魂”之路？安倍执政以来日本媒体报道体制

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日本民众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些都有必要进行研究。

（二）日本媒体的报道体制及其近年来的变化

近年来，从很多新闻报道中都可以看出，日本媒体已经存在对华报道存在负面、虚假新闻偏多的倾向，逐渐偏离所谓的“平衡”，原因有哪些？在日本“向右转”的过程中，日本媒体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日本媒体“向右转”，首先可以从他们特殊的媒体机制中寻找原因。日本媒体历来重视对政治领域的报道。一个典型例子是“记者俱乐部报道机制”。在日本的每个政府部门（如外务省、大藏省等）中，都有这样一个办公室，里面有书桌和电脑。每个媒体都会派一名记者常驻这间办公室，一旦该部门需要发布新闻，就由记者俱乐部的记者进行报道。因此，各家媒体对政治报道的口径往往高度统一。这种西方国家极为罕见的记者俱乐部机制，使记者和政府部门的关系非常紧密，也很容易使日本媒体受到政府的影响。

其次，日本媒体都是具有垄断性质的大集团，一个集团下包含电视台、报纸和文化出版业，这些大集团相互鼎立，有学者把它称为“系列”体制。比如，《读卖新闻》和日本电视台是一个系统的，《每日新闻》和 TBS 电视台是一个系列的，产经新闻和富士电视台是一个系统的……它们关系非常密切。也就是说，当其中的某一家报纸右倾的时候，其所联动的电视台等也会右倾。媒体的集团化和记者俱乐部，从体制上阐释了当日本政府要对媒体施加影响时，为什么媒体很容易出现一边倒的情况。

在当今日本右倾的大环境下，媒体要“独善其身”，保持中立或清醒，确实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日本的右派团体非常激进，如果媒体发布了左倾言论，右派就会采取一系列过激手段，比如放炸弹、集会、游行，或拒绝订阅报纸。这使得媒体遇到了一个尴尬的现状：右倾没问题，公正却可能惹来麻烦。

这一倾向尤其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台后显现，他采取了具有鲜明“安倍特色”的媒体策略，并且较为明显地体现在了 NHK 的改变上。受此影响，NHK 高层右翼言论频出，会长籾井胜人表示 NHK 的国际报道“自然”要“同政府立场一致”，节目内容“至少不能偏离日本政府观点”，在战后日本媒体的发展史上更可谓具有“颠覆性”。这些言论引发了人们对一直以政治中立为运营方针的 NHK 的公信力的质疑。作为公共广播机构和日本媒体代表的NHK 产生如此乱象，引人深思。

众所周知，NHK 是依靠政府拨款和民众收视费维持的公共电视台。依照《放送法》第 64 条第 1 项，NHK 每个月要收取观众的收视费，这是其收入的主要来源。收费是以家庭为单位，含卫星电视在内，年费一般在 25000 日元左右，合人民币 1500 元。NHK 对收视费的倚重，也远远超过对国家拨款的依赖。NHK 的这种“民众性”，是其保持客观公正的根本。

但安倍上台后，这一局面发生了很大改变，这源于安倍晋三特殊的媒体观。2014 年 2 月初，他在 NHK 的经营委员会安插了自己的亲信。这一举动，使 NHK 被认为是安倍的“右翼传声筒”。而安倍则认为，政府出资了，自然有权利要求 NHK 更多地站在政府的立场来报道。因此，他加大了对 NHK 的掌控，并开始控制日本的舆论。

在 NHK 事件中，不是没有反对的声音。2 月 10 日，日本记者会议要求 NHK 新会长籾井胜人辞职，以及将安倍的亲信百田尚树和长谷川三千子踢出 NHK 的经营委员会。不过，如今安倍政府右倾明显，自民党官员又在政府的各部门身居要职，在掌权者步调一致的情况下，

要改变现状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不过，就 NHK 的公营性质而言，它与国家直接运营的国营媒体不同，也与日本大多数自谋生路和能自主决定广播节目的民营媒体不同，比较接近英国的 BBC、德国的 ARD 和韩国的 KBS。根据日本的法律，作为享有国家财政补助和免税等权利的代价，公营媒体的事业预算和节目编辑方针等都须国会承认或反映国会及执政党的意向，所以籾井是想打一个法律底线内的“擦边球”。

另外，会长在 NHK 的地位相当于 COO（最高执行者），其权力在经营委员会和监查委员会之下，经营委员会的委员长才是 CEO（最高经营者），而最近该会主要干部 10 名理事全体辞职，可视为该机构的自律和经营高层对来自财界的“外行”会长的集体抗议。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战后 NHK 在报道活动中总体上是恪守中立和客观的原则立场的，这在国际社会已有一定的评价，最近籾井的发言致日本国内外舆论哗然，其实正好证实了该媒体机构对长期奉行的报道姿态的背离。

当然，和战前相比，日本媒体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媒体大多具有独立的经营权，也形成了成熟的独立办报理念。日本媒体的宗旨是促进政府为民众服务。可以说，日本媒体以读者为本的办报理念，是传统媒体至今极具生命力的缘由。因此，就目前而言，政府对媒体施加的影响应该是有限的。

在形式上，战后日本的言论自由、报道自由已由宪法条文明确加以保证。因经历过“言论统制”和由此招致的黑暗历史的苦痛，日本传媒界整体上对政府干预言论的活动有着很强的警觉和抵制意识，对监督政府依然具有使命感。这是我们当前对日本媒体“谨慎乐观”的一面。

当然，同时应看到，日本传媒界也存在着各种“自主规制”的禁忌。主要有“菊花禁忌”，不报道关于皇室的负面新闻等；“樱花禁忌”，控制对警方或警察组织的报道等。此外还有，“在日韩国和朝鲜人禁忌”、“记者俱乐部禁忌”等。

（三）日本民众对华观（形象）的变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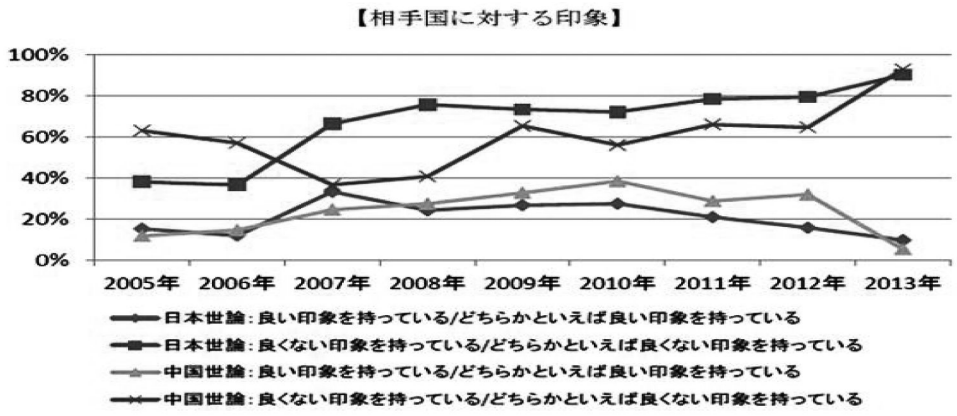
当前，单纯期望日本媒体能做到真正的客观中立，已经不太容易。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媒体引导角色的不充分。

中日民间高峰对话“北京-东京论坛”的日方举办单位——日本民间非营利组织言论NPO在2013年8月曾经做过一项关于日本媒体现状的调查，受调查者为日本社会的精英分子。结果显示，有高达七成的受访者认为，在中日关系上，日本媒体当前的报道姿态并不够客观。同时，也有近七成的受访者期待日本媒体能够在右倾化环境下，报道与政府不同的声音，起到平衡的舆论引导作用。当然，这并不容易做到。这与日本媒体在体制上存在局限性，使得平衡报道陷入了一定的困境有密切关联。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解释这一现象：即，单纯反映民意；“民意政治”面前被动地存在；媒体从业人员从本身价值判断出发，难以超越国家利益做到新闻报道的真正平衡。

日本媒体的这一倾向直接影响了日本民众对于中国的看法或形象。以日本言论NPO所做的调查可以获知，2013年日本人对于中国的印象与2012年相比又大幅度下降了，对中国抱有“不好印象”的日本人的比例达到了90.1%，创造了历史的最差纪录（参见图1）。

当问到对目前的中日关系，持何种看法时，近八成的日本民众表示“比较不好”和“不好”，这一比例也是前所未有的，从一个侧面也表明中日关系已经到达了一个冰点（参见图2）。

图 1　日本国民对中国的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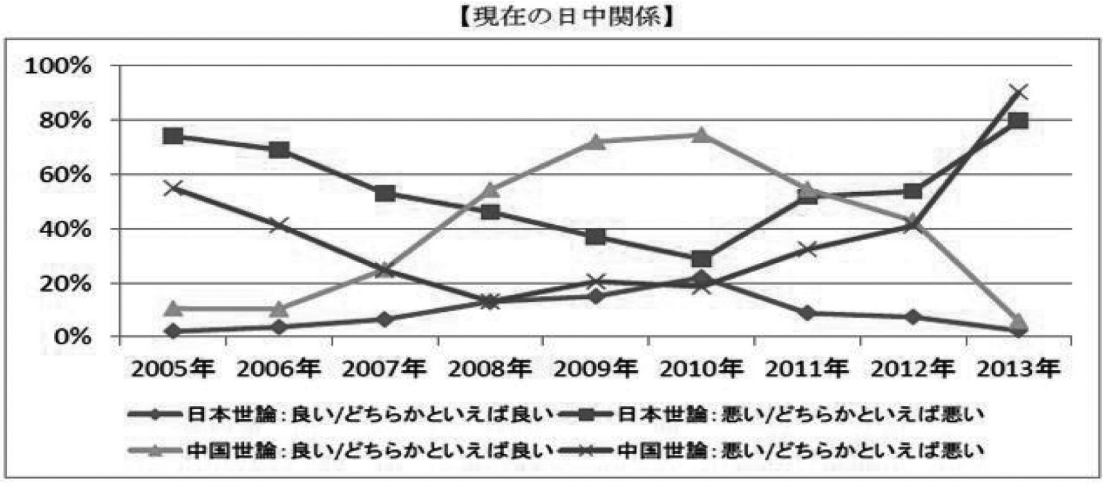
日本

		良い印象を持っている	どちらかといえば良い印象を持っている	どちらかといえば良くない印象を持っている	良くない印象を持っている	無回答
世論	13 年	1.0%	8.6%	64.3%	25.8%	0.3%
	12 年	2.3%	13.3%	66.7%	17.6%	0.1%

中国

		良い印象を持っている	どちらかといえば良い印象を持っている	どちらかといえば良くない印象を持っている	良くない印象を持っている	回答拒否/わからない	無回答
世論	13 年	0.3%	4.9%	35.3%	57.5%	2.0%	0.0%
	12 年	1.5%	30.3%	45.0%	19.5%	3.7%	0.0%

图 2　目前的中日关系



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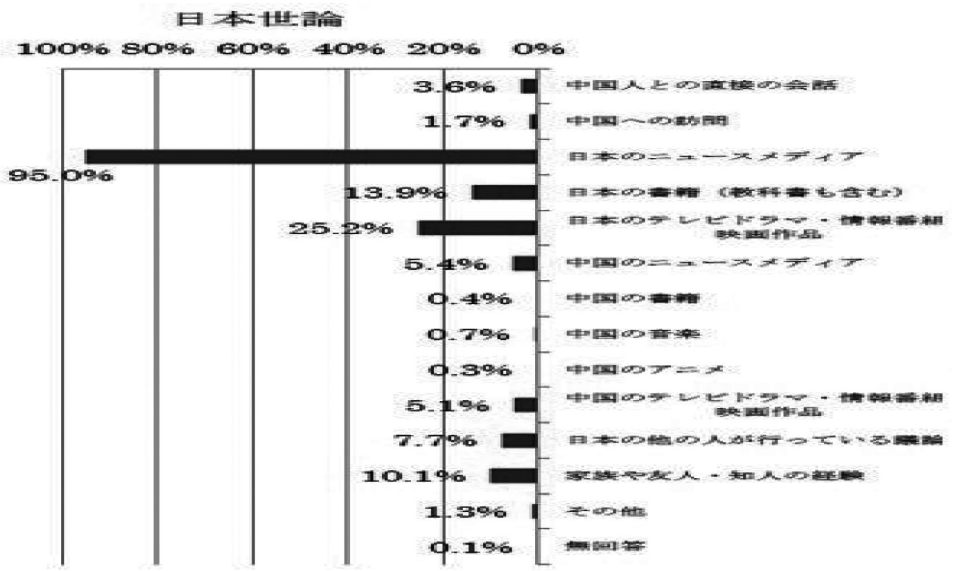
		良い	どちらかといえば良い	どちらともいえない	どちらかといえば悪い	悪い	無回答
世論	13 年	0.2%	2.2%	17.6%	55.2%	24.5%	0.3%
	12 年	0.2%	7.2%	38.9%	47.9%	5.8%	0.0%

中国

		良い	どちらかといえば良い	どちらともいえない	どちらかといえば悪い	悪い	回答拒否/わからない	無回答
世論	13 年	1.0%	4.9%	-	65.2%	25.1%	3.9%	0.0%
	12 年	2.2%	40.7%	15.4%	36.6%	4.4%	0.8%	0.0%

我们试图了解上述的这些看法或印象源自哪里。根据日本的言论 NPO 所做的“关于中国的信息来源调查”便可得知，占第一位的是来自“日本的新闻媒体报道”，排在第二的是“日本的电视剧、电视节目、电影等作品”，第三才是“日本的书籍”（参见图 3）。可见，前三位均来自报纸、电视以及书籍等传统媒体的信息。报纸在日本的发行量之大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读卖新闻》就在日本，它与《朝日新闻》、《每日新闻》、《日本经济新闻》和《产经新闻》一同被称为日本的五大报纸，占据了日本报业市场的大部分份额。而电视媒体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也占据了很高的地位，平均每一个日本人每天看电视的时间达到了 3 个多小时，而且电视频道少，相比而言对受众的影响力就大幅度地增强了。

图 3　关于中国的信息来源调查



（四）日本媒体报道态势的变化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众所周知，安倍现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一些错误表态已经不断招致国际社会有识之士的批评。有学者认为，日本人的历史观在二战后呈现出比较分裂的状态，在迷失与反省中徘徊。作为对社会舆论有重要影响的媒体，日本媒体是如何认识这段历史的？

战后，日本的媒体也有反思。在传统的日本五大报纸中，带有左派色彩的《朝日新闻》的反思力度更大一些。《朝日新闻》是一直持比较积极的态度，在报道和论说中坚持人道主义和和平主义的原则，对日本的战争犯罪和错误的战争认识进行批判。另一大报《产经新闻》的论调虽不至于直接肯定战争，但不时会就一些具体问题进行民族主义及国家主义的自我辩护和歪曲解释。而《读卖新闻》、《每日新闻》、《日本经济新闻》则介于两端之间，对不同具体的历史问题的观点倾向，常会呈现流动性。其中《读卖新闻》数年前所做出的反省姿态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日本媒体的一种历史认识。2005 年 6 月 4 日，《读卖新闻》发表了长篇社论，针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提出“首相不应参拜合祀了 A 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的主张。此外，《读卖新闻》还编著《检证战争责任》一书，对日本引起的战争的原因、经过、结局以及责任进行了全面调查。尽管该书的反省也存有一些争议，比如强调了一些历史事件的偶发因素，但被认为是战后 60 年来日本人第一次系统全面地检讨战争历史，揭露了日本“从来没有以

日本国或者日本人民的名义自主追求过战争责任”。

另外,2006 年初,日本传媒界的两位大佬曾有过一次备受瞩目的对谈。《读卖新闻》总主笔渡边恒雄与 20 多年来不仅在市场竞争方面,而且在政治主张方面的“死对头”《朝日新闻》的社论主笔若宫启文坐到一起,就两报长期对立的靖国神社等问题进行了一次对谈。在这次对谈中,两位日本媒介的大佬共同认为“‘只要日美关系好,亚洲外交就会顺利’是一个愚蠢的短见,下任首相假如还是选择参拜靖国神社,日本的亚洲外交就会彻底失策”。

这次对谈的内容发表在《论座》杂志 2006 年 2 月号,被抢购一空。也是在这次对谈中,渡边提议,切断日本与邻国之间恶性循环的最好办法是认真检讨历史罪行,努力让大多数日本国民认识到:“事实上,那就是侵略战争。”

尽管这样,这种来自于媒体内部的反思声音并不多,更何况我们也不能简单指望这位既反对参拜靖国神社,也一直主张修宪、自称保守正宗的媒体精英对历史问题的反思和反省会完全与我们处于同一水准,这也是在一些愿意认真和诚实面对那段历史的日本人士身上,我们虽能看到他们就某些个别问题所做的较深省察,但却难见其有对历史整体做出正确总括的原因。尤其是随着报业竞争的不断加剧,如何争得更多的读者,成了左右报纸经营的一大要务。

诚然,对二战失败的反思也来自于一部分的学者,比如日本新闻史学家、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山本武利先生等。山本武利先生 1940 年出生于日本爱媛县,日本著名传播学家、历史学家,先后任职于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关西学院大学、一桥大学、早稻田大学。山本先生目前是日本一桥大学名誉教授和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曾经在中国传媒大学和复旦大学做过访问学者。主要著作有《报纸政治广告的历史》(朝日新闻社,1972 年)、《广告的社会史》(法政大学出版局,1984 年)、《特务机构的谋略》(吉川弘文馆,1998 年)、《黑色宣传》(岩波书店,2002 年)、《朝日新闻的侵华战争》(文艺春秋,2011 年)等。可惜,这些反思停留在学者层面,并没有对媒体形成约束,随着他们的退休、继承人的缺失,反思声音也越来越弱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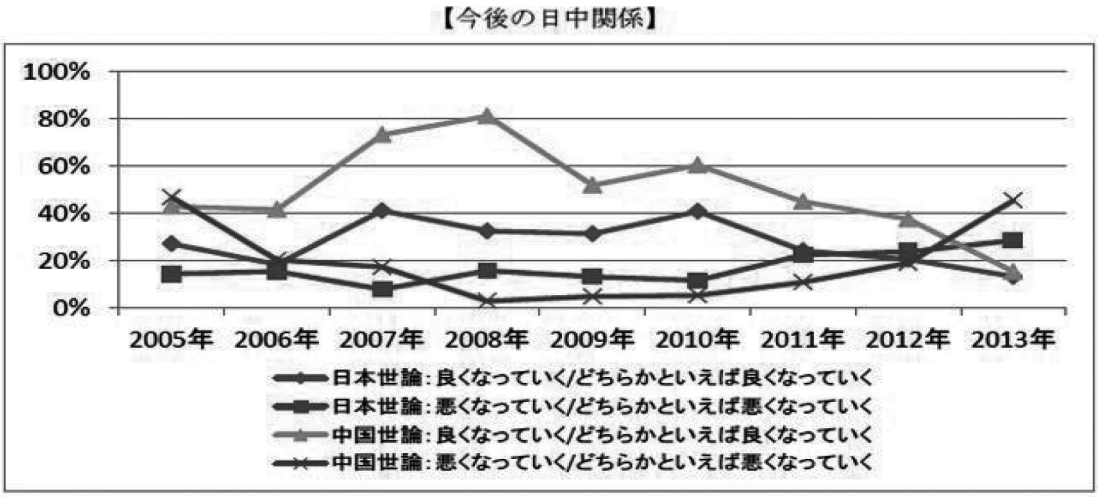
对于未来的中日关系的走向,认为“会朝改善的方向发展”的只有一成左右,而认为“会进一步恶化”的达到了近三成,可见日本人对中日关系的未来走向持悲观态度(参见图 4)。

2014 年 6 月 13 日,美国《纽约时报》网站发表了早稻田大学教授加藤典洋题为《安倍和新闻界》的文章写道,去年 12 月 26 日,安倍成为了 7 年来首位参拜靖国神社的在任首相。当天晚上,安倍同日本一些最著名报纸的编辑和记者共进晚餐。第二天,同首相共进晚餐的人中只有一人报道了他参拜靖国神社的事。这位《每日新闻》的时政版编辑批评安倍的参拜行为会引发国际社会的反对而有损国家利益,但是他也提到“首相动机的重要性”。

加藤教授在文中还提到他对有关安倍行动的公开报道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自安倍上台以来 17 个月中,他已经同著名的媒体人物在至少 36 个场合一起进餐,这些进餐活动不是在首相官邸进行的,而是在私营餐馆更加亲密和欢乐的氛围中进行的。由此可见,安倍与媒体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前述的日本民间非营利组织言论 NPO2014 年 9 月 9 日又发布了最新的“日中共同舆论调查”,其结果称,回答对中国“印象不好”的日本人比例升至 93%,达到 2005 年调查开始以来峰值。而同时也看到另外一组数据,据日本驻沪总领事馆的不完全统计,截至 2014 年 8 月,赴日旅游的中国游客创同期的历史新高。如何来解读这一现象,较难用过去的传统的思维作参考,必须用新的观念或理论结合当下的实际来重新进行思考。其中,媒体的影响力也

图 4　未来的中日关系



日本

		良くなっていく	どちらかといえば良くなっていく	変わらない	どちらかといえば悪くなっていく	悪くなっていく	わからない	無回答
世論	13年	2.3%	10.8%	39.1%	20.3%	8.0%	19.4%	0.1%
	12年	4.2%	16.1%	38.1%	19.0%	4.6%	17.8%	0.2%

中国

		良くなっていく	どちらかといえば良くなっていく	変わらない	どちらかといえば悪くなっていく	悪くなっていく	回答拒否/わからない	無回答
世論	13年	1.5%	13.6%	32.9%	21.8%	23.5%	6.7%	0.0%
	12年	4.0%	33.3%	33.8%	11.7%	7.1%	10.0%	0.0%

不容小视。

在中日关系问题上，日本媒体近年来所采取的避重就轻、无端猜测，甚至是恶语中伤的报道方式误导了日本民众的中国观或形象，偏离了其标榜的“客观公正、不偏不倚”的原则。但另一方面，日本的民众也不是等闲之辈，他们具有的高学历和高素质也是举世瞩目的。中日关系何去何从，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简介及分工：

胡令远：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日本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战后日本政治、外交实质和未来走向研究》(14JD033)首席专家。主要研究领域：中日关系、文化·文明与国际政治；课题组协调人；总论、统稿。

臧志军：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战后日本政治、外交实质和未来走向研究》(14JD033)子课题负责人；主要研究领域：比较政治、中日关系；总论、统稿。

冯　玮：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战后日本政治、外交实质和未来走向研究》(14JD033)子课题负责人；主要研究领域：日本史、东亚比较政治、中日关系；总论。

徐静波：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战后日本政治、外交实质和未来走向研究》(14JD033)主要成员；主要研究领域：日本社会、中日比较文化、中日关系；专题三。

李双龙：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战后日本政治、外交实质和未来走向研究》（14JD033）主要成员；主要研究领域：传播学、中日大众传媒比较、中日关系；专题四。

包霞琴：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外交系副主任、副教授；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战后日本政治、外交实质和未来走向研究》（14JD033）子课题负责人；主要研究领域：日本政治外交、中日关系；专题一。

张浩川：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日本经济、中日经贸关系；专题二。

注释：

①按：即中国领土钓鱼岛及附属岛屿。以下同。

②参见日本外务省网站：http://www.mofa.go.jp/mofaj/area/senkaku。

近代日本《帝国国防方针》制定中的美国因素

孟明铭

内容提要　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美关系的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随着两国实力的不断增长和国际形势的持续变化，双方旧有的“亲善”外交局面逐渐被日益加深的对立与磨擦所取代。受此影响，日本开始重新审视与美国的关系定位。以之为背景，在1907年日本军部制定出台的《帝国国防方针》中，日本首次将美国明确作为一个重要假想敌来对待，此后《方针》虽经过多次修改，但这一基调却始终不变。日美太平洋战争的种子，已然埋下。

关键词　近代　日美关系　帝国国防方针　太平洋战争

一、前　言

在日美关系二百多年的历程当中，近代（1853–1945）无疑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这一时间段内，日美两国关系中的种种矛盾开始激化，并最终走向了太平洋战争，而战争的结果对于今日的东亚仍产生着明显而重要的影响。因此，对于二战以前日美关系史的研究，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正是基于如上理由，国内学术界对于日美太平洋战争的起源问题的研究，一直都保持着很高的关注，成果也可谓汗牛充栋。但略为遗憾的是，现有的研究成果，多集中于前文所言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个日美矛盾日趋明显的时间段内。但对于一战以前日美之间是否存在矛盾和冲突，其规模如何，有多少影响这样的问题却少有关注。如果我们要更加深入了解近代以来日美关系的发展脉络，把握日美两国开战的本质根源，这一段时期也是不应该被忽视的。同时，通过研究这段时期历史所取得的成果和方法论，对于观察今天表面上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涌动的东亚国际关系，也或许有所裨益。

1907年日本制定《帝国国防方针》。在这一方针中，日本将美国列为仅次于俄国的第二号假想敌。这是日本在与美国建交后首次正式将美国视为明显敌手。那么，日本为什么要将美国看作如此警惕的对象，其动机何在？这对于往后的日本对美外交有何意义？[①]为此，本文力图从日本的角度出发，对《帝国国防方针》制定前的日美关系之变局作一梳理。以《帝国国防方针》为标志，日本开始与美国走向敌对，为日美最终爆发战争埋下了重要伏笔。

二、20世纪初日美关系的新局面

1853年佩里“叩关”，不仅结束了日本持续了几个世纪的“锁国”状态，使日本历史迈入近代，同时也正式开启了日美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然而，尽管美国是以武力威胁的方式强行

打开日本国门的，但在此后的近半个世纪里，日美两国的关系却未多受影响，发展顺利。陆奥宗光就在甲午战争前表示："美国历来对我们友谊甚厚，是最抱好意之国"。[②]而究其原因，可概括为以下两点：其一是日本在其扩张的早期阶段实力尚弱，不足以对抗美国这样强大先进的西方国家；其二是当时相比英、法、俄等老牌列强，美国自身在东亚的影响力也处于下风，但又垂涎于在中国获得利益，也不得不让日本出马充当其"代理人"。正如1871年美国驻日公使德朗所言："一旦我们和中国发生纠纷，或是和朝鲜的纠纷增加扩大，则（日本）乃是一个为友固可欢迎、为敌深可惧怕的国家"[③]，"日本持有开启东方的钥匙"[④]。可见，当时日美之间的亲善关系，是以当时两国都有着共同利益诉求，互有可利用价值为前提的，是一种有条件的互助关系。

然而，随着时间推进到20世纪初，尤其是1905年日俄战争之后，伴随着两国实力的增长及当时东亚乃至世界格局的变动，日美"亲善"外交的基础逐渐开始消解了。不仅如此，还出现了不利于两国维系关系的新因素。

首先，随着明治维新的顺利进行，日本基本上完成了产业革命，并通过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成功跻身于世界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列。这使得日本在东亚地区的势力范围和影响大为提高。维新以来，日本所追求的"与外国相对峙，开辟万里波涛"、"雄飞海外"、主宰东亚的"宏伟国策"第一次具备了实际意义上的可操作性。这就使得日本不再安于充当西方国家"马前卒"的"小角色"。信夫清三郎就指出，当时的日本"就再一次站在重大的十字路口。这就是，支持亚洲的民族主义，援助各民族的独立运动呢？还是以西方殖民地占有国为盟友，支持西方殖民地体制的继续存在呢？"。尽管他强调，日本"没有这么大的选择自由了"[⑤]，但当时的日本，开始拥有了不再依附于某一西方国家、独立行动并统治亚洲的念头，而从后来的史实来看，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综观当时的史实，我们不难发现，鼓吹"荡涤白（种人）阀的跋扈"、"亚洲的事情由亚洲人自己解决"以及由日本来担当亚洲盟主的"亚洲门罗主义"也正是在这一时间兴起的。[⑥]

再者，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日俄战争后的东亚国际关系格局也开始出现一些重要的新动向。在日俄战争以前近代东亚舞台上，一直以来占据主角地位的是英、俄、法、德等欧洲国家，日美两国处于相对次要的位置。即便是日俄战争本身，归根到底也可以视作是英、俄之间的对抗，日本在某种程度上仅仅是作为"代理人"为与俄国对立的其他列强"火中取栗"罢了。然而，20世纪以来欧洲地区出现的国际关系新变化，对于东亚格局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围绕着世界霸权，英国和德国之间的矛盾日趋激烈。"在激烈的竞争中，两国都在寻找同盟者，于是在欧洲便逐步形成了对立的两大帝国主义军事集团"。[⑦]这种剑拔弩张的态势，使得欧洲列强们将主要精力收回本国，而在东亚地区不得不采取战略收缩政策，外交日趋保守。不仅如此，他们反而在外交手段上更加依赖日本的行动力。例如，在日俄战争结束后的第二次英日同盟修约谈判中，英国就明确承认"日本在韩国有着政治、军事、经济上的卓绝利益"，但同时也扩大了盟约的适用范围，要求日本承认并保护英国在远东及印度的利益。[⑧]同样，1907年，法国也与日本缔结了《日法协定》，在协定中也表示，承认日本在东亚（主要是中国福建省）拥有特殊利益，并要求日本支持法国在法属印支半岛的统治。[⑨]而俄国在日俄战争失败后，在东亚地区的地位大为削弱，且受欧洲局势影响，无暇东顾，加之素来俄、法亲善，"有了日法的接近和协调，日俄妥协才有可能"。同样是在1907年7月30日，日俄两国签订《第一次日俄密约》，以相互协作的方式，确认了两国的利益所在。[⑩]尽管日本与三国间的协定，从国际政治角度上

可被视作英国构建对德包围圈的外交体系中的一环，但仅就东亚地区而言，正如上文所谈到的，日本已然拥有在东亚的优势地位，这些条约的出台，实际上又给予了这一优势地位以国际体系上的保证。

无独有偶，也就在这一时期，美国也成为了亚洲地区崭露头角的另一新兴势力。历经百多年的发展，美国已然成为新的世界头号经济强国，在东亚地区也拥有了广泛的经济利益。时过境迁，在美国近百年来所秉持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之外，一种新的、将经济上的优势转化为政治上的实际优势的扩张型外交路线也若隐若现。“从 19 世纪末叶以来，美国外交思想经历了从孤立主义到国际主义的转变，而所谓的国际主义，其核心内容就是美国借助着强大的经济、经济和文化力量，大踏步迈向国际政治竞技场，实现美国领导人梦寐以求的世界领袖地位”。[11]而这一变化，就不可避免要与谋求主宰东亚的日本产生国策上的碰撞和摩擦。

三、日美关系出现摩擦

早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日本就对于美国吞并夏威夷这一明显的“东扩”行为抱有强烈的戒心。1893 年，在美国政府策动叛乱、推翻夏威夷女王政府后，外相陆奥宗光就训示驻檀香山总领事，“如果女王能恢复其夏威夷王位，在这种情况下，你要立即恢复与女王政府的关系……（总领事）应该倾向于合法的女王政府，且不承认任何可能成立的新政府”。[12]1897 年美国正式吞并夏威夷时，日本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激烈态度。首先是借口当地日本移民问题，向夏威夷派遣了“浪速”号军舰炫耀武力，又前后多次向美国提出强烈抗议。大隈重信外相在给驻美公使星亨的训示中称：“美国吞并夏威夷是个信号，将使在太平洋拥有领地的野心复萌，随之而来的将是部分重新分配殖民地”。[13]星亨公使不仅在对美照会称日本扩张活动的范围在太平洋，更在美夏合并条约签订后的次日即致电国内，声称当前“唯一可能之手段是，利用日夏现存之关系，以报复之名义迅速派遣若干强大之军舰，占领该岛”[14]，主张对美动武。尽管最后这一事件以日本退让而告终，日美亲善得以延续，但其强硬程度在日美关系史上实属空前。我国学者就指出“这预示出，日美作为太平洋上迅速崛起的两大强国，在对外扩张中发生冲突时，将作为不稳定因素而发挥国际作用”。[15]

美西战争的爆发及其后果，应当被视作日本对美外交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场始于美洲的战争，却对东亚的秩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这场战争，美国第一次拥有了亚洲殖民地——菲律宾。这不仅使得美国利用日本作为其亚洲“代理人”的需求大大减弱，另一方面，也和日本当时逐渐滋长的“南进”野心开始形成正面冲突，触及了日本的“红线”。在美西两国交战之际，日本便告知美国“帝国政府切望维护东方和平与远东正义之均势”；“美国如果……感到不欲单独承担……（菲律宾）群岛之行政，则帝国政府……着眼于地理相近之利益，愿与美国联合……努力建立……在保证国之联合或三方保护下之该领土的适当政府”。[16]而在美军进驻菲律宾，开始镇压当地独立运动之时，虽说日本政府无甚表示，但军部和民间势力却表现出援菲的反美倾向。有关日本秘密向菲独立军走私军火的流言甚嚣尘上，以至于美国还专门向日本提出正式照会，要求彻查此事。[17]这些流言绝非空穴来风，1899 年，在陆军参谋总长川上操六的支持下，日本陆军秘密指使国内一些“东亚志士”将 300 吨武器弹药装载上“布引丸”轮船，运往菲律宾，结果中途沉没，终为外界所知。此即轰动一时的“布引丸”事件。[18]这一事件表明“日本南进只是时间问题”，“美国占有菲律宾，无异于在日本南进的道路

上埋下一颗炸弹。只要美国在菲律宾的殖民统治没有结束，日本要南进，就要引爆这颗炸弹”，“这就决定了日美必战的前途”。[19]

日俄战争后，日美又在战争的胜利果实——中国东北地区进行了激烈争夺。美国试图凭借强大的经济力量，以“门户开放”政策为借口，以“满洲问题国际化”、“哈里曼计划”、“诺克斯计划”等为手段，渗透并最终事实上占有这一地区。而日本则针锋相对，宣称“帝国在满洲拥有特种地位”，并采取政治手段，挤压东北地区的美国资本。

随着日美关系的不断恶化，在《帝国国防方针》出台前的 1906 年，针对在美日本移民问题，双方已几乎站在了战争的边缘。由于担忧日本的威胁，加之“黄祸”思想的猖獗，美国各地出现了一系列迫害日本移民的行为。加利福尼亚州政府决定，将日本学童从普通学校中开除出去，实行种族隔离政策。同年 2 月，美国政府又颁布一项法令，禁止日侨从夏威夷进入美国领土。在日本，对美国的类似报复行为也时有发生。1907 年夏天，日美关系已经达到极其紧张的程度，驻菲律宾的美军已接到命令：应设法保卫此地，以便对付日本的可能袭击。[20]

在这一背景下，日本已渐渐认识到，传统的对美亲善外交已经走到了必须要加以改变的地步。伊藤博文在其 1907 年提交政府的《对外关系意见书》中就明确指出“不能让日美关系像今天这样放任自流”。[21]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有必要准备一项如何应对日美矛盾的方案。而制定日本《帝国国防方针》，就被作为“（日俄）战后经营的最大急务”[22]提上了日程。

四、《帝国国防方针》的出台——日本实行对抗美国路线的重要标志

受上文所述各项因素的影响，日本开始逐渐认真考虑对抗美国，这为《帝国国防方针》的出台奠定了基础。

早在 1901 年，外相小村寿太郎就出于对俄、美两国海军在太平洋扩张的担心，而起草了《内政外交十年意见》，主张扩充海军军备。据他估计，除了俄国以外，美国海军不出数年，将有向东洋派遣强大舰队的计划。他因此强调“帝国因其政略及位置，有必要拥有比可在东洋常驻最大舰队之国家更有优势的海军”。[23]不久，日本军部在 1902 年 5 月制定的《日英联合军大作战方针》确定：俄国为第一假想敌国，其后为法、德和美国。[24]此外，山县有朋也指出，今后可能阻碍日本进一步扩张的将是俄、美、法，要确立“攻势国防”，制定对俄法及对美作战计划。他设想，在国际上利用日英同盟，使日本在远东地区对俄法或对美开战时处于有利地位。[25]另外，在军队内部，战略理论家、海军大学教官佐藤铁太郎在 1902 年出版了他的著作《帝国国防史论》。在这本书中，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日本的国防应该“犹如西欧的英国一样”，竭力强调日本作为一个岛国的先天地理位置，大力建设海军的重要性，在国防上主张日本的国防首先就是海防，提出“第一线海上、第二线海岸、第三线内地”[26]的“三线”国防理论。既然要发展海军，那么就必须找出极具威胁的假想敌，这样才能显示出海防的必要性。对此，日俄战争后，海军普遍认为，俄国已经战败，其远东的海军力量已经在日本海海战中被完全歼灭，而美国海军却在马汉“海权论”的大海军理论指导下正进行着大规模的扩充。为此，在日本的假想敌问题上，佐藤铁太郎强调：“国交无论亲疏远进，关系国家中持有最强军力的国家就是我国应对抗之国家。”[27]也就是说，即使像美国这样在关系上尚属友邦的国家，只要有强大的海军实力也一样可以列为假想敌。

受此影响，1907 年，日本出台了第一个正式的军事战略计划——《帝国国防方针》，方针

由《帝国国防方针》、《帝国军队之用兵纲领》和《国防所要兵力》三部分组成，于4月4日上呈明治天皇裁可。在《帝国国防方针》部分中，开明宗义就强调“帝国之政策遵照明治初年所规定之开国进取之国是执行……欲振兴国权，增进国利民福，则必须向世界之多方面经营，在……向南亚及太平洋彼岸扩张自不待言，还应把进一步扩张作为帝国施政之根本方针。”为达到此目的，“对于妄图侵害我国权之国家，至少在东亚应采取攻势”。因此，日本把美国列为日军仅次于俄国的第二号假想敌国，指出虽然“美国为我友邦，应维护之”，但是“从地理、经济、人种及宗教等观察，他日难保不发生激烈冲突”，要求海军“在东洋对美国海军取攻势”。[28]在实施手段上，由《用兵纲要》制定了具体的对美作战计划，即“海军在开战之初，迅速压制敌远东之舰队，同时与陆军协同破坏吕宋岛及关岛之海军基地。当敌舰队之主力开到远东海面及其在途中，则努力依次消灭其实力，并伺机以我主力舰队歼灭之。陆军协同海军迅速攻占吕宋岛，同时破坏关岛之敌海军根据地。为此，海军应努力为陆军提供尽量多的船舶。歼灭敌舰队主力后，陆海军之作战，临机决定之”。[29]对于海战所需兵力，《国防所要兵力》认为，海军军力的最低限度为八艘战列舰、八艘装甲巡洋舰及若干巡洋舰和驱逐舰，[30]这也是后来日军著名的“八·八舰队计划”的雏形。

《帝国国防方针》确立后，据畑俊六回忆，其在明治末年曾在陆军参谋本部作战科任职，每年都要根据《国防方针》制定年度作战计划。[31]这表明，《帝国国防方针》绝非日本一时起意想出的临时方案，而是日本将来在面对冲突时所要采取对策的规划表。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方针正式标志着“日军从守势战略改为攻势战略，这一攻势战略确定以后，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始终没有改变”。[32]这不仅仅是单纯的发展武装力量的蓝图，它已经上升到了规定国家未来发展道路的地步。因此，既然美国在东亚地区与日本存在着越来越严重的矛盾，成为了“妄图侵害我国权之国家”，那么，就必须“在东亚应采取攻势”，主动出击，扫平这一障碍，并将之作为“帝国之根本施政方针”。这不能不说是日本对美外交从亲善转向敌对的一大标志。

从往后的史实来看，自《帝国国防方针》出台以后，日本果然将“攻势战略”的思想运用到外交层面上，在东亚地区开始对美国采取咄咄逼人的敌对态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乘欧洲大战之机，占领了德属南洋群岛，构成对美国战略的有利态势，在苏俄远东地区及北满洲设置了安全地带，加强了大陆国防态势，在以中国大陆为中心的南、北两个方向上，初步实施了其对亚太地区的扩张战略，形成了针对美国的优势地位。然而，1918年战争结束后，《帝国国防方针》面临修订之际，日本不但没有改变对美“攻势战略”，反而由日本海军进一步通过《帝国国防方针》强调美国已“成为最可能发生利害冲突的竞争国”[33]，要求进一步扩军，建设一支拥有16艘战列舰、8艘装甲巡洋舰的主力舰队。

按照《帝国国防方针》的要求，日本不断针对美国强化海军力量，也引起了美国的警惕和敌视，更加激起日本不满，从反方向进一步恶化了日美关系。1908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就致函海军部长梅特卡夫，吐露他对日本的担心：“现在日本舰队有四艘战列优于我们的任何四艘……我们应采取步骤，以在建设方面保持领先于而非落后于别国”。[34]对于《帝国国防方针》的具体内容，美国通过情报得知了其轮廓。美国认为，日本将在1910年充分准备了对西太平洋美军阵地的攻击，然后等待美国舰队赶到远东。[35]因此，1910年春，美国海军总委员会开始认真考虑原本流于形式的对日作战计划——“橙色方案”。其结论认为：第一，美国对日作战的各种准备均不足；第二，需要在夏威夷和关岛建立军事基地；第三，有必要将海军主力

舰队部署在太平洋而非大西洋。[36]一战结束以后，在1922年举行的华盛顿会议上，美国又迫使日本同意《限制海军军备条约》，谋求限制日本的战争能力。这更加激怒了日本。1923年的《帝国国防方针》第二次修订案，否定了力主签订裁军协议的首相加藤友三郎“对美不战”的原则，采纳了海军军令部次长加藤宽治的对美必战论，强调东亚大陆“带来帝国与他国之间的厉害冲突，大势所趋，必有干戈相见之虞，而与帝国冲突机会最多者为美国”，“帝国不久将来之国防，应以与我发生冲突可能之最大、且有强大国力和军备之美国为目标而主要防备之”[37]，由此将美国定为日本的头号敌国。进一步强化了《帝国国防方针》原有的战略思想。日本在对抗美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日美关系愈发恶劣，而在这过程当中，日本制定《帝国国防方针》的行为，其作用应是显而易见的。

五、结　论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进入20世纪以后，日美关系出现了重大转折。由于两国在东亚地区的实力对比增长和国际形势的变动，原有的建立在相互利用基础上的两国亲善外交局面逐渐瓦解，日本开始将美国视为其称霸东亚道路上的障碍。受之影响，日本逐渐改变了对美友好的态度，开始寻求一条解决美国问题的新战略道路。为此，日本制定了《帝国国防方针》，开始将美国视为敌对国家，并决定采取主动进攻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帝国国防方针》出台后虽屡经修改，但其针对美国的主要思想没有发生过变化，反而愈发强调美国之威胁，并最终将美国当成头号必然假想敌，对日美关系的恶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催化作用。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日美积怨颇深，最终开战绝非一事一物所能达成，而在《帝国国防方针》制定之际，日美矛盾还没有像后来那样尖锐，两国间仍保有互相妥协之期望。但是，自伊时起，日本的对美开战思想已经作为一条隐线，悄然贯穿于时间长河中，并在以后的日子里日渐显露，并最终完整地付诸于二战中。因此，对于日美走向冲突的萌芽期之研究，理应得到学术界更多的关注。

注　释

①国内对于近代日本《帝国国防方针》的研究亦有不少收获，如崔丕：《日本〈帝国国防方针〉的中国观》，《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3月；丁志强：《日本〈帝国国防方针〉研究》，吉林大学2005年硕士论文；于非：《从明治四十年国防方针到大正七年国防方针》，首都师范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刘景瑜：《近代日本帝国国防方针的制定及第一次修改探析》，《社科纵横》，2012年8月；吕秀一、聂奎全：《日俄战争后的日本〈帝国国防方针〉与中国东北》，《延边大学学报》，2012年2月，等等。不过，这些成果均未重点阐述日美关系在日本制定《帝国国防方针》中所起到的影响。

②陆奥宗光：《蹇蹇录》，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27页。

③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373页。

④同上，第387页。

⑤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349页。

⑥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94-95页。

⑦齐世荣、吴于廑主编：《世界史》，现代史编，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31页。

⑧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上》，原书房，1972年，第237-238页。

⑨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40卷，第1册，日本国际联合协会，1954年，第81-82页。

⑩《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上》，第173-175页。

⑪王晓德:《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美国外交思想探析》,《史学月刊》,2004年第9期。
⑫刘世龙:《日美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153页。
⑬同上,第156页。
⑭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30卷,第978页。
⑮刘世龙:《日美关系》,第157页。
⑯《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345-346页。
⑰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第539页。
⑱井上清:《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1页。
⑲刘世龙:《日美关系》,第162页。
⑳吴廷璆:《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540-541页。
㉑《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上》,第283页。
㉒北冈伸一:《日本陆军与大陆政策》,东京大学出版会,1978年,第12页。
㉓外务省编:《小村外交史》,原书房,1966年,第208页。
㉔野村实:《太平洋战争与日本军部》,山川出版社,1983年,第291页。
㉕大山梓:《山县有朋意见书》,原书房,1966年,第263页。
㉖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大本营海军部·联合舰队·1)》,朝云新闻社,1975年,第104页。
㉗黑川雄三:《近代日本的军事战略概史》,芙蓉书房出版社,2003年,第73页。
㉘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大本营海军部·联合舰队·1》,第112-116页。
㉙王颜昱主编:《日本军事战略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43页。
㉚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大本营海军部·联合舰队·1》,第117页。
㉛王颜昱:《日本军事战略研究》,第131页。
㉜同上,129页。
㉝细谷千博编:《华盛顿体制与日美关系》,东京大学出版会,1978年,第357页。
㉞刘世龙:《日美关系》,第210页。
㉟同上,第213页。
㊱同上,第214页。
㊲王颜昱:《日本军事战略研究》,第133页。

(孟明铭: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胡令远)

池田大作生命尊严思想探析

汪鸿祥

内容提要　池田大作历来十分关注生命尊严，对生命尊严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论述，长期致力于生命尊严的实践。池田大作生命尊严思想的重要渊源是佛教生命观和户田城圣的生命论。池田大作生命尊严思想具有时代性、绝对性和普遍性等特点。池田大作生命尊严思想注重实践，包括对自我的实践和对他人的实践。实现21世纪生命尊严的根本途径是实行“人间革命”，具体途径可以概括为和平与对话的途径、废除核武器的途径、文化的途径以及教育的途径等。池田大作生命尊严的思想与实践为实现21世纪生命尊严提供了思想的指南和实践的楷模。

关键词　池田大作　生命尊严　实践性

前　言

2014年是复旦大学授予池田大作名誉教授称号30周年。池田大作对国际和平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的杰出贡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不仅获得了联合国和平奖等许多勋章，而且（到2014年底为止）获得了世界各国大学和研究机构的355个名誉学术称号。池田大作思想正在日益受到国内学术界和国际学术界的重视。①

本文重点探讨池田大作生命尊严的思想。池田大作历来十分关注生命尊严，将生命尊严与21世纪人类社会的现实问题密切相连，从广阔的视野来理解生命尊严的意义，对生命尊严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论述，并长期致力于生命尊严实践，对于我们认识生命尊严的意义具有重要的启发。②

一、池田大作生命尊严思想的渊源

池田大作生命尊严思想的形成主要有两个重要思想渊源，首先是以佛教生命观为基础，其次是对户田城圣生命论的继承和创新。

池田大作关于佛教生命观的基本观点做了如下阐述：“佛教将这个宇宙的所有实际存在、现象的一切都视为生命的存在，并将此称为‘诸法’、‘森罗三千’、‘森罗万象’”。③就是说佛教的基本观点，认为宇宙的一切现象都是生命的存在。池田大作生命尊严思想就是以佛教关于“万物皆生命”的观点为基础的。

池田大作还用“物”和“事”的两个概念进一步对佛教生命观进行了深入阐述。他指出：“所谓诸法可以译为现象。佛教中不是将物质当作固定化的‘物’，而是看作生灭变化的现象，即‘事’。生命也同样是生灭变化的‘事’。一切都是‘事’，都是生住异灭，即生存，安定，变化，

消灭。关于其中一时的安定期的状态,物质上假定称为‘物’”。[④]这一论述深刻地阐明了佛教生命观。近代以来,将生命看作“物”的生命观长期影响人们的思维,对此,池田大作提倡“事”的生命观。“物”的概念是静态的和实体的,与此相对,“事”的概念是动态的和非实体的。根据池田大作的论述,一切现象(包括物质)本身都是生灭变化的“事”,可以将一定的安定状态表现为“物”。“生命即‘事’”,这是池田大作对佛教生命观进行的现代意义的精辟解说。

池田大作生命尊严思想是对其恩师户田城圣生命论的继承和创新。为了理解池田大作生命尊严思想,必须了解户田城圣的“狱中悟达”,进而探讨户田城圣的生命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 1944 年,户田城圣作为“思想犯”被关押在东京巢鸭监狱期间,反复阅读《法华经》并反复思索而达到彻悟,领悟了“佛即生命”的真谛。

池田大作对于户田城圣“狱中悟达”的意义作了高度评价,指出“佛即生命”的宣言“使世界哲学改变了面貌”,使佛教“毫不逊色地与近代科学为伍”。[⑤]就是说户田城圣“佛即生命”的崭新论断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的佛教观,从过去“佛是难于接近的特殊存在”的认识转变为佛是任何人都内在的认识,户田的这一主张可以说是对以往佛教观的一种革命。

在“狱中悟达”的基础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 1949 年户田城圣发表了《生命论》的著名论文,关于“三世的生命”(即过去、现在、未来连续的生命)、“永远的生命”(即与宇宙并存的生命)以及“生命的连续”(即贯穿生死而存在的生命)等生命论的重要命题进行了深入的论述。池田大作在《人间革命》中指出:“户田城圣的‘生命论’真是宣告崭新的生命世纪的黎明到来的宣言书”。[⑥]池田大作在第 26 届 SGI 日发表的纪念倡言中进一步指出:“正因为有了恩师狱中体验的源流,才有 SGI(国际创价学会)运动的大河洪流。”“深切期望本世纪必须成为‘生命的世纪’、‘生命尊严的世纪’,我的决心远远地超越了宗教性的观点,恩师的宝贵体验必将对人类精神史做出贡献,希望将此作为打破时代闭塞状况的突破口。”[⑦]由此可见,池田大作生命尊严思想正是在继承恩师户田城圣“生命论”基础上的发展和升华。

二、池田大作生命尊严思想的重要特点

池田大作生命尊严思想具有一系列重要特点。本文重点从时代性、绝对性、普遍性的三个角度进行考察。

1、生命尊严的时代性——生命的世纪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价值多样化的时代。池田大作在与汤因比博士的对谈中指出:“即使承认价值的多样化,难道就不需要包含价值多样化的应该成为共同基础的价值观吗?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基础,人类的互相信赖和协调就不能成立。”[⑧]池田大作强调了确立包括多样化价值的共同价值观的必要性。那么什么是我们这个时代,即 21 世纪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观呢? 池田大作以佛教哲学为出发点,为 21 世纪人类社会提供了一系列具有“全球性的价值”的重要理念,提倡将生命尊严作为我们时代的共同价值观,呼吁将 21 世纪作为“生命的世纪”。

池田大作早就将 21 世纪称为“生命的世纪”。1972 年出版的《文明:西方与东方》中表示:“我想将 21 世纪命名为‘生命的世纪’”。[⑨]1974 年出版的《少年抄》中写道:“我从如何看待未来的观点出发,一直提倡即将到来的 21 世纪应该成为‘生命的世纪’”。[⑩]在新世纪开始的 2001 年 1 月发表的第 26 届 SGI 日纪念倡言的题目就是《涌向生命世纪的巨大潮流》。在《法

华经的智慧》中指出:“21 世纪的关键就是生命”。[11]池田大作强调 21 世纪是生命的世纪,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深邃的思想意义。

现代社会中,糟蹋生命的现象屡见不鲜,损害生命的事例不胜枚举。这些不仅是对自己的生命不珍惜(如自杀率上升),而且对他者(人及动物、植物)的生命也不珍惜(如战争和环境破坏)。在“生命危机时代”的现代社会,理解生命的真谛,确立生命尊严的理念,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

池田大作与汤因比的对谈集就是围绕着“生命尊严”的主题而展开的。从开头的“人是什么样的存在”到结尾的“至上的人的价值”,始终把“生命尊严”作为最大的要点。池田大作指出:“我认为必须将生命尊严至上的价值作为普遍的价值标准”。[12]由此可见,池田大作关于生命的理解,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不是仅仅停留于“珍惜生命”的认识上,也不是单纯的感情或简单的标语,而是主张把“生命尊严”作为 21 世纪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

2、生命尊严的绝对性——生命高于一切

池田大作指出:“社会体制与幸福,物质的丰富性与幸福感并不是直接相连的,必须意识到人的生命这一难以把握的但是不能无视的实体存在其中。不,那不单是存在其中。实际上,只有‘生命’才是包含一切的总体,必须最优先考虑生命的尊严。”[13]这一论述告诉我们,现实世界中,由人建立的社会体制和由人创造的物质财富未必给人带来幸福。幸福的源泉在于生命。最重要的是“包含一切”的“生命”。生命高于一切,这是池田大作生命尊严思想的根本观点。

生命高于一切,就意味着生命尊严是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至上存在,绝不允许以任何政治或意识形态上的理由来践踏生命。生命高于一切,就意味着生命尊严是超越物质状况和贫富差别的至上存在,绝不允许以任何经济或贫富差别上的理由来糟踏生命。

站在生命的原点上,心灵和身体,精神和物质,个人和社会,人类和环境就能相连。必须将生命尊严的理念摆在最优先地位加以确立。池田大作生命尊严思想强调了生命尊严的绝对性,强调了生命尊严是无价的、至高无上的存在。生命至上的理念不仅是个人思考和行动的根本准则,而且应该成为国家政府制定法律政策的根本准则,也应该成为国际社会交流与合作的根本准则。

3、生命尊严的普遍性——生命包括一切

池田大作生命尊严思想还强调了生命尊严的普遍性。生命尊严是与非暴力、尊重人权等理念密切相关的。

尊重生命意味着非暴力。暴力的行使就是杀伤生命,就是损害生命的尊严。因此生命尊严意味着非暴力状态的确立。暴力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的暴力”,包括战争和恐怖活动;另一类是“结构性的暴力”,包括贫困饥饿、人权抑制、环境破坏等。池田大作主张不仅要根绝“直接的暴力”,还要消除“结构性的暴力”。[14]

尊重生命意味着必须保护人权。每个人生来就有不可侵犯的人权,池田大作将 21 世纪称为“人权的世纪”,十分重视人权保护。为了保护人权必须保障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如以身份、信仰、国籍、政治、经济等各种理由阻扰人的自我价值实现,就谈不上是尊重生命。池田大作十分重视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

生命尊严也与幸福观紧密相连。池田大作在《我的人间学》中指出:“不探究深奥的生命观,就不能确立从容悠然的生活观和真正的幸福观。”[15]就是说生命与幸福密切相关,生命观

与幸福观犹如车子的两个轮子。池田大作把幸福分为“相对幸福”和“绝对幸福”两种类型，指出“人生的幸福大体分为两种。由于欲望充足而感到的幸福，和由于生命自身的跃动和充实感的幸福。前者总是依存他者，被他者左右，应该将此称为‘相对的幸福’……与此相对，返回自己，以自己的成长和内在的充实为目标的生活观，而且从生命的深处涌现的幸福观，不被他者左右，我将此称为‘绝对的幸福’”。⑯

池田大作进而指出：“今后必须构建的文明，从其最基础的底部到其顶部，都必须是以‘生命的尊严’这一哲理的纯白的结晶来筑成的高峰。”⑰这一论述阐明了“生命尊严”是21世纪人类社会的基本理念，也可以说生命尊严是池田大作思想的哲学基础。

三、池田大作生命尊严的实践意义

池田大作生命尊严思想具有鲜明的“实践性”。池田大作不是把生命尊严当作空洞的理论，而是把生命尊严化作具体的实践。池田大作指出：“为了使生命成为真实的事实上的尊严的存在，需要每个人的努力。应该说对于自己的尊严，自身负有责任。”⑱就是说生命尊严的理念是实践的理念。实现自己的尊严是自身的责任，是各人必须努力的课题。作为生命尊严实践的典型，池田大作高度赞扬甘地的“非暴力”实践，称颂甘地“是‘生命的世纪’的伟大先驱者”。

生命的尊严性的实践意义包括对自我和对他者两个方面的实践。生命尊严的自我实践就是意味着自我变革，就是要实行人间革命。生命尊严的他者实践就是意味着慈悲行动，就是要实现和谐共生。

1、生命尊严性的自我实践

池田大作指出：“必须将能够贤明地指导欲望的理性和道德律在人们的生命中内在化。这真是复杂而难解的课题，但是在此描绘生命或人格的理想图，为了在自己的生命中实现这个理想，向自我变革进行挑战，从而将自身的尊严性从单纯一般的原理转换为具体的现实。”⑲就是说为了使生命尊严成为具体的现实，需要进行自我变革的挑战，确立能够指导自己的自律精神。这种自我变革或自律精神的确立，说到底就是进行人间革命。

池田大作指出：“人是能够自觉地体现包含在宇宙生命中的慈悲和智慧，实行‘人间革命’的生命的存在。”⑳池田大作生命尊严的实践以“人”为根本，始终围绕着“人”这个主题而展开。

池田大作的代表作《人间革命》和《新人间革命》，围绕着“人间”这个主题，描绘了气势恢宏的人间主义的画卷，谱写了丰富多彩的人间主义的篇章。池田大作在《我的人间学》一书中围绕着“人间”的主题，通过对著名历史人物和著名文学作品的评论和分析，对人间主义理念作了精辟的论述。如果说人间主义是池田大作思想的核心价值的话，那么可以说“人间革命”则是池田大作生命尊严思想的重要实践。正是人间革命的大量实践，大大地丰富了池田大作生命尊严思想的内涵。池田大作在与汤因比对谈时指出：“要想克服恶的生命，就必须加强善的生命，我们称其为‘人间革命’。”㉑在《探究一个灿烂的世界》中指出：“我们的人间革命，是用自己的手来开拓内在宇宙—自身内在的创造性生命，争取人自立的变革工作。”㉒

人间革命的本质就是人的精神革命，就是人的内心世界的变革，也就是人的修行、人的自身修养。池田大作指出：“《法华经》的教义是‘即身成佛’”，“任何人都可显现本来具有的清

净的佛界，都可以成佛”。“智慧与慈悲之心就是‘法华经的精神’，就是永恒的真理”。[23]池田大作关于人性的“善”与“恶”作了精辟的论述，提到了佛教的“十界论”。佛教把表现在每一瞬间的生命的境地分为地狱、恶鬼、畜生、修罗、人、天、声闻、缘觉、菩萨、佛十种境界。“所谓‘善人’就是‘菩萨界’或‘佛界’，就是能节制自己本能的生命状态。”[24]池田大作深刻地阐明了实现人的内在变革的关键是从善，引导人们修善积德，以实现人的内在的变革。通过人间革命，使人成为勇敢的人、智慧的人、慈悲的人。通过个人这一“小我”的人间革命，进而实现“大我”的人间革命即实现全社会和全人类的和平和幸福。

池田大作在其名著《人间革命》的卷首中深刻地表达了一个重要的命题，指出：“一个人的伟大的人间革命，不久将会实现一国的命运的转变，进而可能转变全人类的命运。”[25]这一论述实际上指明了实现 21 世纪生命尊严的根本途径就是实行人间革命。作为池田大作思想核心价值的人间主义理念是实现 21 世纪生命尊严的根本理念。人间主义这一理念，在强调“一切要以人为根本”的基本认识上，与“以人为本”理念的意义是相通的。

2、生命尊严性的利他实践

作为生命尊严性的另一个重要实践，就是对他者的实践，或称为利他的实践。池田大作指出：“所谓生命的尊严在于自己的心中承认所有的生命尊严。”[26]就是说不仅要认识自己生命的尊严，而且要认识一切生命的尊严，也就是说要进行生命尊严性的利他实践，进行慈悲行动，实现与他者的和谐。

和谐就是万物协调发展，整体保持均衡。和谐的概念是以人为中心，表示人自身的均衡、人与人的均衡、人与自然的均衡的概念。和谐这一概念是自古就有的东方智慧。和谐与佛教的“缘起”思想密切相关。“缘起”思想认为，世上万物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互相依存的。“缘起”思想中“因缘而生”的概念具有变动的意义。

现代社会中不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人与自然的关系都出现危机。战争是人与人关系危机的典型表现，环境问题是人与自然关系危机的集中反映。为了克服现代危机，实现 21 世纪生命尊严，池田大作主张将和谐理念作为指导 21 世纪的重要理念。池田大作和谐思想不仅追求人的内在的和谐，而且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

利他实践的重要内容就是为了追求人与人之间和谐而开展“慈悲行”。所谓慈，就是为他者的快乐和幸福进行实践并做出贡献。所谓悲，就是为解除他者的痛苦和悲伤进行实践并做出贡献。慈悲就是为他者造福除苦的实践。“慈悲行”也可称为“菩萨道”。利他实践就是怀有慈悲之心，实行“菩萨道”。池田大作引用佛典的话：“为人点灯，给他人照亮，也照亮了自己。”进而解释说“为他人效力，实际上是发挥自己的才能，不顾他人的利己主义，实际上是损害了自己。”“要在现实生活中具体地实践不断地提高为他人着想的行为的比率的人生——菩萨道。”“应当通过‘菩萨道’的慈悲的实践，使现实社会朝着好的方向变革。”[27]池田大作深刻地阐明了进行利他实践的关键是互惠双赢，指出为了他人实际利于自己；利己主义实际损害自己，提倡实践为了他人的“菩萨道”，实现社会变革。池田大作不仅主张人与人之间实行“菩萨道”实现和谐，而且主张家庭内、民族间、国家间、区域间实行“菩萨道”实现和谐，提倡一切人种、民族、宗教、国家间的互相交流、互相理解、互相尊重。池田大作所讲的“慈悲之心”，“菩萨道”与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仁爱”思想是异曲同工的。

利他实践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包括人与地球生态系统以至宇宙生态系统的和谐，以及各种物种之间的和谐，就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共生。池田大作多处提

到,21 世纪应该成为“共生的世纪”。他指出:“人本来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能不能同大自然协调、和平共处,对人类来说,是关系到生存的问题”。[29]与共生精神相关,池田大作强调了“依正不二”思想,他指出:“佛教是把大宇宙、大自然与人的生命的关系当作‘依正不二’论而展开的”,“这一哲理认为,作为‘依报’的环境和作为‘正报’的人的生命,在其根本上是‘不二’的。”[29]所谓“依正不二”,就是主体和客体的内在关系,就是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池田大作从依正不二论出发,主张人与自然的一体性,提倡人与自然的和谐,反对为了经济发展而破坏自然。自然环境的破坏就是人的破坏,就是生命的破坏,环境危机威胁人类生存,威胁生命尊严。池田大作为了实现人与自然的共生,大力呼吁保护环境,爱护环境。

池田大作指出:“承认一切的生命尊严的心就是确立自己的生命尊严。可以说在这客观性和主观成为一体之中,真实的尊严性就能现实化。”[30]就是说承认他者的生命尊严就是使自己的生命得到尊严,利他的实践与自我确立是相连的,为了他者幸福的实践有利于自己的成长。

池田大作从生命尊严出发,阐明了生命所包含的自我与他者的两种基本关系,即实行人间革命与实现和谐共生的内在联系。因此,生命尊严与人间主义、和谐共生的理念内在相联,互为一体,密不可分,缺一不可。人间革命是生命的升华,和谐共生是生命尊严的美好体现。

四、实现 21 世纪生命尊严的途径

池田大作生命尊严思想在其追求世界和平以及开展国际文化教育活动的实践中得到充分体现。如果说实现 21 世纪生命尊严的根本途径是实行“人间革命”。那么可以说其具体途径主要是和平与对话的途径、废除核武器的途径、文化的途径以及教育的途径。

1、弘扬生命尊严的和平与对话的途径

池田大作表明:“我希望 21 世纪能斩断从憎恶到憎恶的连锁,同暴力与战争诀别,成为充满和平与友爱的世纪”。“没有和平就没有民众的幸福。”[31]在池田大作思想体系中,和平问题的内容最为丰富,和平问题的论述最受注目。池田大作在其名著《新人间革命》的卷首,写了一段震撼人心的名言:“没有比和平更珍贵的,没有比和平更幸福的,只有和平才是人类进步的根本的第一步”。[32]为了实现和平,必须进行对话。池田大作指出:“对话是打开和平之门的钥匙……只要开诚布公地商谈,我相信任何问题都可以找到解决的办法。互相理解和信任就是和平的基础。”[33]池田大作重视对话的渊源来自于佛教。日莲的《立正安国论》就是通过主人与客人的对话展开论述。对话就是为了实现和平,就是为了实现 21 世纪生命尊严。

池田大作通过对话,为实现 21 世纪生命尊严进行了卓越的实践。池田大作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访问了 54 个国家和地区,与世界各国首脑和有识人士进行了 7000 多次对话。池田大作的对话超越了不同的宗教,遍及佛教文化圈、基督教文化圈和伊斯兰教文化圈;冲破了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壁垒,遍及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池田大作的对话促进了 21 世纪生命尊严的实现。通过对话可以打破壁垒,促进沟通;消除不信,促进理解;化解隔阂,促进融合。和平与对话的途径是弘扬生命尊严的充满光明的重要途径。

2、维护生命尊严的废除核武器的途径

核武器是对人类生命的威胁。池田大作指出“核武器是侵犯人类生存权利的绝对恶”。[34]尊重生命意味着必须保护人的生存权利。为了维护生命尊严就必须废除核武器,必须使人类

社会彻底消除核武器的威胁。因而池田大作强烈主张废除核武器。不仅多次向联合国裁军特别会议提出了废除核武器的倡议，而且每年 1 月 26 日 SGI 日发表的“纪念倡言”都对废除核武器提出了具体主张和建议，还在许多著名对话集和大量演讲中，对废除核武器作了具体论述。

池田大作从生命尊严思想出发，关于废除核武器表明了基本的立场。首先，必须转变人类的思维。池田大作指出：“现在人类必须从基于武装的和平这种野蛮愚蠢的思维方法，向放弃武力的和平这种文明人的思维方法进行脱胎换骨的转变。即必须从基于恐怖的战争抑制这样的考虑，向基于互相理解和信赖的树立真正的和平这样的考虑进行根本观念上的转变。……作为其第一步，为禁止任何国家的核武器的制造、试验、储藏，并为将核武器从地球上一扫而净，必须倾注最大的努力”。[35]池田大作强调了进行和平的文明思维的重要性，还强调了互相理解和信赖的重要性，反映了池田大作废除核武器思想的积极性。其次，必须认识核武器的危害。池田大作指出：“瞬间大量杀人的核武器是‘绝对恶’，对其使用必须以人类的名义定罪，任何理由都不能使核武器正当化，必须废除核武器。这也是户田先生的遗愿”。[36]池田大作强调了核武器本身就是罪恶，还强调了使用核武器更是反人类的罪行，反映了池田大作废除核武器思想的彻底性。再次，必须完全禁止核武器。池田大作指出：“最终有必要缔结禁止一切核武器的开发、生产、拥有、配置的《完全禁止核武器条约》”。[37]换言之，即实现人类社会无核化。池田大作不仅主张缔结《完全禁止核武器条约》，而且对“核抑制理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还对以往有核国家的核裁军作出了尖锐的批评。池田大作强调必须完全禁止核武器，不是部分领域的禁止，也不是部分国家的禁止，反映了池田大作废除核武器思想的全面性。废除核武器是维护生命尊严的充满勇气的重要途径。

3、促进生命尊严的文化途径

池田大作指出：“‘文化’是人类创造的复合体。习惯、法律、艺术、道德、科学、宗教等都是构成高度发达的复合体的因素”。池田大作还指出：“优秀的文化和艺术可以把人的心连结在一起，可以超越国境和体制，用共同的‘感动’把人们连结在一起。‘文化之路’是盛开优美的人性与智慧的花朵之路，是心灵之路，因而也是和平之路。”“‘把人类文化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我觉得这是实现‘全球文明’的美好的理想。”[38]上述论述阐明了人类在文化创造中的主体性、提高人类文化水平与实现 21 世纪和平的关联性，还阐明了通过文化的途径实现 21 世纪生命尊严的重要性。

池田大作非常重视文化的作用，亲手创立了民主音乐协会、东京富士美术馆、东洋哲学研究所等一系列文化机构，为文化的发展和文化的交流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池田大作生命尊严思想中文化具有重要的位置。促进各种文化的互相理解，互相借鉴。承认文化多元，促进文化创造，这是促进生命尊严的充满智慧的重要途径。

4、激励生命尊严的教育途径

池田大作指出：“教育是人生最神圣的事业。我个人也继承牧口先生、户田先生的遗志，创立了创价大学、创价学园。为教育不惜奉献自己的一切，是我毕生的信念。”他还指出：“我也在争取实现全面具备‘德、智、才、识’的人的教育”。“具有高尚的道德和洞察人生与社会的动向的智慧，发挥自己内在的才能，学习人类遗产的旺盛的求知欲——这才是‘全面的人’。”[39]上述论述阐明了教育的意义，把教育视为神圣的事业，表达了为教育而奉献的信念，进而阐明了教育的方针就是要培养“全面的人”。

池田大作亲手创办了创价幼儿园、创价小学、创价学园(包括初中和高中)、创价大学、美国创价大学。池田大作提出的创价大学建学理念是“人间教育的最高学府,新型大文化建设的摇篮,捍卫世界和平的要塞。”这个理念阐明了教育在塑造人格、创造文化、捍卫和平中的作用,实际上也是阐明了教育在实现21世纪生命尊严中的重要意义。池田大作生命尊严思想中,教育具有重要的位置。建设为了教育的社会,通过教育创造新的价值,以教育塑造人格,净化人们心灵,是激励生命尊严的充满希望的重要途径。

结　语

综上所述,池田大作生命尊严的思想与实践为实现21世纪生命尊严提供了思想的指南和实践的楷模。21世纪应该成为“生命尊严的世纪”。生命尊严是现代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观。生命高于一切,生命包括一切。生命尊严的实践就是要自我变革实行人间革命,就是要慈悲行动实现和谐共生。但是,当今世界存在着危害生命尊严的各种因素。我们要发扬池田大作生命尊严的思想和实践,积极开展和平与对话的活动,大力推进文化与教育的活动,为实现21世纪生命尊严不懈努力。

注　释:

①2005年在北京大学,2006年在华中师范大学,2007年在湖南师范大学,2008年在北京师范大学,2009年在辽宁师范大学,2010年在中山大学,2012年在上海师范大学,2014年在陕西师范大学先后举行了8届池田大作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

②从1983年开始,池田大作在每年1月26日SGI日(即国际创价学会日)都发表纪念倡言。在历年的纪念倡言中关于生命尊严思想作了大量的论述。

③池田大作:《论生命与佛教》,《池田大作全集》第11卷,圣教新闻社,1973年。参见石神丰:《走向调和与生命尊严的社会》,第三文明社,2008年,第229页。

④池田大作:《法华经的智慧》,《池田大作全集》第29卷,圣教新闻社,2001年。参见石神丰:《走向调和与生命尊严的社会》,第229-230页。

⑤池田大作:《人间革命》第4卷,圣教文库,圣教新闻社,1968年,第14-15页。

⑥同上,第59页。

⑦池田大作:《第26届SGI日纪念倡言》,《圣教新闻》,2001年1月26日。

⑧池田大作、汤因比:《面向21世纪的对话》,《池田大作全集》第3卷,圣教新闻社,1991年,第645页。

⑨池田大作、卡勒鲁奇:《文明——西方与东方》,《池田大作全集》第102卷,圣教新闻社,2003年,第20页。

⑩池田大作:《少年抄》,圣教新闻社,1974年,第3页。

⑪池田大作:《法华经的智慧》,《池田大作全集》第29卷,圣教新闻社,2006年,第52页。

⑫池田大作、汤因比:《面向21世纪的对话》,《池田大作全集》第3卷,圣教新闻社,1991年,第643页。

⑬池田大作:《池田大作全集》第1卷,圣教新闻社,1988年,第471页。

⑭池田大作:《池田大作全集》第2卷,圣教新闻社,1999年,第24页。

⑮池田大作:《我的人间学》,《池田大作全集》第119卷,圣教新闻社,1988年。参见石神丰:《走向调和与生命尊严的社会》,,第200页。

⑯池田大作:《幸福抄》,主妇与生活社,2003年,第18-19页。

⑰池田大作:《池田大作全集》第1卷,圣教新闻社,1988年,第457页。

⑱池田大作、汤因比:《面向21世纪的对话》,《池田大作全集》第3卷,圣教新闻社,1991年,第647页。

⑲池田大作:《池田大作全集》第 1 卷,圣教新闻社,1988 年,第 476 页。

⑳池田大作、季羡林、蒋忠新:《畅谈东方智慧》,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186 页。

㉑池田大作、汤因比:《面向 21 世纪的对话》,《池田大作全集》第 3 卷,圣教新闻社,1991 年。

㉒池田大作:《探究一个灿烂的世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 68 页。

㉓池田大作、季羡林、蒋忠新:《畅谈东方智慧》,第 148、151、116 页。

㉔同上,第 186 页。

㉕池田大作:《人间革命》第 1 卷,圣教新闻社,1965 年,第 3 页。

㉖池田大作:《池田大作全集》第 1 卷,圣教新闻社,1988 年,第 481 页。

㉗池田大作、季羡林、蒋忠新:《畅谈东方智慧》,第 52、186、191 页。

㉘同上,第 195、232 页。

㉙同上,第 232、233 页。

㉚池田大作:《池田大作全集》第 1 卷,圣教新闻社,1988 年,第 481 页。

㉛池田大作、季羡林、蒋忠新:《畅谈东方智慧》,第 54、64 页。

㉜池田大作:《新人间革命》第 1 卷,圣教新闻社,1973 年,第 11 页。

㉝池田大作、季羡林、蒋忠新:《畅谈东方智慧》,第 165 页。

㉞池田大作:《人道竞争的新潮流 -SGI 日纪念倡言》,创价学会广报室,2009 年,第 59-60 页。

㉟池田大作:《池田会长演讲集》第 7 卷,圣教新闻社,1966 年,第 11 页。

㊱池田大作:《迈向“第三个千年”:世界市民的挑战 -SGI 日纪念倡言》,创价学会广报室,1996 年,第 59-60 页。

㊲同上,第 60 页。

㊳池田大作、季羡林、蒋忠新:《畅谈东方智慧》,第 203、49、291 页。

㊴同上,第 36、60 页。

(汪鸿祥:日本创价大学教授、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责任编辑:胡令远)

(上接第 64 页)

㊸平石直昭「戦中・戦後徂徠論批判:初期丸山・吉川両学説の検討を中心に」、『社会科学研究』、1978 年。

㊹源了圓「序」、『徳川思想小史』、中央公論社、1973 年、1-10 頁。

㊺源了圓『徳川思想小史』、74 頁。

㊻子安宣邦『「事件」としての徂徠学』、青土社、1990 年 4 月、33 頁。

㊼子安宣邦『「事件」としての徂徠学』、34-35 頁。

㊽黒住真:《序言(中文)》,韩东育:《日本近世新法家思想研究》,第 7 页。

㊾参见拙作:《东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同步变革”》,《日本研究集林》,2013 年上半年刊。

㊿田口富久治、中谷義和編『現代の政治理論家たち:21 世紀への知の遺産』、法律文化社、1997 年、263 頁。

(51)有馬竜夫『丸山真男の世界』、みすず書房、1997 年、111 頁。

(52)古田光「丸山真男の思想と方法——現代における巨匠」、『潮』、第 88 号、1967 年 10 月、187 頁。

(魏灵学: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徐静波)

亲鸾的菩提心释

刘丽娇

内容提要　本文从近代中国佛学家杨文会与日本净土真宗僧人的一次争论入手，引出日本净土宗派特殊对待菩提心的问题。文章首先分析了日本净土宗开山祖师法然将菩提心剔除出往生行的过程，接着简单陈述法然此举在当时引起的激烈反应。在此背景下，本文主要探讨法然弟子、净土真宗开山祖师亲鸾如何应对上述批判并提炼出自己关于菩提心的特色主张，及其在法然的基础上如何对日本净土思想做出更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　菩提心　亲鸾　他力信心

亲鸾（1173–1262 年）被奉为日本净土真宗的开山祖师，是日本佛教史上极为重要的人物之一。一般来说，佛教无论哪宗哪派，论及菩提心似乎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过亲鸾在就菩提心进行论释之时却有着自己特殊的背景，因此本文将首先对这一特殊背景进行介绍，然后再论述亲鸾是如何在这种立场上就菩提心展开自己的见解的。

一、从杨文会对“去菩提心”的批判说起

1891 年，中国著名佛学家杨文会（1837–1911 年）从日本净土真宗大谷派僧人、著名佛学家南条文雄（1849–1927 年）处收到《七祖圣教》，七祖是指被亲鸾及净土真宗奉为祖师的七人，包括印度的龙树（2–3 世纪）和世亲（天亲，4–5 世纪），中国的昙鸾（476–542 年）、道绰（562–645 年）和善导（613–681 年），还有日本的源信（810–869 年）和法然（1133–1212 年），其中法然房源空是亲鸾的老师。杨文会在翻阅法然的著作《选择本愿念佛集》（简称《选择集》）时对其中的主张大感讶异，他又阅读了在中国传教的大谷派僧人小栗栖香顶（1831–1905 年）撰述的《真宗教旨》，认为二者主张违背经意，从而撰文批判并寄给了南条文雄。南条文雄回信时附上小栗栖香顶的《念佛圆通》与《阳驳阴资辩》两篇反驳文章，接着杨文会又去信批判这两篇文章，然后是一位叫龙舟的僧人代替病重的小栗栖香顶撰写《阳驳阴资辩续貂》与《念佛圆通续貂》再做反驳。而杨文会觉得再争论下去也毫无意义，于是结束了这场争论。中日佛教交流史源远流长，然而双方就佛教教理进行论争的情况却极为罕见。关于这场争论的详细情况可以参考陈继东的《清末佛教研究——以杨文会为中心》[①]以及中村薰的《日中净土教论争——小栗栖香顶〈念佛圆通〉与杨仁山》[②]等两本著作。

在杨文会对法然《选择集》和《真宗教旨》的批判中，重点对象之一就是法然的“去菩提心”主张。从《念佛圆通》中对杨文会反驳意见的归纳可以看到杨文会对此的主要观点，“菩提心为因果交彻之心，诸佛极果，名为阿褥多罗三藐三菩提。此集并菩提心而舍之，不知以何为

佛也”,“无因如何得果。以菩提心之正因,方能契无上妙果,句义且不能通,何能论佛法”[③]。杨文会认为,菩提心既是因又是果,众生不发菩提心便不可能证得无上妙果,可以说这是众生修佛的根本,如果连菩提心都舍弃,那就无从谈佛修佛了。

二、法然的“舍菩提心”与明惠的批判

1.法然的“舍菩提心”义

事实上,在佛教的一切经论释中,唯有法然的《选择集》是明确提出要舍弃菩提心的,这一论断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那么,法然究竟是如何提出这一主张的呢? 首先是《选择集》第三章“彌陀如來不以餘行為往生本願、唯以念佛為往生本願之文”。这一章首先引用了《无量寿经》中第十八愿作为阿弥陀佛发下的本愿,“設我得佛,十方眾生,至心信樂欲生我國,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覺”[④],并在此展开论述,认为诸多佛土各自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菩提心、六念、持经、持咒、起立塔像、饭食沙门、孝养父母、奉事师长等一行或多行为往生行。然而阿弥陀佛“今選捨前布施·持戒乃至孝養父母等諸行,選取專稱佛號”[⑤],以此证明往生西方极乐净土之行唯有念佛,菩提心等余行则是被舍弃的。

在依据本愿确定念佛行为往生行之后,法然接着在第五章“念佛利益之文”中对念佛的利益进行阐述,并再次提出菩提心的问题。引文如下:

> 私問曰。準上三輩文,念佛之外舉菩提心等功德。何不歎彼功德,唯獨讚念佛功德乎。答曰。聖意難測,定有(深)意。且依善導一意,而謂之者,原佛意正直雖欲說唯念佛之行,而隨機一往說菩提心等諸行,分別三輩淺深不同。然今於諸行者,既捨而不歎。置而不可論著也。唯就念佛一行,既選而讚歎。……(中略)……此大利者,是對小利之言也。然則以菩提心等諸行而為小利,以乃至一念而為大利也。[⑥]

“念佛利益之文”一章主要赞叹念佛行具有无上利益,并且通过与其他修行方式比较来烘托出念佛行的优势,而被比较的就是以菩提心为主的其他行。在上述引文之前,法然首先引用了《无量寿经》的一段话,“佛語彌勒。其有得聞彼佛名號,歡喜踴躍,乃至一念。當知,此人為得大利。則是具足無上功德”[⑦],然后根据此文主张念佛行是唯一被选择赞叹的修行方式,具有无上大利。相应地,菩提心等他行则是小利,被“捨而不歎”、“置而不論”,因此提倡舍弃菩提心等余行,一心专修念佛。

不仅如此,在舍弃菩提心之后,法然更是在第十二章“釋尊不付屬定散諸行、唯以念佛付屬阿難之文”中提出菩提心会妨碍念佛行,因此必须舍弃。在这一章中,法然首先根据善导的《观经四帖疏》(简称《观经疏》)将诸行分为定散善行与念佛行,接着依次诠释定善十三观、散善三福九品与念佛的内容意义,最后结论是《观无量寿经》“說定散,為顯念佛超過餘善”、“故今定散為廢而說,念佛三昧為立而說”[⑧]。而菩提心就是三福中第三“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中的首要内容,自然在被废除的范围之内,并且“此四箇行、當世之人、殊所欲之行也。以此等行、殆抑念佛”[⑨]。换言之,当时世人尤其希望修上述四种行,念佛反而受到压制,也就是说菩提心等行对念佛行产生了妨碍。总而言之,《选择集》多处提到菩提心是被废弃的行,它不在阿弥陀佛选择的本愿之中,不如念佛行那样具有无上利益,只具有小利而已,并且还会压制妨碍念佛之行。

一般来说菩提心包含两种意义,一是愿作佛心,一是利他心,可以说它是大乘佛教中学

佛修佛之人的基本，而法然明确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出要废除菩提心，这种言论显然是非常大胆的，也可以想见必然会招致强烈的批判。

2.明惠的批判

事实上，在法然去世（1212 年，建历二年）数月以后，华严宗的明惠房高辨（1173–1232 年）读到《选择本愿念佛集》后立刻撰写《於一向專修宗選択集中摧邪輪》（简称《摧邪轮》）三卷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明惠认为《选择集》的过失主要有两点，一是对菩提心的舍弃，一是将圣道门比喻为群贼，而对前者的批判又是重中之重，占据全书绝大部分篇幅。明惠对法然去菩提心之过的批判详细分为五个部分，“一以菩提心不為往生極樂行過、二言弥陀本願中無菩提心過、三以菩提心為有上小利過、四言双觀經不說菩提心并言弥陀止住時無菩提心過、五言菩提心抑念仏過也”[10]。归其要点，一是明惠对菩提心义的理解，二是在此基础上从以上方面逐个反驳。

首先，明惠是如何阐释菩提心的意义的呢？对此，明惠先引用善导《观经疏》、引元晓《游心安乐道》[11]、道绰《安乐集》、天亲《净土论》等说明各家的菩提心义，并总结道，“言菩提者、即是仏果一切智智、言心者、於此一切智智起希求心，指此云菩提心。一切仏法、皆依此心得生起”，并且，“此希求心、隨初後位有淺深不同。言其不同、亦有多種”[12]。在此，明惠以华严为例，解释菩提心由浅至深有缘发心、解发心、行发心、体发心四种。而根据善导的意思，净土菩提心相当于缘发心的水平。不仅如此，明惠进一步论述道，虽然各家各宗的菩提心或说因起、或说行相，看似不同，实则在根本上都是相同的：“謂其体者、於応得等三仏性中、即是加行因性”，“加之菩提心者自性空為義。空法即無有差別也”，“依之竜樹大聖造菩提心離相論、演菩提心性無相義。……菩提心者、離一切性……謂蘊処界離諸取捨、法無我平等、自心本來不生。自性空故”[13]。要言之，按照明惠的理解，菩提心可分为两层，一是众生求佛果之心，这是一切佛法的起点，随着修行方式的加入，各宗各派逐渐建立不同的菩提心义；二是从体性上说，一切法无我平等，菩提心亦是如此，这是从大乘佛教根本佛理的角度切入，所有宗派包括净土宗的菩提心都具有这一根本体性，所以说是无差别的。

接着，明惠又就菩提心与净土的关系做了阐释：“夫以無漏淨識所変名淨土。淨識所変故、華池宝閣、有清淨形質。內外俱淨故名淨土也。……然淨識者、即是菩提心也。故一切淨土以菩提心為正因也……非唯為淨土正因、以菩提心亦為淨土体也。……故諸經論中、出淨土正因、先勧発菩提心”[14]。简言之，菩提心既是净土之体，又是众生往生净土之正因。可以看出，这种解释与上述菩提心义是互相契合的。

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明惠势如破竹一一驳斥了法然《选择集》中去菩提心的观点。从根本上来说，“謂菩提心者、自性空為性。……然汝相違菩提心、立別念仏心。即是可為性有心。然三宝四諦、皆畢竟真空為性故、汝雖不作意、不覚而撥去之也。若云性有者、即同数論外道計有性与諸法一”[15]。言下之意，菩提心以性空为体，法然舍弃菩提心，另立念佛心，这是堕入性有的外道邪见，不仅不是圣道门，而且也违背了净土门的教旨。此外明惠就前文提出五点一一进行反驳，例如《无量寿经》之中说法藏菩萨发无上正觉之心即菩提心，四十八愿中处处言及菩提心，被法然视为本愿的第十八愿中提到“至心信乐”即菩提心，因此弥陀本愿并未舍弃菩提心，法然离菩提心而选念佛行是舍本取末；[16]又说法然以菩提心为有上小利、以称名为无上大利是天地颠倒之言，诸经皆以菩提心为最胜法门，法然所引《无量寿经》中“佛语弥勒、其有得闻彼佛名号欢喜踊跃乃至一念”一文，其中“欢喜踊跃乃至一念”即华严菩提心中缘发

心；[17]对于法然以菩提心等为念佛障碍之论，明惠表示“彼念佛三昧等、以菩提心為体性也、……然汝以菩提心為念佛障礙、甚以不可思議不可思議、奇異奇特、言語道断、心行処滅、不可說未曽有也”。[18]

综上所述，法然为了摆脱长期以来净土宗作为寓宗寄生于各宗派之下的处境，着力强调称名念佛行的优越之处，甚至连菩提心都在被废除的范围之内。通过法然的努力，净土宗终于获得了独立的地位。然而，法然大胆提出的废除圣道门、建立净土门的思想主张，遭到当时圣道门各宗派激烈的反对态势，其中尤以明惠的《摧邪轮》为典型。由于法然在自己的著作中几乎不太涉及大乘佛理的部分，如何回应明惠等人围绕菩提心提出的激烈批判的课题自然落在法然的弟子们身上。在解读亲鸾对于菩提心的理解时，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一思想背景。

三、亲鸾对“菩提心”的解释

1.菩提心的回归

面对明惠等人对法然思想是外道的批判，亲鸾等弟子开始运用大乘佛理重新对法然的佛教主张进行解释。尤其在被明惠着重强调的菩提心方面，虽然法然明确提出往生净土的行之中不包括菩提心，但在亲鸾的解释中，菩提心又回到了净土思想结构中，这从亲鸾的主要著作《显净土真实教行证文类》中多处出现“菩提心”文字一点上就可以看出。

例如在《行卷》中，亲鸾引用道绰《安乐集》中的文段，“若人菩提心中行念仏三昧者一切煩惱一切諸鄣悉皆断滅”[19]；又如《信卷》中引用源信《往生要集》道，“得菩提心不可壞藥一切煩惱諸魔所不能壞……菩提心住水宝珠入生死海而不沈沒……菩提之心亦復如是於无量劫処生死中諸煩惱業不能断滅亦无損滅”[20]；同《信卷》中引用《华严经贤首品》中文，“若為諸仏所護則能発起菩提心若能発起菩提心則能勤修仏功德若能勤修仏功德則能生在如來家”[21]；引用昙鸾《往生论注》言，“願生彼安樂淨土者要発无上菩提心也”[22]等等。由此可知，亲鸾取回了被法然丢弃的菩提心，多处提到菩提心的重大功用，能断灭一切烦恼。无论是为了往生安乐净土还是生在如来家，都必须发起菩提心。此处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亲鸾引入了诸多大乘佛理来解释自己从法然处继承的净土思想主张，这一方面是对明惠等圣道门诸派抨击的回应，一方面以此坚持己派思想的传统性与合法性，突出自己的思想特色。

2.亲鸾“菩提心”的基本意义

首先让我们看看亲鸾是如何从佛教普遍意义上来解读菩提心的。

在《信卷》中，亲鸾引用道绰《安乐集》中一段话道，“大経云凡欲往生淨土要須発菩提心為源云何菩提心者乃是无上仏道之名也若欲発心作仏者此心広大周徧法界此心長遠尽未來際此心普備離二乘鄣若能一発心傾无始生死有輪”[23]。由此可以看出亲鸾对于菩提心的基本态度，往生净土必须发起菩提心，且菩提心是无上佛道。换句话说，得此菩提心即可往生净土、得无上佛道、证无上佛果，因此菩提心是根本与根源，同时也说明往生净土世界与证得无上佛果是相等的。这一点更详细地体现于亲鸾在《证卷》中的一段论述中：

> 案王舍城所說無量寿経三輩生中雖行有優劣莫不発皆无上菩提之心此无上菩提心即是願作仏心願作仏心即是度眾生心度眾生心即是攝眾生生有仏国土心是故願生彼安楽淨土者要発无上菩提心也若人不発无上菩提心但聞彼国土受楽无間為楽故願生亦當不得往生也是故言不求自身住持之楽欲抜一切眾生苦故住持楽者謂

彼安楽淨土為阿弥陀如来本願力之所住持受楽无間也。[24]

此处说道，菩提心即是愿作佛心，是度众生心，愿生安乐净土之人必须发菩提心、拔除众生之苦，否则只为一己之乐是无法往生净土世界的。由此可知，亲鸾理解的菩提心有两个内容，一是自利之愿作佛心，一是利他之度众生心，这与其他一切圣道各派对菩提心的基本理解是一致的，亲鸾以此证明己派思想并非所谓的外道邪说。

不仅如此，亲鸾还进一步解释道，追求无上菩提的法门中有三种相违法需远离，即依智慧门不求自乐远离我心贪著自身、依慈悲门拔一切众生苦远离无安众生心、依方便门怜悯一切众生心远离供养恭敬自身心；相应地由此可得三种随顺菩提门法，即无染清净心、安清净心、乐清净心。而且，菩提是毕竟长乐处，此毕竟长乐依大乘门即安乐佛国土而得。[25]由此可知，依靠智慧、慈悲和方便获得无染清净心、安清净心和乐清净心，而菩提是无染清净处，是安稳一切众生清净处，是毕竟长乐处，因此通过发菩提心证得大菩提即是证得大涅槃，是最终佛果。但同时，亲鸾多次提到往生净土需发起菩提心，又说菩萨凭借智慧心、方便心、无鄣心、胜真心四种清净功德能生在清净佛国土。因此在亲鸾看来，大涅槃的境界就是清净佛果土即西方极乐净土世界。既然如此，那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必需条件是菩提心也就理所当然了。

既然法然主张抛弃菩提心，而亲鸾又将一般佛教意义上的菩提心重新纳入净土思想结构中来，这是不是说亲鸾违背了法然的主张呢？答案自然是否定的，亲鸾对法然的全心信赖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上，亲鸾对于菩提心的解释并未止步于圣道门各派共通的愿作佛心与度众生心等基本意义，而是更进一步阐释了净土菩提心的特殊之处，彻底确立净土宗派的独立性。

3.亲鸾净土菩提心的他力性质

亲鸾主张的菩提心义一方面包括佛教一般意义上追求涅槃境界的内容，毕竟净土思想在根本上也是佛教宗派，其根本目的是了悟缘起性空真理、证悟无上佛道。与此同时，亲鸾对于菩提心的解释又具有浓重的净土思想色彩，既完成了法然净土思想在大乘佛理方面欠缺的未竟之业，又在佛教其他宗派面前完全显示了自己的特点与独立性。这在《信卷》中下面一段论述中有完整的体现：

> 然就菩提心有二種一者竪二者横又就竪復有二種一者竪超二者竪出竪超竪出明権実顕蜜大少之教歷劫迂廻之菩提心自力金剛心菩薩大心也亦就横復有二種一者横超二者横出横出者正雜定散他力中之自力菩提心也横超者斯乃願力廻向之信楽是曰願作仏心願作仏心即是横大菩提心是名横超金剛心也横竪菩提心其言一而其心雖異入真為正要真心為根本邪雜為錯疑情為失也忻求淨刹道俗深了知信不具足之金言永応離聞不具足之邪心也。[26]

这里是依据佛教各宗派不同修行方式对各派菩提心进行判定与分别。总的来说，亲鸾将各宗派菩提心分为两种，一种是竖菩提心，一种是横菩提心。竖菩提心是指历经很长时间、通过自力不断修行以最终证得佛果，具体指圣道门显密各宗；横菩提心则指依靠阿弥陀佛他力证得佛果，即净土门，其中相信弥陀他力又不能完全放弃布施、持戒、孝养父母等定散自力诸行的是横出菩提心，而横超菩提心是愿力回向信乐，叫作愿作佛心、横大菩提心、横超金刚心。横超是指“大願清淨報土不云品位階次一念須臾頃速疾超証无上正真道”[27]，横超菩提心即净土菩提心。原理是法藏菩萨立下四十八愿，然后历经无量数劫、修无量数行最终成就这

些誓愿，建立西方极乐净土世界，法藏菩萨成为净土之主阿弥陀佛，而愿中即有令众生往生净土最终成佛的誓愿，由于末法时代世人根机恶劣，无法再依靠自己的力量逐步证得佛果，因此只能依靠阿弥陀佛誓愿的力量，且因着弥陀愿力从而可以急速证得无上菩提。而此横超菩提心就是由法藏菩萨所成就的，由阿弥陀佛回向给世人，因此净土菩提心是他力菩提心，是“願力廻向之信楽”。这从“真実信心即是金剛心金剛心即是願作仏心願作仏心即是度眾生心度眾生心即是攝取眾生生安樂淨土心是心即是大菩提心”[28]中“攝取眾生生安樂淨土心”这一亲鸾的论述中也可以看出。

如此一来，虽说净土菩提心最终还是愿作佛心、度众生心等，但在根本上这是阿弥陀佛成就的他力大菩提心，与其他宗派的个人发起菩提心、通过不断地自力修行逐步证得佛果的方式完全不同，前者是自上而下，后者是自下而上的。如同上文的判定一样，亲鸾通过“横、竖、超、出”的判断标准，不仅强调了净土门的独立性，而且突出了净土门相对于其他各宗各派的优越性。

四、结　语

法然在《选择集》中提出专修念佛的主张，要求一心皈依阿弥陀佛，依靠阿弥陀佛本愿他力，为此主张阿弥陀佛唯独选择念佛为往生净土行，而废弃了其他一切包括菩提心在内的修行方式。这一思想不仅让几百年后中国的杨文会感到不可置信，也被当时日本的明惠等僧人斥为性有外道之见。

对于法然去菩提心的做法，日本净土宗的普遍理解是法然将求佛之道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在世阶段，于此阶段世人当专修念佛易行、依靠弥陀他力的接引往生西方极乐净土；二是进入净土以后的阶段，于此阶段往生之人开始修习菩提心、戒律等各种难行，最后达到涅槃。例如法然在《念仏大意》一文中说，“所谓往生净土门，私以为是先生于净土，后于彼处开悟成佛。此曰易行道”[29]。这在 1322 年净土宗僧人了惠为反驳明惠《摧邪轮》而著的《新扶选择报恩集》中也有明确体现。因此，在法然看来，往生净土是为凡夫准备的证大涅槃之前的初级阶段，在到达初级阶段之前不需要发菩提心，只需念佛即可。

而亲鸾对此做出了进一步的发展。如上所述，亲鸾首先是将往生净土与开悟成佛等同起来，并不像法然那样明确分为两个阶段，因此对于往生净土心的解释二者也不一样。法然继承善导的解释将此心按照至诚心、深心、回向发愿心三部分凡夫易发的内容来理解；而亲鸾则根据《大无量寿经》中第十八愿将往生信心分为至心、信乐、欲生三部分来解析，融入更多的大乘佛理，与愿作佛心、度众生心、大菩提心等联系起来，通过获得此信心或说大菩提心直接证得佛果。并且，此大菩提心不同于其他宗派的自力菩提心，此心由弥陀愿力成就然后回向给凡夫，从而将他力思想贯彻到底。

综上所述，本文以菩提心为线索，分析了亲鸾的净土思想如何在法然思想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法然单独提出称名念佛为往生净土的唯一修行方式，改变了之前净土思想一直作为其他宗派之寓宗的地位，并且确立《大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为净土宗根本经典，确定《大无量寿经》中法藏菩萨所立第十八愿为本愿，以本愿他力为往生净土之根本因。可以说法然的净土思想为亲鸾提供了基本框架。在此基础上，亲鸾进一步将净土思想中他力因素贯彻到底，并将证悟佛果与往生净土等同起来，尤其是现生正定聚思想的导

入,赋予了现世更加积极的意义。

注　释:

①陈继东:《清末佛教研究——以杨文会为中心》,山喜房佛书林,2003 年,第四章《与日本净土真宗的论争》。

②中村薰:《日本净土教论争——小栗栖香顶〈念佛圓通〉与杨仁山》,法藏馆,2009 年。

③小栗栖香顶:《念佛圓通》,陈继东:《清末佛教研究——以杨文会为中心》资料篇,第 603 页。

④源空:《选择本愿念佛集》,真宗圣教全书编纂所:《真宗圣教全书　一　三经七祖部》,大八木兴文堂,1995 年,第 940 页。

⑤同上,第 942-943 页。

⑥同上,第 952 页。

⑦同上,第 951-952 页。

⑧同上,第 981 页。

⑨同上,第 982 页。

⑩高辨:《于一向专修宗选择集中摧邪论》,镰田茂雄、田中久夫校注:《日本思想大系 15　镰仓旧佛教》,岩波书店,1980 年,第 319 页。

⑪元晓(617-686 年),新罗僧侣,现在一般认为《游心安乐道》并非元晓之作。

⑫高辨:《于一向专修宗选择集中摧邪论》,第 320 页。

⑬同上,第 321 页。

⑭同上,第 324 页。

⑮同上,第 335 页。

⑯同上,第 330-331 页。

⑰同上,第 338-339 页。

⑱同上,第 364 页。

⑲亲鸾:《显净土真实教行证文类》,星野元丰、石田充之、家永三郎校注:《日本思想大系 11　亲鸾》,岩波书店,1971 年,第 279 页。

⑳同上,第 311 页。

㉑同上,第 316 页。

㉒同上,第 322 页。

㉓同上,第 325 页。

㉔同上,第 354 页。

㉕同上,第 355-356 页。

㉖同上,第 319-320 页。

㉗同上,第 322 页。

㉘同上,第 322 页。

㉙法然:《要义问答》,大桥义雄:《法然全集　第三卷》,春秋社,1989 年,第 182 页。

(刘丽娇:北京大学外文学院日语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徐静波)

日本丸山论的诸相

——以《谁的思想史,为谁写的思想史》为线索

魏灵学

内容提要 自《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等代表作刊行伊始,丸山真男的系列理论便成为日本战后学界讨论的焦点,而在1996年丸山真男先生驾鹤之后,中日两国更是掀起了一股"丸山学"的热潮。纵观国内丸山研究,葛兆光先生《谁的思想史,为谁写的思想史》一文独树一帜,此文以"走出汉学界"为命题,以丸山真男及其反对者的理论为线索,详细阐述了日本学界对本国思想史的研究及此对中国学者的启示——以其为线索,或可进一步把握日本丸山论的诸相,了解到民众思想史学派与新儒家学派的丸山批判。

关键词 丸山真男 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 原型 古层 民众思想史 新儒家学派

一、作为"方法"的丸山真男——国内丸山研究剪影

在中国思想史领域内,葛兆光先生的《谁的思想史,为谁写的思想史》(以下简称《谁的》)在方法论层面上颇具创新意义。开篇伊始,葛兆光先生便提出了所谓"走出汉学界"的命题。但是,学界对于《谁的》的学术定位往往局限于中国思想史领域,却忽略了此文内容的半数为"近年来日本学界对日本近代思想史的研究"。事实上,本文的第一章《从〈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说到日本近代思想史研究界的一般方法》与第二章《近年来日本思想史界的批评与超越》乃是对日本丸山真男及"反丸山者"理论的介绍——故在国内日本学界(主要是丸山研究领域内),《谁的》亦具有一定意义。

中国的丸山研究自80年代便已起步,1992年,区建英教授于《福泽喻吉与现代化》的译者序《福泽喻吉研究与丸山真男》中已经谈及了丸山学术的方法意义:

> "一、丸山教授的哲理发掘作业,是从极其一般的常识、甚至人们不屑一顾的普通事实出发的……二、丸山的学问方法是很精密的,他在对每个课题进行具体研究时,绝不会把整体性的问题无规则地包揽进去……三、他在集中探讨某具体问题时,其逻辑的展开反倒是多歧的,至少不是那么单纯清晰的……"①

在此序发表17年后,区建英教授依然反复强调着丸山在福泽谕吉研究中所体现出的"方法论"价值:

> "丸山教授有关福泽谕吉研究的特色……在于他把贯穿于福泽整个思想的观察问题和价值判断的方法揭示出来了,对福泽思维方法的发现才是其学术价值之

基金项目:复旦大学"望道项目"《日本近代亚洲观念的历史变迁——理论政策与舆论的互动》(项目编号:11102)

所在。”②

第二位论述丸山思想“方法意义”的中国学者乃是孙歌教授，她进一步指出了丸山理论具有“超日本”的适用性：

> “丸山真男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便具有了两个不可分割的侧面：一方面具备鲜明的现实批判精神和政治意识形态功能，另一方面又具有超越一时一地的具体问题而使思想上升为普遍原理的力量。”③

而《谁的》则在此之外对日本丸山及“反丸山”的理论进行了高度概括，并进一步深入分析了其于中国思想史研究之借鉴意义。

> “日本学界对日本近代思想史的研究，特别关注思想史的社会环境、日常生活和常识世界的实际情况；注意‘顺着看’而不是‘倒着看’，也就是注意从日本自身的资料和历史脉络来追溯思想史，而不是以某种后设的、现代的价值立场来描述思想史；同时他们也有很自觉的亚洲史视野，十分关注日本以外，特别是互为背景和资源的近代东亚尤其是中国和朝鲜的思想史。”④

综上所述，《谁的》一文继区建英、孙歌两位教授之后，将对丸山（及“反丸山”）理论“方法意义”的阐释延伸到了中国思想史领域并使之具体化。换言之，只有从“丸山学”本身出发，在“回归丸山”的基础上，方可理解葛兆光先生在此文中提出的“走出汉学界”的宏大命题。

二、“回归丸山”——《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与“原型·古层”理论

在第一章《从〈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说到日本近代思想史研究界的一般方法》中，葛兆光先生对丸山的日本思想史研究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并将其总结为“古层”与“顺着看”两种方法。而在第二章《近年来日本思想史界的批评与超越》首段的前半，葛兆光先生又承接了第一章结尾“在丸山研究中，这两种方法是否被真的贯彻使用了”的问题，对丸山理论的矛盾性进行了总结：

> “首先，是他所说的‘古层’或者‘低音’，究竟应当如何理解？尽管丸山一再强调这种作为背景和资源的固有文化存在的意义，但他仍然比较多地看重了上层，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思想家的思想、政治家的政治和学者的学术，而不是真的存在于普通生活世界的东西……其次，尽管他一再提醒人们也提醒自己，不要用后设的观念去看过去的历史，但是他心中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即‘近代’……”⑤

很明显，葛兆光先生注意到了丸山思想的自我矛盾——即“近代主义”与“日本主义”的二元对立，而这乃是回归到丸山理论中去的第一要义。

1、《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顺序问题”

欲理解丸山《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一书，首先需考察其学术定位问题。与拥有漫长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传统的西方不同，在日本，“政治思想史作为一门学科出现，始于1940年，由丸山真男先生开山，奠定了这门新学问”⑥，而藤田省三更是将大冢久雄的西方经济史、丸山真男的日本政治思想史与川岛武宜的法社会学并列为战后日本思想界的先驱。⑦是故此部著作乃是日本政治思想史学科创立的标志——或者说，代表了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最初“范式”。

其次是这本书的诞生背景问题。“1934年4月，丸山真男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政治

学科学习……1937 年 4 月，丸山留校任法学部的助教，在指导教师南原繁的劝导下专攻日本政治思想史。”[8]这期间，“时值中日战争激化，右翼与军部势力抬头……丸山改变了原先对资本主义性质的蔑视，重新审视起基本人权的理念。”[9]基于此，丸山从荻生徂徠（德川时代）与福泽谕吉（明治时代）的思想入手开始了自己的“政治思想史”研究生涯，其中在德川思想方面取得的成就集中体现在《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一书中。

这部作品，正是丸山与以“近代的超克”为代表的当时日本的反近代主义观念进行斗争的产物，他指出：

> “写作这些论文时，在知识界，正是‘近代的超克’大行其道之时代……对于这种‘近代的超克’论及在背后支持它的全体主义思潮感到强烈不满的知识分子与研究人士都觉得有责任在各自领域内为被作为‘替罪羊’的‘近代’作出辩护。”[10]

不难看出，“近代性”乃是这部作品的第一属性，而丸山自己亦明确地承认“（《日本政治思想史》）包含有超过纯粹学术关心的动因”[11]——可以说，支撑丸山此著的乃是一种“倒着看”的思维，即其工作的核心即孙歌所谓“使西方资源在日本的本土语境里完成相应的‘意义转换’。”[12]

最后是此书的叙述方法问题，此书在很大程度上带给读者一种“顺着看”的“错觉”，这乃是其所采用的叙述方式造成的。在全书第一章《近世儒学发展中徂徠学的特质及其与国学之关联》与第二章《近世日本政治思想中的自然与作为》中，丸山指出：

> “通过儒教内部的发展，其思想‘自解体’，进而从内部萌生出了完全异质的要素。”[13]

于是乎，“儒学（宋学）—徂徠学—国学”成为了丸山对德川政治思想史的高度概括，丸山式的、日本朱子学“自解体”的叙述似乎是“顺着”德川思想的发展展开的，但这与历史事实并不完全符合，正如张翔教授所明确指出的：

> “丸山的观点无法解释近世后期，即 18 世纪以后的儒学，尤其是朱子学的普及化、官学体制化（宽政异学之禁）的历史意义……由于天明、宽政时期的日本社会的动荡和民众反叛，促使幕藩体制重新确立了朱子学作为武士和一般民众的道德规范和秩序重建的基本原理来应对当时的社会矛盾（道德学与经世论），这导致了近世日本幕藩政府武士阶层的文官化，也促进了武士和一般民众以儒学为中心的道德教化。”[14]

总言之，《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基本立场乃是“近代主义”（“倒着看”），读者所感受到的所谓“顺着看”乃是丸山对于“朱子学”自解体的叙述方式所带来的“错觉”。

2、“原型·古层”理论

《谁的》在讨论“丸山用来分析日本近代思想史的两个方法”时似乎将“古层”作为了《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一书中的方法：

> “由于这部著作被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丸山真男用来分析日本近代思想的两个重要方法，第一个是所谓‘古层’和‘执拗低音’……”[15]

这种将“古层”论作为《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是误读了丸山思想——“原型·古层”论乃是丸山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至 80 年代中叶提出并逐步完善的理论，故这里有必要对其加以详细介绍。

20 世纪 50 年代中叶以降，日本思想界对以“近代”为核心的战后[16]社会理论展开了全面

抨击——而丸山《日本的思想》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生发的。此书乃是丸山思想的一个转折点，它标志着丸山工作重心由“超国家主义”批判和市民社会论向日本精神类型的“原型·古层”论的嬗变，甚至有学者提出这标志着丸山由“近代主义者”向“日本主义者”的转型。[17]

首先，《日本的思想》一书之雏形乃岩波讲座《现代思想》第 11 卷的首篇《现代的思想》，而《现代思想》第 11 卷本身便是针对战后日本思想界中的诸多问题而来的，其中收录了鹤见俊辅的《战后日本的思想状况》、石田雄的《天皇制问题》、日高六郎的《世代》、崛田善卫的《日本知识分子》、清水几太郎的《和平的问题》、上山春平的《思想中的“和平共存”问题》、粟田贤三的《自由的问题》、桑原武夫的《传统与近代化》、真下信一的《战争责任问题》与清水几太郎的《日本的革命》，故丸山的《现代的思想》必须对全书起到“总领”的作用：

> “在编辑此卷时，责任编辑清水几太郎强烈提出首先要对战后思想的历史、逻辑背景进行一般性的概述，并将这个任务分派给了我。”[18]

其次，在《日本的思想》中，丸山延续了自己的近代主义（“近代式”）理论（或说从另一重维度加以阐释）：

> “我觉得，那些说我只暴露日本的缺陷和病理、将西欧近代加以‘理想化’后利用两者落差来对日本思想分段等等之类的观点根本不正确，甚至可以说是明显的误解……”[19]

最后，丸山明确指出，《日本的思想》一书，就是对之前研究的一次“整合”，也是之后研究新的“起点”：

> “在这里，包含了我大学毕业以来面临的各种各样的学问的课题以及在探索过程中不可避免地留下的我的思想路程，与此同时，这也构成了以后的研究方向与新的起点。”[20]

以《日本的思想》为标志，丸山转变了研究思路，“原型·古层”论成为 20 世纪 60–80 年代丸山最为突出的理论成就。有学者指出，“（古层论）是丸山同类论文中最具魔力与魅力的作品……揭示出日本思想史深层隐藏的秘密”[21]。当然，不可否认丸山这种探究日本思想在迈向近代过程中“深层秘密”的尝试早在《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一文的《后记》部分中已经体现出来：

> “（本书）第一和第二章共通的中心思想是：封建社会的正统世界观是如何从内部崩溃的。通过对这个课题的解构，我试图探究广义的日本社会和狭义的日本思想近代化的类型及其相对于西欧和亚洲其他国家所具有的特质。”[22]

所以说，“原型·古层”理论并不是丸山思想的一次“断裂”，而是之前工作的延续。1963 年，丸山于东大的课堂上第一次提出了“原型”论：

> “所谓‘原型’是指社会的结合样式及政治行动样式的原初形态，以及神话、古代传说中所表现出来的思考模式和价值观念(文化)。”[23]

在探寻“原型”的过程中，丸山理论不断嬗变。讲义第七卷中，他将原本被“抛弃”的儒学重新捡起，强调其中蕴含所蕴含的“礼”的“超时空性”：

> “要挑剔儒学者的陈腐说辞与儒学中可怕的权威主义倾向甚易。然而儒学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区别人与禽兽——他们给出的答案是‘礼’，只有‘礼’才是区别人与禽兽的标志，换言之，只有这种差别中才隐含了人类尊严的理念。”[24]

在《现代政治思想与行动（合本增补版）》的《追忆与补记》中，丸山亦提到：

“(我的研究)至少没有将‘前近代性’和‘封建性’作为解释日本社会的钥匙。”㉕

1972 年的《历史意识的“古层”》一文中,丸山用“古层”置换了“原型”,他指出:

“(‘古层’与‘原型’相比)实质上并没有改变……因为它的超越时代持续运动的层次性更加明确……它至少不象‘原型’那样给人一种宿命论之感。”㉖

1984 年,丸山在《原型·古层·执拗低音——寻找日本思想史方法论的我的足迹》中解释了围绕“古层”的几点争论,论述了“古层思想”产生的原因以及采用“执拗低音”这一概念的缘由所在——此文标志着丸山“古层”论的最终定型。

综上所述,所谓丸山理论内部“近代主义”与“日本主义”二元并立的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丸山真男展开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源于西方资源,即使用西方术语(或说西方近代化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概念”)考察日本问题——这与丸山青年时代形成的广泛而深厚的西学(尤其是在政治学与哲学方面)素养是密不可分的:

“我在高中时,可谓是文学青年、哲学青年,况且哲学对于学习语言帮助颇深,因此我阅读了大量哲学书……所读的书,主要是新康德主义的文德尔斑、李凯尔特的。”㉗

“从学生时代起我在朋友和前辈中结交了不少的马克思主义者,这对我学问的深造极其有益,培养了我从经济、哲学互动关系上思考政治问题的习惯。”㉘

而在其后期的日本思想研究(即“原型·古层”论)中,对于西方资源的使用逐渐转化为“隐性”,即将西方的研究方法“日本化”——然而其方法论的来源依然是西方的,1978 年,他在论文《思想史探索之方法》中写道:

“让我茅塞顿开的是曼海姆理论中的远近法,通过这种认识方法,我打破了新康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所共有的对象与认识一一对应的关系, 同时让我们开始思考解密思想史发展特有形态的关键所在……”㉙

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西方思想(尤其是政治学、哲学)始终是丸山学说展开的“基本工具”,而丸山研究的对象集中在日本思想史领域,具体表现在对于德川幕府徂徕学等同时期思想的考察与对明治时代福泽谕吉等同时代知识分子的研究,即其学说展开的“基本领域”乃是日本思想,故丸山理论中出现这种“近代主义”与“日本主义”的矛盾性便也不难理解了。《谁的》的第一章与第二章首段的前半部分,正是以这种矛盾性为线索展开的针对丸山的“内部性研究”,从第二章首段的后半部分开始,文章“跳出丸山”,对近年来日本思想史界的反丸山理论进行了概述。

三、“跳出丸山”——“民众思想史研究”与“新儒家学派”

《谁的》之前(甚至其后)的国内学界对于日本丸山批判的关注点往往集中在“近代的超克”、后现代主义立场、保守主义立场以及个人性论述(如米谷匡史、吉本隆明等)等几类“直接的”、“专题性的”丸山研究成果,反而忽略了其他一些在研究过程中“遭遇”丸山的学者所做出的“回应”。虽然国内学者如韩东育教授、张翔教授等在具体的研究之中已经对这一点有所触及,但并未形成系统的“外在式的”丸山研究——就这一方面而言,《谁的》在国内丸山研究领域确实地位独具。

1、“民众思想史研究”与丸山理论的博弈

《谁的》对于日本丸山批判的第一方面介绍是以“民众思想史研究”为核心展开的：

“在第一方面……这一思路显示的一个倾向，就是研究者开始摆脱精英与经典的‘悬浮式’分析，转而关注作为古层、低音和土壤的社会生活史和一般思想史。”[30]

在随后的论述中，《谁的》简要列举了若干学者的“民众思想史”研究方法，但是忽略了“丸山学派”[31]本身对这一问题作出的回应——实际上，“丸山学派”已经认识到了民众思想的问题，松本三之介在其著作中指出：

“在我的思想史研究中，一贯以思想家、言论人、学者等知识人群为中心，而没有以民众思想作为研究对象。当然我不否认作为历史承担者的民众所具有的分量，也深知在思想史的领域里，有关‘民众思想’已有诸多优秀的研究成果涌现。尽管如此，我还是没有积极地将民众思想纳入到研究范畴（或说无法纳入）。”[32]

而在松本三之介所谓“有关‘民众思想’已有的诸多优秀研究”中，色川大吉与安丸良夫的理论最具代表性。色川大吉的研究领域集中在明治精神史领域，强调在思想史研究过程中应该关注底层民众的思想动态，他指出：

“明治时代解放了日本民族的聪明才智，使军事、工业力量跃居亚洲首位，但是同时亦存在着无可救药的农村、城市贫民缺少文化素养的愚昧现象以及天皇制精神结构……尽管如此，我还是珍惜潜藏在黑暗大地底层的透明的存在，还是要恰当地分析日本之国力及其国民的特殊才能……”[33]

不难看出，色川大吉的研究在思路与方法上与丸山是截然不同的，其强调一种“写生式”的调查，即他所从事的是一种深入民间“把已经尘封的历史宝藏再度发掘”的工作。在这一点上安丸良夫的研究与色川大吉确有一致性——安丸也强调将民众纳入到思想史研究的视野中来：

“……这就是与现代日本社会相称的天皇形象，即使是在今日，依然为绝大部分日本人所接受。然而这样的日本天皇形象，与在国家制度与礼仪中强制于我们的有关天皇的权威性事物之间，存在着巨大而悬殊的差距……它属于一个与天皇本人相区别的、广大民众幻想过程的问题。”[34]

但是，安丸并未如色川一般彻底摒弃丸山式思想研究的方法，而是更倾向于在“民众思想”与“精英思想”的研究之间寻找一种平衡：

“真正把握和认识到其精神结构问题的，无疑是丸山真男及其学派……丸山学派不仅指出了封建性的中间势力抵抗力的弱点，而且强调了其中性国家观的阙如、权力与权威的一体化、‘国体’精神的内向渗透和权力的任意放纵等问题。”[35]

“我认为，对于思想家们的著作，只要我们掌握了用于解读的适当方法，就会了解到它们均有很好的表现时代精神状况及其象征之处。笔者适当地使用制度史、政治史以及民众史的史料，也是出于同样的研究目的。”[36]

2、“新儒家学派”与丸山理论的博弈

《谁的》对于日本丸山批判的第二方面介绍是以反“近代主义”为核心展开的：

“……接下来的第二个方面是，改变丸山真男对于近代日本思想史的观察角度和方向。由于丸山强烈的‘近代主义’视角，很多学者都意识到他仍然有一种‘倒着看’的倾向……”[37]

《谁的》用“顺着看”与“倒着看”两个颇为修辞化的词汇高度概括了丸山式思想史研究与

日本其他诸多学者研究方式的不同，这固然十分形象化，但是或许并未触及问题的本质——这种研究方法，其实质乃是历史学与政治哲学的博弈。20 世纪 60 年代以降，日本史学界开始反思并批判丸山“哲学式”的德川政治思想史研究，转而进行“历史的”的梳理与分析。[38]参照《谁的》的叙述，本文主要以徂徕学研究为线索论述这些“历史学者”对“政治哲学家”[39]丸山真男的批判。

东大文学部国史科出身的尾藤正英与政治学出身的丸山不同，他从一开始便是纯粹的历史学者，日本学士院官网对尾藤正英先生学术事业进行了如下概括：

> “尾藤正英先生通过将江户时代儒学家之思想与中国儒学进行比较，阐明其异质性，并通过对构成其背景的生活意识及社会观念、社会构造进行比较，探讨了日本历史固有之内在逻辑。”[40]

可以看出，尾藤正英的关注点在于从日本历史本身出发，解读江户思想及其特质。这集中表现在对徂徕学“祖型”的探讨上：

> “徂徕尝试专门通过制度的构建来解决问题……徂徕思想之基本立场就中国思想谱系而言更接近于法家。因此，作为道德思想的儒学，就徂徕而言反倒流为异端。可以说，产生于徂徕门下的某种道德颓废情绪已然成为徂徕学的必然倾向。”[41]

这种将徂徕学“祖型”向中国思想定位的“历史的”尝试，让尾藤正英把荻生徂徕思想中的“职务限定”与“机能分化”等诸要素与近代政治学理论联系到了一起。[42]这与丸山真男单纯从哲学逻辑的角度分析徂徕学对宋学的背离及其近代性，却未深入论述徂徕思想发源的方法是大不同的。但是，尾藤依然没有摆脱丸山“荻生徂徕—近代”的理论构建，尽管他试图去“历史地”而非“哲学地”阐述这一图式，却还是难免论证逻辑上的“超历史”性，正如平石直昭所指出的：

> “（尾藤正英）认为从组织化方面看，徂徕的近代性中已然存具适才适所、职务权限体系化等法家之思想——然这岂不是说中国古代官僚体制之逻辑成了‘近代式’之逻辑了吗？”[43]

这种德川思想“近代性”的困扰在源了圆的研究中亦存在。他曾在《德川思想小史》中写道：

> “江户时代是一部‘被推迟了的近代’的历史……德川时代可以说是由‘封建性和近代性’这一双重性格构成之时代，而这种双重性格，在明治维新之后，依然以不同的形态在接受西方文明并独立完成近代化的明治时期长期延续。”[44]

这种既有近代性要素又非近代的结论使得源了圆亦十分关注徂徕学的 “非儒特质”，即所谓“越儒教革命论”：

> “（徂徕主张）‘圣人之教尽人情而已矣’，故本被视为异端之诸子百家、佛释、老庄，皆可纳入圣人教义之范畴，可以发现，其已然超越儒教之范畴。”[45]

与尾藤、源了圆的研究不同，子安宣邦的研究彻底摒弃了丸山通过逻辑演绎得出的徂徕具有近代性的结论。首先，他否认了丸山所谓的徂徕思想的“公私分离说”：

> “这种（公私相分的）说法源自于作者（丸山真男）已有的近代观念，若是去掉了作者近代式的、历史哲学之立场，便无法找到可以使其结论正确的任何证据了。”[46]

在此基础上，子安否定了徂徕学具有“近代特质”，他指出丸山的理论已经超越了“历史的”徂徕学思想本身：

“按照作者(丸山真男)之逻辑,与中世纪自然秩序观对立的、‘作为的’秩序观便成为了社会契约式的‘作为的’秩序观。然而,即便是有可能性,欲于徂徕理论中捕捉到社会契约的痕迹恐怕亦是不可能之事。”[47]

简言之,上述“顺着看”日本思想史的学者的共同性在于强调对德川时代的政治思想文本进行“历史的”解读,即尽可能还原儒学(宋学)、徂徕学与国学本身的历史发展线索,而不是人为地利用已有的近代理论去“形而上地”“构建”思想史。正如黑住真指出的那样,“以往的思想史研究,多将徂徕学定点于可与西欧理论进行比附的位置上。然而看上去气派而一贯的说明,很多都属于与实际的思想史大相径庭的无稽之谈和虚构。”[48]值得一提的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降,东西方历史学领域内产生了一场“同步变革”,其表现便在于历史学介入到政治思想研究领域内并试图构建出一套不同于政治哲学式的、“历史的”研究范式,限于篇幅这里便不赘述了。[49]

三、结　语

作为“日本战后最重要的知识份子”[50]和“日本最有创造性的政治思想家之一”[51],丸山真男的影响早已远远超出一国之范围而及国际学界,正所谓“倘若不谈丸山真男及其思想,则无法论述战后日本思想史。”[52]如何从丸山真男理论本身出发,在把握日本丸山论诸相的基础之上,将其方法价值应用于具体的研究之中,或是我们未来研究的着力所在。

注　释:

①区建英:《译者序:福泽谕吉研究与丸山真男》,丸山真男:《福泽谕吉与近代化》,学林出版社,1992年,第13-14页。

②区建英:《跋》,丸山真男:《日本的思想》,区建英、刘岳兵译,三联书店,2009年,第73页。

③孙歌:《丸山真男的两难之境(代译序)》,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王中江译,三联书店,2000年,第1-2页。

④葛兆光:《谁的思想史?为谁写的思想史?——近年来日本学界对日本近代思想史研究及其启示》,《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第53页。

⑤同上,第55页。

⑥松本三之介:《致中国读者》,松本三之介:《国权与民权的变奏—日本明治精神结构》,李冬军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1页。亦参见松本三之介「先生の学問的姿勢について憶う」、『未来』、第361号、1996年、8-9頁。

⑦藤田省三「社会科学者は考えた」、久野収、鶴見俊輔、藤田省三『戦後日本の思想』、勁草書房、1966年、150頁。

⑧平石直昭:《中译本〈日本的思想〉序文》,丸山真男:《日本的思想》,第2-3页。另参见「丸山真男略年譜」、松沢弘陽、植手通有編『丸山真男回顧談(下巻)』、岩波書店、2006年、317頁。

⑨平石直昭:《论丸山真男之“市民社会”》,徐静波、胡令远主编:《战后日本主要社会思潮与中日关系》,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1页。

⑩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改訂版)』、東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396-397頁。

⑪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改訂版)』、397頁。

⑫孙歌:《丸山真男的两难之境(代译序)》,第2页。

⑬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改訂版)』、14頁。

⑭张翔:《隔离的政治体与共生的文化圈——日本近世后期的儒学官学体制化和东亚海域的交往》,复旦

大学文史研究院编:《复旦文史专刊·世界史中的东亚海域》,中华书局,2011 年,第 157 页。

⑮葛兆光:《谁的思想史? 为谁写的思想史? ——近年来日本学界对日本近代思想史研究及其启示》,第 53-54 页。

⑯在国内的日本研究著作中,经常出现"战后"、"战后初期"等字眼并将其作为一种"固有概念"使用,这是十分错误的,所谓"战后"自然是从战败开始,但是关于"战后"何时终结、"战后"时期的划分在日本是存在诸多争议的,参见久野収『久野収対話集·戦後の渦の中で3 思想史の周辺』、人文書院、1972 年;皆村武一『戦後日本の形成と発展:占領と改革の比較研究』、日本经济評論社、1995 年;渡辺昭夫編『戦後日本の形成』、日本学術振興会、1996 年。

⑰参见韩东育:《丸山真男的"原型论"与"日本主义"》,《读书》,2002 年第 10 期;唐利国:《超越"近代主义"对"日本主义"的图式》,《文史哲》,2010 年第 5 期。

⑱丸山真男『日本の思想』、岩波書店、1961 年、184 頁。

⑲丸山真男『日本の思想』、185-186 頁。

⑳丸山真男『日本の思想』、184-185 頁。

㉑川崎修「忠誠と反抗·解説」、丸山真男『忠誠と反逆——転形期日本の精神史的位相』、筑摩書房、1998 年、491 頁。

㉒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改訂版)』、396 頁。

㉓丸山真男『丸山真男講義録』巻 4、岩波書店、1998 年、41 頁。

㉔丸山真男『丸山真男講義録』巻 7、岩波書店、1998 年、305-306 頁。

㉕丸山真男『現代政治の思想と行動(合本増補版)』、未来社、1964 年、516 頁。

㉖丸山真男『丸山真男集』巻 12、岩波書店、1996 年、150 頁。

㉗丸山真男『丸山真男集』巻 15、岩波書店、1996 年、157 頁。

㉘毎日新聞社編『昭和思想史への証言』、毎日新聞社、1968 年、47 頁。

㉙丸山真男『丸山真男集』巻 10、岩波書店、1996 年、332-333 頁。

㉚葛兆光:《谁的思想史? 为谁写的思想史? ——近年来日本学界对日本近代思想史研究及其启示》,第 56 页。

㉛丸山门下俊杰辈出,形成了所谓"丸山学派",丸山甚至被戏称为该学派的"教皇",参见丸山真男『後衛の位置から——追補「現代政治の思想と行動」』、未来社、1995 年、140 頁。

㉜松本三之介「序章　明治精神への視座」、『明治精神の構造』、岩波書店、2012 年、3-4 頁。

㉝色川大吉「草の根からの文化の創造」、『明治の文化』、岩波書店、2007 年、1-14 頁。

㉞安丸良夫:《近代天皇观的形成》,刘金才、徐滔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1-8 页。

㉟安丸良夫:《近代天皇观的形成》,第 13 页。

㊱安丸良夫:《近代天皇观的形成》,第 23 页。

㊲葛兆光:《谁的思想史?为谁写的思想史?——近年来日本学界对日本近代思想史研究及其启示》,第57 页。

㊳关于日本近世思想(尤其是徂徠学),韩东育先生已经作出了极为细致的梳理与综述,参见韩东育:《日本近世新法家思想研究》,中华书局,2003 年,第 404-412 页。

㊴关于丸山身上所体现出的强烈的"哲学家"的色彩,丸山本人也是承认的,参见古在由重、丸山真男『一哲学徒の苦難の道』、岩波書店、2002 年。

㊵http://www.japan-acad.go.jp/japanese/members/1/bito masahde.html

㊶尾藤正英『日本封建思想史研究:幕藩体制の原理と朱子学的思惟』、青木書店、1961 年、282 頁。

㊷尾藤正英「解説:国家主義の祖型としての徂徠」、尾藤正英編『日本の名著 16 荻生徂徠』、中央公論社、1974 年。

(下转第 48 页)

风雨兼程 笔耕不辍 潜心研究的丰硕成果

——赵建民著《晴雨耕耘录》读后

沈永兴

一

手中拿的这本沉甸甸的书——《晴雨耕耘录——日本和东亚研究交流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年 4 月出版),是赵建民教授送给我的。看着这本长达 50 余万字、洋洋洒洒的大作,惊喜之情不免油然而生,记得 25 年前他曾送我由他组织编写的《日本通史》,如今这是又一部新著。我在想,为什么一个已年奔 80 的老人,还在跟自己较劲,这样不辞劳苦、孜孜以求潜心于学术研究?读了该书我才恍然大悟,他已把研究日本史和中日关系史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不须扬鞭自奋蹄",所以才风雨兼程、笔耕不辍,全然不顾老之将至,显得那样地精神饱满、老当益壮。

那是 2014 年 5 月 27 日至 29 日,复旦大学历史系 1964 年毕业的同学又一次相聚母校,举行了一场毕业 50 周年"感恩复旦、畅叙友情、共话明天"的大型联谊活动。赵建民不仅是这次活动的主要策划者和组织者之一,而且也是精致典雅的《岁月如歌——复旦大学 1964 届毕业 50 周年纪念》一书的主要执行编委。会后,他特地来学校招待所,把《晴雨耕耘录》一书签名后赠送给我。想当年在校就读时,我们一同攻读"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史专门化"(世界史专业),毕业后他留校任教,我到了北京,相隔千里,但来往不断,他有时来京出差开会,常来寒舍相聚,相谈甚欢。当我看到这本书后,第一感觉是书名取得很贴切,《晴雨耕耘录》名实相符。这 50 年来我们国家曾经历跌宕起伏;中日两国关系并不平静和一帆风顺,也有风风雨雨,70–90 年代的友好邻邦如今却跌入低谷;而作者本人也经历了人生中的一次劫难——因大病而两次手术。但他病愈后仍念念不忘学术,孜孜不倦,潜心于日本史和中日关系史研究,曾为上海中日关系史研究会的活动而四处奔波,为全国性的学会如中国日本史学会和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也出力不少。而现在终于有了回报,成果丰硕、成绩斐然。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作为一个学者的品格和风貌。

二

读了这本《晴雨耕耘录》,扑面而来的直觉是内容十分丰富、充实,而且很有新意,富有特色。这本文集涉及到日本史和中日关系史的诸多方面。这对我来说颇觉新鲜而增长见识。本书涉及面很广,有中日文化差异及其因果之解读,也有中日两国吸收欧洲近代文化之比较;

既阐释了兰学是日本近代化的胚胎,也叙述传入日本之儒学的逆向输出;既叙释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三次留学高潮及译书事业,也指出了两国间战争胜负造成的损与益;既有访日的感怀和书评,又有对日本史和中日关系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林林总总,内容十分丰富,涉及问题相当广泛,表现出赵建民教授对日本史和中日关系史研究相当深厚的功底和独特的视角。

例如,一般认为中日是"同文同种"的,而该书的几篇论文中阐释中日两国"既不同文又不同种,但不同中有同,同中有不同",它们虽同为东方文化,但属"同性异质"的文化,文中构勒出了中日文化在思想方法、行为方式、价值判断、心理素质诸方面的异和同:中国为尊卑有别的隶属观念、谦恭礼让的处世态度、重义轻利的价值判断、求同的思维方式和知足的文化心理;日本则为群体观念、集团意识、竞争风格、拼搏进取精神。这些概括确有一番新意。当然,这些都是在漫长的社会发展和外来文化的影响以及地理环境下形成的。因此,中日两国间应充分寻找差异来求得共识,"认识差异才是相互理解的基础"。这种观点在现实中也很有吸取和应用的价值。

本文集另一个特色是重点突出。赵建民教授长年在复旦大学讲授"世界中世纪史"、"中日文化关系史"、"中日文化交流史专题研究"、"日本史"、"日本史文献导读"、"日本史研究理论与方法"等多门课程,可见中日文化交流史是他的重点和擅长。文集恰好体现这一特点,多篇论文是围绕中日关系史而展开的,可视为该书的主题。我读后认为,其中多篇研究中日文化交流的论文,具有相当的深度和质量。赵教授通过比较提出了自己的独立见解。例如,在对中日两国吸收欧洲文化的比较研究中,对中日两国在此过程中为何分道扬镳——一个走向成功,另一个走了失败之路——有着独到的解释。他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日两国对待吸收欧洲文化的认识、态度和方法上的不同,这个差异致使两国近代以来所走的道路和效果大相径庭"。个人以为赵教授得出的结论是精准和具有说服力的,其原因就在于他对中日文化史的比较研究有扎实和深入的研究,这是他长期秉持"纵向考察、横向探索",遵循"宏观视野下的实证和比较"研究的结果。

再进一步说,对中日两国吸收欧洲近代文化,作者确实善于比较研究,观点鲜明、见解独到。他在文中这样写道:"中国是日本吸收欧洲文化的先行者、媒介者,但是欧洲文化在中日两国发生的影响差异悬殊","日本吸收了欧洲文化,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成功实行了初步近代化而进入资本主义列强行列;而中国吸收的欧洲文化只影响到社会上层、宫廷、官僚,未能真正踏上近代化轨道,却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第 79 页)。他又接着指出:"中国完全以皇帝为中心,通过外国传教士传播,未遍及一般社会",相反,"日本以幕府进行普及和研究,传播完全是日本人自身的问题"(第 81 页);作者还指出从江户幕府末期到甲午战争,中日吸收欧洲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以前是日本通过中国为桥梁;在此之后中国向日本派遣留学生为契机,通过日本的媒介来吸收欧洲文化"(第 81 页)。这三个层次的比较透出了作者研究的深入细致。不仅如此,作者还指出,"译书活动是中日两国吸收欧洲文化的重要手段,但是无论从数量和质量上,日本都要优于同期的中国";就这样作者从中日双方对吸收欧洲文化的态度、方法、认识以及进程和结局上作了比较,并揭开了导致不同后果的深层原因。这种研究与分析,犹如剥笋,层层剖析,步步深入,言之成理,构成一家之言。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的研究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在本书中,作者对这个问题也提出了独树一帜的见解。例如针对儒家文化对日本近代化的影响,他指

出:儒家思想“首先是被作为批判对象,然后通过对其借用和改造,来嫁接日本文化和欧洲文化的联系,推动了日本近代化的起步”(第 35 页);又说“中国文化传统与日本近代化成功的关系,只是一种相关的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第 39 页);还说“我并不否认学习西方、儒家思想、重视教育、国际环境等因素对日本近代化所产生的影响,但似乎能得出富有特色的民族精神才是日本近代化成功的最重要原因(即真正奥秘)的结论”(第 32 页)。赵建民教授早在 20 多年前就提出了这些见解,至今还值得深思,且颇有启发性。

三

本书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在研究和考察日本史和中日关系史时,能以史为鉴,联系实际,充满着对现实的关注。赵建民教授认为从事历史研究不能无视现实,当然它与专门从事现实问题研究也不一样,他譬喻为研究现实问题是吃“快餐”,而研究历史则是色香味俱佳的“满汉宴席”,充分体现出历史研究的价值和生命力。从这本文集中可以看出,研究历史、关注现实是赵建民教授一贯坚持的学术品格。他能够从现实生活中发现历史研究的紧迫问题,又能着力在历史研究中探求解决现实问题的思想资源。例如,文中谈到吸收欧洲文化的经验与教训时,作者一再强调“国家政权能否发挥主导和决策作用是成败的根本保证”(第 88 页),又说“能否善于和对待外来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关系是成败的关键所在”;“重视和办好教育事业是吸收外来文化和推进近代化的基本手段”(第 89 页)。这些结论是在对比中日在历史上对待外来文化的不同态度后得出的,并非泛泛而论。早在 90 年代发表的论文中,赵建民教授就对未来 21 世纪的中日关系持比较乐观的态度,但他还是严肃指出,中日关系能否健康持久发展,还有一些障碍和困难,尤其是面临着三个问题,即历史问题、现实问题和价值观问题,他也预见到当时日本外交在新的世纪的目标,是要构建美日欧的所谓“三极体制”。对此,作者非常冷静和清醒地指出,“中日关系不仅仅是双边关系,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日美关系的影响”。这些看法是相当理性和具有预见性的。这些在历史研究中对现实的关注,把历史研究与现实紧密相连,在本书中多处都有体现,很值得称道。

翻开中日关系史,这一点显得特别重要。如果日本政府敢于正视历史,勇于反省,中日关系就很好,反之就会降温或发生摩擦。近年来日本安倍政府之所以在右倾道路上越走越远,参拜靖国神社,妄言修改宪法,力图改自卫队为国防军,解禁集体自卫权,打破武器出口三原则,大肆扩充军备,挑动菲律宾、越南等国制造南海紧张局势,妄图围堵中国,这一系列举动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敢正视历史,反而要篡改历史。

四

本书另有一点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是作者在长达 30 余年的教学与研究生涯中所积累的治学方法和经验,很好地处理教学、科研、交流之间的关系,也可供我们学习与借鉴。例如,他提出“以问题意识立课题”,就是一个不错的经验。搞学术研究,必须善于提出问题、研究问题,有自己的观点;在教学中同样如此,才会受学生的欢迎。如果脑海中没有问题意识,甚至空白一片,那是不可能写出好文章的,充其量不过是人云亦云。有了问题意识,才促使作者追根溯源、立意新颖,解释清楚为什么,才会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和创新。与此同时,赵建民教授

在教学和研究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国内外的交流，仅就上世纪90年以后的10年间，就先后访问过近50所海外名校，作过30余场学术讲演。正是因为作者通过教学、科研、交流，才可能在书中抓住若干重要问题，如中日文化之差异、吸取欧洲文化之比较、日本近代化的胚胎兰学、儒家文化的传播与逆输出以及赖山阳、桥本宗吉、山片蟠桃、志筑忠雄、西博尔德等的人物研究等，以阐发研究心得，通过刻苦钻研，以充足的材料和论据，来阐明自已的观点和结论。我以为，这是他重要的治学之道。不断提出向题、不断探索、不断提高，才使赵教授有了如此丰硕的成果。

以学会活动创平台，这是作者另一个较成功的治学心得和体会。他多年来以专业性研究会作为学术交流的平台，这对于获得信息、交流心得、结识同行具有重要作用。赵建民教授热心从事学会工作（2003年被上海市社联评为“优秀学会工作者”），团结同行学者，这就大大拓展了学术活动空间，加强了与国内外的学术交流机会，如他在没有资金来源时，借助大学同窗之助，成功举办了两次颇具规模的国际学术会议。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有了一个活动平台，比起一个人关起门来冥思苦想，视野会更开阔，交流和受益机会更多，学术动态和前沿了解更清楚，提高水平更快，值得提倡和称道。

另外，书中还有多篇文章回忆了作者与学界前辈周谷城、吴廷璆、周一良、邹有恒、唐德刚等先生交往的轶事，或评述他们的学术成果，或阐发他们所给予的诸多厚爱和关照。饮水思源忆关爱，表现出对前辈学者的尊重和怀念。学术需要传承，也需要超越。尊重前辈，就是尊重学术传承，只有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才可能超越。感恩师长和前辈，是我们应有的学风和文品。本书作者也给了我们榜样和启迪。

当然，本书仍有一些不足或瑕疵，主要是收入文章过多，不舍得割爱而显得不够精练；也因为列专题的关系，所选论文难免有所重复，如果编辑论文集时能作些改动更好。

历史是现实的教科书，也是一贴很好的清醒剂。当前中日关系处于历史低谷和僵持难解的困局，安倍政府的一意孤行、否定历史、顽固右倾，使中日关系陷入僵局甚至有擦枪走火的危险。在这种局面下，重温中日关系的历史，认真读一读赵教授的这本书，还是大有裨益的。

2014年7月写于北京·华芳园

（沈永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世界历史》原副主编、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原常务副会长）

中心大事记

2014 年下半年

6 月 29 日 –7 月 5 日	张浩川副教授赴日本访问瑞穗证券、日本能率协会、外务省、财务省等，并于 7 月 2 日在日本经济广报中心作专题演讲“日本企业在华的商品战略和人才战略”。
7 月 15 日	徐静波教授出席日本国驻上海总领事小原雅博在总领事官邸举行的“日本和服展示会”和小型晚餐会。
8 月 1–3 日	徐静波教授出席日本“一个亚洲财团”在韩国济州岛举办的“一个亚洲”2014 年济州年会，担任“文化、媒体与艺术”分科会的主持人。
8 月 8 日	中心举办“如何打开中日关系僵局”研讨会。东京大学高原明生教授、藤原归一教授、上海市日本研究交流中心副主任郁志荣、复旦大学历史系冯玮教授、国关学院包霞琴副教授、中心魏全平副教授等参加。
8 月 21–25 日	徐静波教授出席日本渥美国际交流财团在印尼巴厘岛举办的“亚洲的未来”国际研讨会，发表学术报告“我们今天及今后将如何研究日本”。
9 月 4 日	日本关西大学师生代表团一行来访。
9 月 6–7 日	张浩川副教授赴丹东出席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 50 周年庆学术研讨会。
9 月 6–9 日	徐静波教授出席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举办的 “日本现代化转型中的改革与治理”国际研讨会，发表论文“日本近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与缺陷”。之后出席中华日本学会和中国日本史学会在大连举办的“甲午战争以来的中日关系”研讨会，发表论文“甲午战争时期日本舆论对中日两国和战争的认识”。
9 月 8 日	日本松山大学师生代表团一行来访。
9 月 9 日	胡令远教授、徐静波教授、张浩川副教授等出席日本国驻上海总领事小原雅博在总领事官邸举行的晚餐会。
9 月 13–14 日	徐静波教授出席灵隐寺和中国茶文化学会在杭州举办的中日双边第六届禅茶文化论坛，发表论文“试论茶道成立以前的日本饮茶礼俗及与茶道的关联”。
9 月 11 日	胡令远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的教育部 2014 年度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战后日本政治外交实质和未来走向研究”获得立项，我中心在科研项目上获重大突破。
9 月 13–14 日	张浩川副教授赴丹东出席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东亚学术论

坛。

9月17日　日本经济广报中心访华团一行来访。

9月18日　中心与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共同举办“学术翻译的观念与方法——章培恒教授《中国文学史新著》日译本”座谈会，中心胡令远教授、徐静波教授参加。

9月19日　张浩川副教授出席无锡市日本企业商工会年会，并作主题演讲“中国的日本企业研究”。

9月20日　中心与上海市日本研究交流中心共同举办“中日政经和东海维权形势研判及对策”内部研讨会，商务部亚洲司宋耀明副司长、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梁芳副教授作特别嘉宾，来自复旦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社科院等的日本问题专家20人参会。

9月25日　徐静波教授出席日本国驻上海总领馆举办的丸山副总领事离任和冈田副总领事就任餐叙会。

10月8日　张浩川副教授赴日本松山大学，作专题演讲“日本地方旅游发展研究”。

10月14日–11月25日　中心举办2014年度复旦·三井物产冠名系列讲座。本年度一般讲座分为三讲：10月14日，“当今中日关系的‘表’和‘里’”（复旦大学历史系冯玮教授）；10月28日，“战前上海日本人社会与日本企业文化”（东华大学陈祖恩教授）；11月25日，“东亚视域中的笔谈文献”（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院长王勇教授）。

10月16日　中心举办“复旦大学授予池田大作先生名誉教授30周年纪念演讲会”。复旦大学前校长王生洪、日本创价大学副校长寺西宏友、复旦大学池田大作研究中心副理事长牧野长生等50余人出席，哲学系袁闯教授作主题演讲。胡令远教授向出席纪念活动代表汇报池田大作思想研究中心的主要活动和研究成果。

10月21日　中心举办复旦·三井物产高端讲座“中国企业融入全球之路”，复星集团董事长、全国人大代表郭广昌在逸夫科技楼一楼报告厅为近500位师生演讲。复旦大学副校长冯晓源会见郭广昌校友一行，并在讲座活动上致欢迎辞。

10月23日　日本经团联访华代表团一行来访，张浩川副教授作专题演讲。

10月24日　张浩川副教授、奚伶博士后、王梦雪博士代表中心出席上海日本学会主办的“缅怀汪道涵上海青年日本研究学者座谈会”并发言。

10月26日　徐静波教授出席山东师范大学举行的“第一届中日研究生学术论坛”，担任学术总点评人。

10月31日　日本一桥大学国际部、庆应义塾大学国际部和关西大学国际部来访。

11月1日　中心举办第24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冷战后日本政治·经济·社会体系的变化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以经济为中心”。日本国

驻上海总领事小原雅博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浩川副教授、京都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岩本武和教授、关西大学经济政治研究所所长水野一郎教授分别发表主旨演讲。来自京都大学、东北大学、一桥大学、庆应义塾大学、关西大学、同志社大学、独协大学、福井县立大学、山口大学、长野大学等日本高校以及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复旦大学、辽宁大学、吉林大学、上海社科院、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上海金融学院等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近 50 位学者与会，并就日本的财政政策、安倍经济学、中日经济关系、中日经济比较研究等主题开展了热烈的讨论。此次会议得到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资助。

11 月 2 日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经济学院、党委统战部共同在中心举行郑励志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暨华诞 90 周年纪念会。外交部原副部长、中国前驻日本大使徐敦信先生、日本财务省财务官山崎达雄先生出席活动并分别作特别纪念演讲。副校长林尚立代表学校出席活动并致贺词，校党委副书记陈立民到场致贺。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李薇研究员、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会长杨洁勉教授、日本驻沪总领事小原雅博、原上海市日本研究学会会长俞彭年、上海市日本研究学会会长吴寄南、上海市政协代表、台盟上海市委代表高美琴以及郑励志先生的亲朋好友、学生故旧和国内外专家、学者近 120 人出席了当天的会议。日本著名经济学家伊东光晴教授专门为郑励志先生 90 华诞发来祝词。经济学院党委书记石磊、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吴心伯分别主持了当天的研讨会和祝寿活动。

11–12 月　张浩川副教授作为商务部调研项目负责人，前往珠三角、长三角和西部主要城市，就在华日企最新动向作实地调研。

11 月 4–10 日　徐静波教授赴日本学术访问，4 日下午参加在东京举行的国际工作坊“佐尔格、尾崎秀实去世 70 周年”；5 日前往爱知大学名古屋校区，作演讲“以上海为舞台的 20 世纪上半叶中日知识人的交流”；8 日参加在明治大学举行的 “第八届佐尔格事件国际研讨会”。

11 月 10–14 日　东京大学教授、日中 21 世纪友好委员会秘书长高原明生先生应邀来中心集中讲学。高原教授的五次系列讲座分别题为“日中关系的分析框架以及日中关系的展开，1972–1982”、“日中关系的展开，1982–1992”、“日中关系的展开，1992–2002”、“日中关系的展开，2002–2012”、“日中关系的现状与展望”。

11 月 11 日　中心举办复旦·三井物产高端讲座“互联网时代的偏见”，由东方卫视著名主持人骆新先生主讲。

11 月 12 日　徐静波教授主持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举办的日本法政大学渡边

浩教授的报告会“我为何写作《日本政治思想史 17–19 世纪》”，并发表评论。

11 月 12 日　贺平副教授出席“APEC 北京峰会成果评估会”，并作主题发言。

11 月 20 日 –23 日　日本立命馆大学中日学生和平对话项目学生团来访。

11 月 25 日　胡令远教授、张浩川副教授出席上海交通大学主办的第六届“中日美三边关系国际研讨会”，主持分会场并作发言。

11 月 29 日　徐静波教授出席国际问题研究院韩国研究中心与韩国长老会神学大学联合举办的“近现代韩日关系与中日关系”国际研讨会，发表论文“甲午战争时期日本舆论对战争和中日关系的认识”。

12 月 4 日　教育部 2014 年度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战后日本政治外交实质和未来走向研究”开题会在中心举行。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杨健、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高洪研究员等专家组及课题组主要成员出席。校文科处、国际问题研究院领导主持。

12 月 4 日　张浩川副教授赴日本国际交流基金，汇报基金资助项目结项情况。

12 月 5 日　日本关西大学师生代表团来访。

12 月 6–7 日　徐静波教授参加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与早稻田大学联合举办的中日双边研讨会“中日文学关系：以上海为中心”，发表会议主旨演讲“日本作家佐藤俊子的上海岁月”。

12 月 10–13 日　贺平副教授赴日本立命馆大学参加六校年会。

12 月 10 日　日本住友商事全球经济研究所访华代表团一行来访。

12 月 12 日　张浩川副教授出席中国社科院日本所主办的 “中日关系与中国对日战略”年度学术研讨会，并作发言。

12 月 17 日 –19 日　贺平副教授赴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参加年度国际学术研讨会。

12 月 19 日　日本名古屋外国语大学川村范行教授来访。

12 月 19 日　中心举办第三次池田大作思想学习会。学习会由池田大作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戴蓉主持，牧野长生主讲，参加学生 10 余人。

12 月 20 日　徐静波教授出席同济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举办的第七届中日韩民间交流论坛“大学教育合作与国际文化交流”，发表“浅论青少年国际观的培养”。

12 月 20 日　张浩川副教授出席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主办的“经济一体化、中日经济合作与自贸区建设”国际研讨会，并发言。

12 月 22 日　韩国济州大学亚洲共同体研究所所长金汝善教授一行来访。

12 月 26 日　日本麻布学园平秀明校长师生代表团来访。

12 月 29 日　日本“一个亚洲财团”理事长佐藤洋次一行来访，洽谈进一步合作事宜。

（华　莉）